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智库要为“战胜疫情、携手共进”把脉开方 曾培炎 (005)

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长尾”“日本式衰退”和政策新边界
朱 民 (007)

• 国际经济 •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
王晓红 孟丽君 郭 霞 (024)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现状、挑战和演变前景 杨长湧 (051)

基于数字经济视角理解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敬艳辉 李 玮 (063)

欧盟数字贸易发展的新动向及展望 谢兰兰 (072)

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梁泳梅 李 钢 (081)

• 区域经济 •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杨 萍 李 伟 应晓妮 (093)

· 产业发展 ·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与建议

丰晓旭 雷尚君 (106)

· 智库言论 ·

坚持多边主义 共渡全球时艰

——第六年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及主论坛综述 (119)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2)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6)



CONTENTS

Think Tanks Need to Get the Methods of “Overcoming the Pandemic and Working Together”	<i>Zeng Peiyan</i> (005)
The World Economy and Finance After the Pandemic: “Long tail”, “Japanese-style Recession” and New Policy Boundaries	<i>Zhu Min</i> (00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Tra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i>Wang Xiaohong , Meng Lijun , Guo Xia</i> (024)
The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Evolution Prosp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i>Yang Changyong</i> (051)
Understanding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Prospects of Digital Economy	<i>Jing Yanhui , Li Wei</i> (063)
New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E. U.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i>Xie Lanlan</i> (072)
The Impact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on Local Inclusive Growth ——A Case Study of Ethiopia	<i>Liang Yongmei , Li Gang</i> (081)
Buil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Gr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i>Yang Ping , Li Wei , Ying Xiaoni</i> (093)
Model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Feng Xiaoxu , Lei Shangjun</i> (106)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2)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智库要为“战胜疫情、携手共进” 把脉开方^{*}

曾培炎

摘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加上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将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加大了全球治理风险。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各国应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勇气共同迈过这个坎，而这也是智库展现智慧、发挥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时刻。智库要把握全球发展的大趋势、要旗帜鲜明地推动国际协作、要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智慧。

关键词：智库 新冠疫情 经济衰退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当前，人类正在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加上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受到严重冲击，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都下调了对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共同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90%以上的经济体将是负增长。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可能不仅是“暴风雪”，也可能是漫长的“寒冬”。

^{*}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9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六年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讲话。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凸显，个别国家把国内问题外部化、政治化，单边霸凌行径大行其道，破坏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加大了全球治理从整体走向破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风险。

疫情带来破坏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当前紧迫任务是聚焦全球抗疫，推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协作机制，加强抗疫信息和经验分享，促进药物和疫苗研发合作。同时，提高各国宏观政策协调力度，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防止世界经济陷入中长期深度衰退。并且需要围绕全球经济、金融、能源、科技等重大问题展开坦诚、平等和建设性对话，充分照顾各方关切，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新方案，维护人类共同福祉。

中国是最先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采取果断措施很好控制了疫情，经济迅速恢复，显示出强大韧性和内在活力。根据 IMF 最新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 2020 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需要强调的是，新发展格局绝非重走封闭循环的老路，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实现国内、国际商品和要素市场更好畅通；将不断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发展的贡献者，与各国共创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

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大衰退的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各国也应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勇气共同迈过这个坎。这也是智库展现智慧、发挥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时刻。

——智库要把握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潮流，也是全球发展的大逻辑。智库应带头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引导舆论，推进文明融合而不是对立，推进发展成果共享而不是独享，推进更高水平的合作而不是对抗。

——智库要旗帜鲜明地推动国际协作。各国智库要加强沟通交流，主动献言献策，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努力消弥各方分歧，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

——智库要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智慧。智库要根据全球治理发展的新要求，开展客观的分析研究，提出可操作的公共政策建议，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出好谋，为构建更为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李蕊

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长尾” “日本式衰退”和政策新边界

朱 民

摘要：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在速度和规模上，都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冲击全球经济与金融，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全球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在各国的“解禁”政策下，疫情成为“长尾”和“肥尾”，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世界经济将步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世界经济复苏将会是一个缓慢的弱过程。与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未来充满挑战，也满是机遇。

关键词：疫情 世界经济和金融 长尾效应 日本式衰退

作者简介：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在速度和规模上，都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冲击全球经济与金融，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疫情还在指数级地蔓延，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曾经写道：“危机开始之时，也是思考启航之点。和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现时、历史和未来都在考问我们。”未来充满挑战，也满是机遇。

一、疫情：“长尾”和“肥尾”，复工抗疫并存“新常态”

全球疫情继续指数级上升。从 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具备“大流行病”特征，短短 6 个月不到，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迅速扩散至全球六大洲 210 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8 月 24 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 23856369 例，累计死亡 818058 例，死亡率 3.4%。日均新增确诊高达 23 万例。新增确诊数量居高不下，累计确诊规模高位递增，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疫情仍在指数增长，峰值仍然未现。^①（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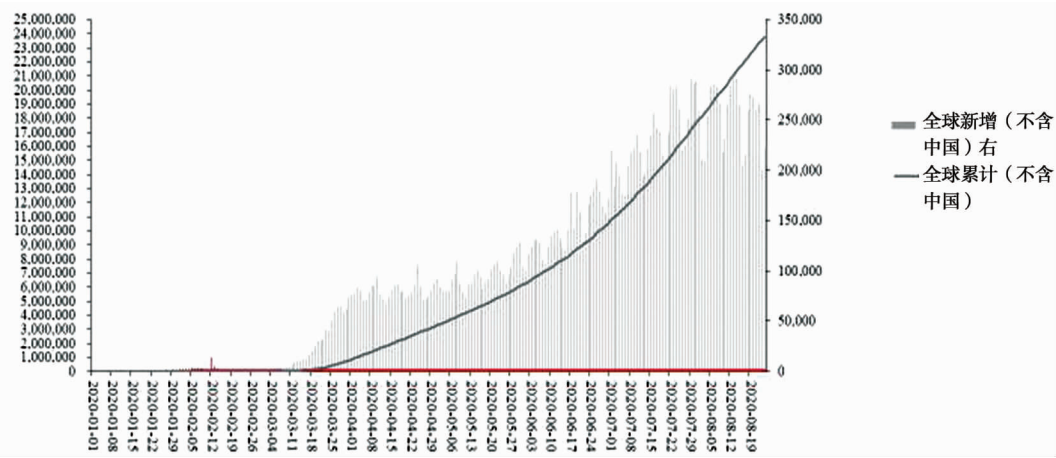


图 1 2020 年 1 月 1 日—8 月 19 日全球新增与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万得，2020 年 8 月 25 日。

美国疫情快速增长，形势严峻。美国疫情在 3 月实施“社交距离”和局部“封城”政策后，疫情蔓延得到初步控制，美国新增病例从每天 3 万例降到 1 万例，纽约市新增病例连续下降，已经降到日增 1000 例以下。但管控措施仅仅维持了近 4 周，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检测范围有限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推动仓促复工，疫情又开始反弹。美国 4 月 16 日宣布市场再开放计划以来，单日新增确诊数量围绕 3 万例波动式起伏，7 月开始日增病例重新攀上 5 万~7 万例高峰。截至 8 月 24 日，美国累计确诊 5915630 例，当日新增 4.2 万例，累计死亡 181114 例，死亡率 3.1%，感染率达到 1.75%，超过 1.5%的大流行病临界点。疫情在美国内洲际蔓延，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等成为新的重灾区。图 2 显示美国疫情在得到暂时控制后的大幅攀升，峰值仍然未到。因为确诊高平台，指数增长，美国疫情发展令人担忧。

4 月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发展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向新兴经济国家蔓延。截至 8 月 24 日，美国之外，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成为世界确诊病例最高的国家（图 3），巴西累计确诊 3627217 例，当日新增 2.1 万例，累计死亡 115451 例，死亡率 3.2%。印度累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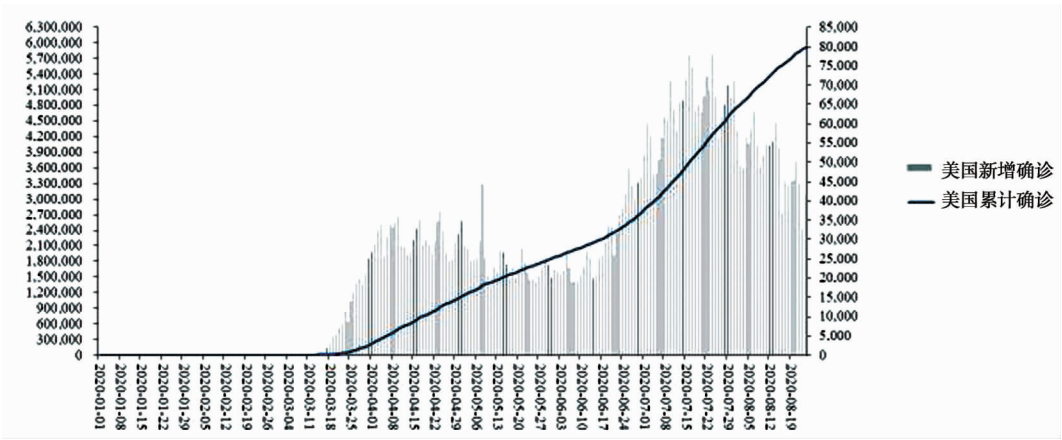


图2 2020年1月1日—8月19日美国新增与累计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万得，2020年8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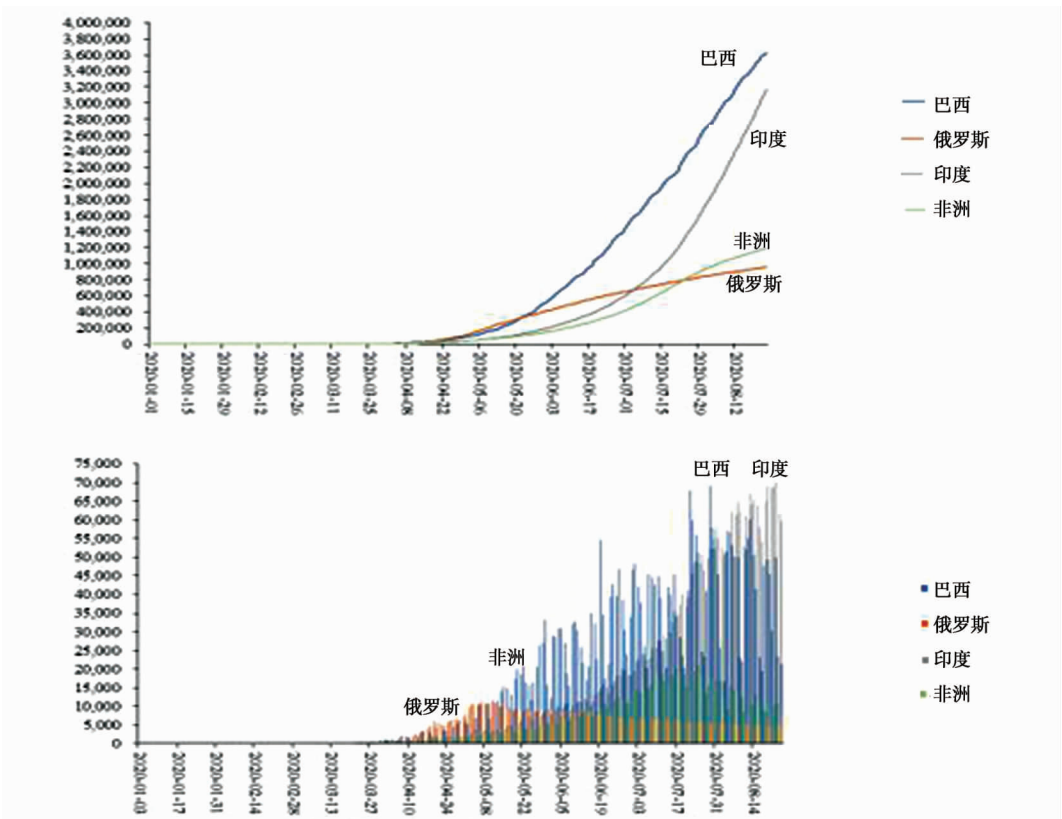


图3 巴西、俄罗斯、印度及非洲累计与新增确诊病例数量

数据来源：万得，2020年8月25日。

确诊 3164881 例，当日新增 6 万例，累计死亡 58546 例，死亡率 1.8%。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有限的检测能力，导致确诊人数与实际感染人数偏差过大，以死亡率作为指标对部分新兴经济国家调整后，估测确诊病例可能低估 50% 以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医疗系统资源匮乏

乏，检测诊治能力薄弱，部分地区人口居住密集，也没有足够的生活条件执行社交隔离的遏制政策，对新冠疫情的防控能力较弱，感染数据的跟踪披露也难以反映疫情蔓延的实际严重程度。疫情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爆发会将全球带进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新冠病毒的全球发展轨迹明显呈现区域转移趋势，并以波浪的形式持续发展。疫情先在亚洲和中国，然后到欧洲，再到美国，目前到新兴经济国家。疫情波浪式的持续发展整体拉长了世界疫情蔓延的时长，跨过夏季延续到秋冬季，加之确诊病例居高不下的高平台，成为第二波疫情反弹的温床。

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急剧下跌，很快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经济压力日益增加。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各国政策转向，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选择解禁“封城”，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共存的阶段。但是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欧美国家大部分没有采取类似韩国早期的大规模检测或者中国严格的跟踪和分级隔离等强力措施，离全面控制疫情还有相当长距离。同时，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有效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和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

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的疫苗，但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截至 8 月初，全球有 150 支新冠疫苗在研发过程中，6 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的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进入临床Ⅲ期招募和接种，是全球首个启动Ⅲ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 Inc.）在过去两年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苗的研发经验上，发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基因序列与 MERS 非常相近，因而转向 COVID-19 的信使 RNA 疫苗研究，也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但是临床Ⅲ期大规模测试疫苗耗时更长，不确定性仍存。

综上，疫情曲线还在上升，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快速上升的确诊率看，用模型模拟，目前报告的世界疫情确诊数量仍有低估，还有患者没得到检测和认定，整体疫情还在上升期，峰值仍然未到。病理上病毒有其独特的非线性爆发的发展和演变路径，从单个国家疫情的发展趋势、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发展轨迹、从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三个维度看，并根据包括确诊病例、日增加率和死亡率的已有数据模拟，全球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在各国的“解禁”政策下，疫情成为“长尾”和“肥尾”，疫情将至少在今后 12 个月内在全球广泛存在。

疫情在全球波浪形持续发展，确诊病例高平台持续存在，形成病毒大规模蔓延和爆发的温床，给全球疫情潜在的 second wave 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从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

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不知道全球是否有第二波疫情，但一些模拟表明，世界可能发生第二波疫情的概率在上升。世界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与隔离遏制举措将在 12 个月内继续存在，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新常态”。

二、市场：下跌、分化后与央行博弈震荡

疫情冲击经济增长前景，削弱企业盈利预期，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在现代通讯技术下，信心传导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传导。笔者曾经提出，“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市场从贪婪到恐惧的变化是瞬间的事”，全球股市先于经济波动而大幅下跌。自 2020 年年初至 3 月 23 日，美国历史性地发生 4 次市场熔断，三大股指平均累计下跌 42%，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市场股指累计下跌均超过 50%，几乎回到 2008 年的低点。市场大幅波动反映了市场对疫情发展的悲观情绪、政府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

各国央行随即迅速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宽松流动性下，股市又迅速反弹，仅仅两个月后，美国股市迅速反弹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一度高于危机前最高点。股市经历了一个急剧的下跌和一个急剧的反弹（图 4）。股市反弹的时候，股市的估值也发生了强力反弹。标普 500 的平均估值过去 20 年平均在 18 到 20 倍之间，疫情危机前最高达到了 30 倍，3 月份股市大跌的时候跌到 15 倍，现在又回到了 24 倍。



图 4 2019 年 1 月 2 日—2020 年 7 月 2 日美国股指

数据来源：万得。

注：2020 年 2 月 12 日、2 月 19 日、7 月 10 日分别为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 500 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在 2019 年至 2020 年 7 月 2 日最高点。

股市稳住了吗？衡量股市变动，经济增长前景是一个重要变量，如前所叙，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是大幅下滑的。公司盈利预期是股市估值的主要指标，疫情前美国的 2020 年

公司盈利预计为增长 6%左右，在疫情爆发后迅速下跌到 -6%~-9%。信心是股市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历史上美国股指发展和消费者信心高度相关，美国股指曲线和消费者信心曲线高度拟合，直观可以看到有高达 90%以上的拟合。但本次疫情危机中，两者背离，消费者信心急剧下跌情况下股市却继续强劲反弹（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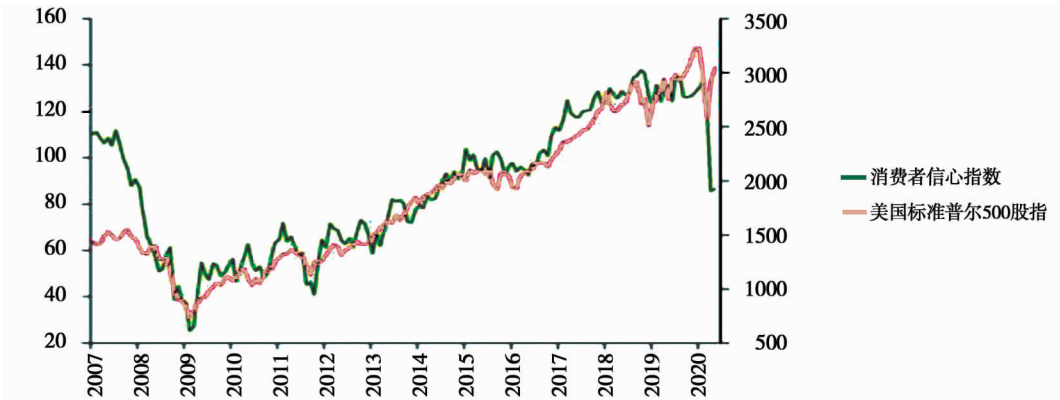


图 5 2007—2020 年美股股指与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公司盈利下跌，盈利前景为负，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而因为流动性的大量支持，股市的指数和估值在上升。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几乎是无限制地购买资产，甚至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贷款，成为金融中介。各国央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支持了股市反弹，这是一个流动性支撑的反弹，而不是业绩支撑的反弹。图 6 明显地表明央行注入流动性后的股市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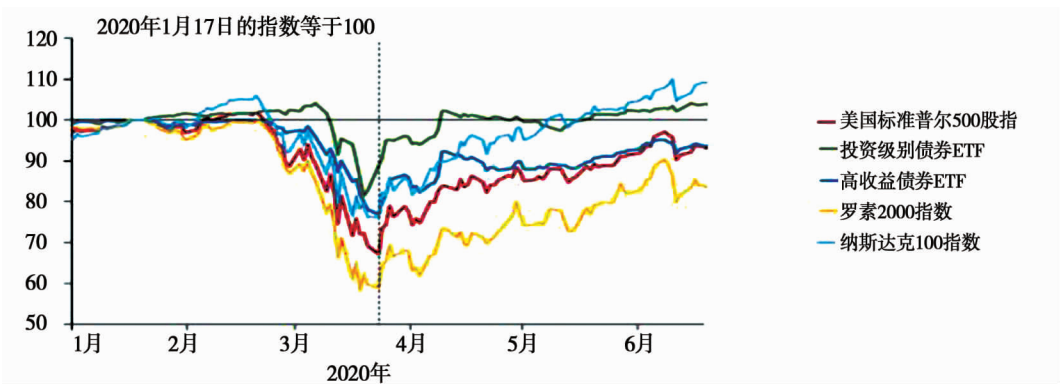


图 6 央行流动性支持下的美国股市

数据来源：IMF。

比较 1929 年大萧条股市下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股市下跌和本次疫情下股市下跌，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如图 7 所示，每次危机都有股市下跌。图 7 中最长的那条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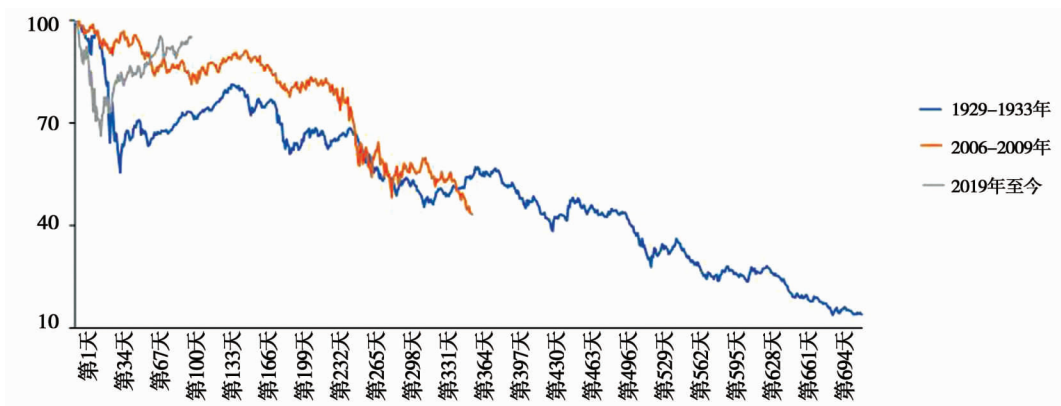


图7 三次危机时标普500指数下跌比较

数据来源：万得。

注：1929年9月16日、2007年10月9日、2020年2月19日分别为1929—1930年、2006—2009年、2019年至今最高点，点位数100。

是1929年大萧条的股指，股指下跌的幅度超过今年，在政府支持流动性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和暂时的支撑。但流动性没有解决根本的产能大规模过剩和股市大泡沫问题，所以市场继续下跌，政府又出台支持政策，市场缓缓反弹。但因为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企业破产不断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恐慌蔓延，股市挡不住大跌，形成了大萧条。第二条中等长度的曲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股市下跌曲线。先是2007年初发生新世纪地产破产，其实已经是严重预警，股市下跌。下跌后美联储发声，会提供流动性稳定市场，市场稳住并有一小反弹。接着发生贝尔斯登公司的破产，股市又开始下跌，当时市场已经非常紧张。然后美联储又开始支持流动性，市场又稳住了。但是房地产泡沫和次贷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解决次贷产品的流动性问题，股市在2008年秋季急剧地下跌。最短的那条曲线是这次2020年的曲线，它的下跌速度是最快的，表明股市敏感、脆弱、联动快。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是史无前例地强大，所以市场迅速地反弹，反弹规模远远超过1929年和2008年的反弹。

比较1929、2008和2020年的股市波动，显然，波动和调整还在到来。当市场是流动性支撑的市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波动是必然的。当前的根本问题是疫情。只有控制了疫情，恢复了经济，企业开始产生利润，居民开始消费，市场才会新的基准上平衡并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股市还会根据疫情发展、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居民的消费信心不断地调整，不排除有大的震荡。

股票市场震荡下跌情况下和央行利率急剧下调，债券市场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图8是对国债市场未来2年的收益预测，最深的颜色是收益率为负的债券比重。灰色收益率是

0%到 1%的债券，占了债券市场的绝大部分。最浅颜色部分是收益率 1%到 2%，尚有非常小部分的债券收益率在 2%到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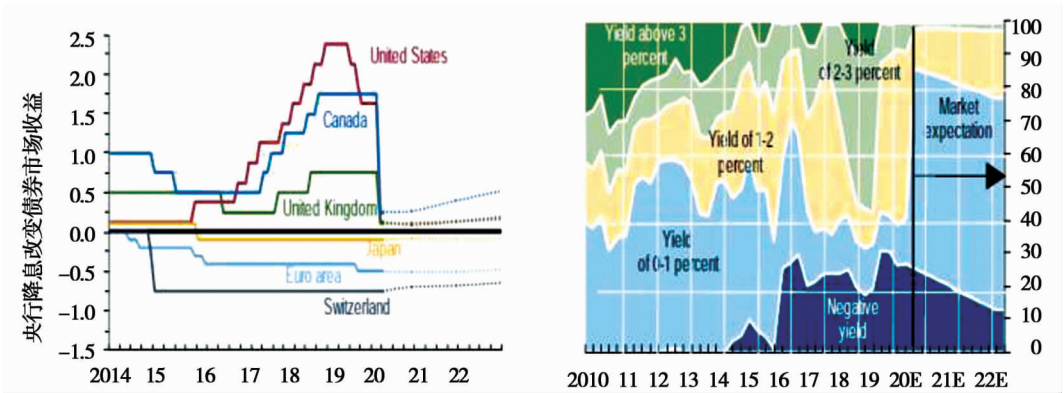


图 8 债券市场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IMF。

债券市场进一步分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利率水平大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利差却在上升，美国和德国等避险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20 年年初至 8 月下跌到 0.73%，德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下跌 42 个基点至 -0.58%。但以意大利为代表的疫情严重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上行，意大利、德国 10 年期国债利差不断扩大，至 3 月 16 日达到 278 个基点。公司债券市场分化严重，低评级债券、垃圾债券的利差迅速扩大，特别是能源部门的债券，利差一下子涨到 2500 个基点。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利差也在扩大。

以本次央行迅速下调利率为零，全球央行政策利率走完了一个长周期。以美国为例，图 9 显示，美联储短期利率从 1929 年大萧条后下降为零，维持到 1940 年经济逐渐恢复，1945 年二战结束和经济恢复，利率上升。战后每有危机，利率就下调，危机过后就上升，最高点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保罗·沃尔克把利率水平提高到 18.6%，以控制通货膨胀。此后利率整体是下降趋势，危机时利率下调，危机后上升，利率空间得以保持应对未来危机。图 9 直观地显示美国科技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的央行利率调整。2015 年底美联储开始升息，但经济疲软，升到 2.5% 后停止并降息，而这次疫情冲击，一下降到零。这几乎是一个百年周期。

往未来看，因为经济进入严重衰退，经济慢复苏，中期内我们没有看到利率上升的可能。因为一旦利率上升，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会引起新一轮流动性紧张和债务危机，通常会触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的衰退。我们预测未来 5 年，美国经济继续低迷，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为了维护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稳定，美联储只能被迫继续购买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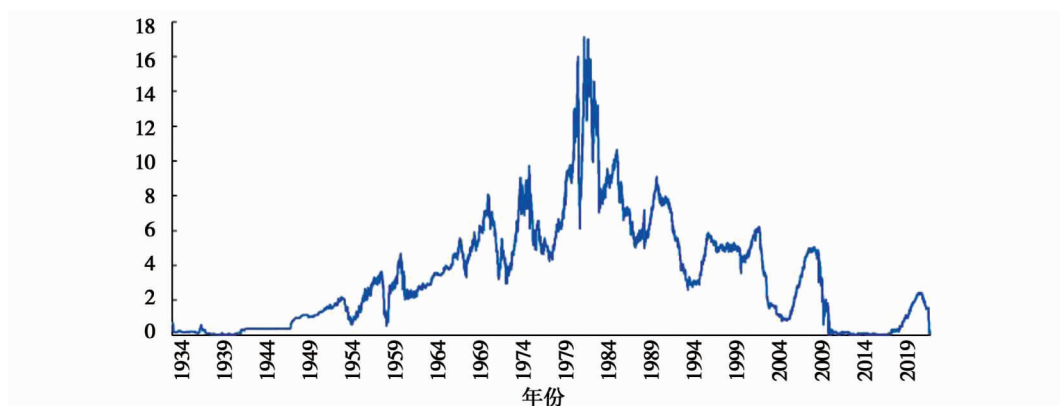


图9 1934—2020 年美国短期利率变化大周期

数据来源：美联储。

扩张资产负债表，并可能进入负利率。长期的零利率或负利率会在根本上改变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尤其是风险定价。负利率一旦产生，只会逐渐扩大。负利率带来负利率资产，目前全球已经有 18 万亿的金融资产在负利率区间，德国的 10 年和 2 年期的国债都有负利率，荷兰已经有居民住房贷款负利率。世界进入负利率时代，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进入负利率范围。

在主要以央行流动性支持下反弹的金融市场，形成市场和央行博弈的新格局。关于未来股市的走向，公司盈利和消费者信心都成为次要变量，央行是否有扩张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市场是否有能满足央行购买资质的金融资产成为最主要的因素。

三、经济：慢复苏和“日本式衰退”

2020 年 3 月以来，在疫情冲击下，全世界近 80% 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封闭措施来防控疫情。封闭措施和社交隔离对生产、消费和信心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活动突然进入停滞，瞬间冲击全球经济，全面进入严重衰退。

在需求侧，封城加上社交隔离导致消费突然中止，消费停滞，各国采取关停商铺、停止公共活动（电影院、体育场所和餐饮等）等措施，直接对服务业造成重创。我们估测，受疫情冲击，各国消费的静态损失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 个百分点以上。在供给侧，防控措施导致各地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受到了快速且严重的破坏。全球范围内的供需都受到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 GDP 收缩超 10%。经济损失波及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还是低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无一幸免。

疫情对经济冲击之强和速度之快都远超预期。2020 年 2 月疫情露出端倪，IMF 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0.1 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 3%。笔者在 3 月 19 日提出，综合数据和

模型，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全球贸易增长为 -15%，疫情的经济冲击将远远超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4 月 10 日 IMF 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全球贸易将萎缩 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 预测大流行病对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 GDP 的累计损失可达 9 万亿美元。6 月 4 日 IMF 进一步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 -4.9%，贸易下滑 11.9%（图 10）。同期世界银行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5.6%，贸易下滑 15%。疫情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在人流、物流和贸易流大幅停滞下，WTO 预测全球贸易在 2020 年下滑 15%~30%，远远大于 2009 年全年全球贸易下降 10.4% 的冲击。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 20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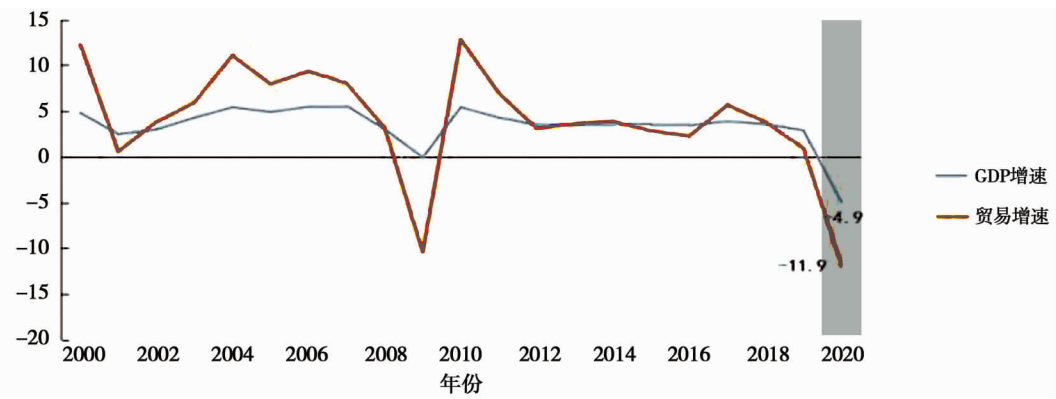


图 10 2000—2020 年全球 GDP 增速与贸易增速 (%)

数据来源：IMF。

注：阴影部分为预测值，GDP 增速为不变价 GDP 同比增速。

笔者在 IMF 工作时，有机会观察到多次国际和国家经济危机，发现通常一个典型的经济金融危机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阶段，第二是偿付危机阶段，第三是经济恢复和增长阶段。三个阶段也会交叉和重叠，但经济金融变化的特征和深层次问题是明显有区别的。本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刚刚渡过了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正在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通常也是企业破产的高峰阶段。

渡过了第一阶段的现金流危机阶段的冲击，企业仍然面临未来真实生存能力的挑战。在偿付能力阶段，企业有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危机，以及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下企业面临生产转型问题。如果是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问题，可以是企业技术性破产，通常可以通过财务重组解决。但如果是经济结构变化，企业无法适应市场、产品和行业变化产生

的经营困难，企业只有倒闭破产。美国现在发生的企业破产宗数已经超过了 2008 年整个金融危机时期的企业破产量。本次偿付危机的企业破产高峰预计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和 2021 年的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仍然难以预测。进入偿付危机阶段，取决于危机对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会有不同时间长度和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行业和产品结构变化引发的产业重组。在这个阶段，会有大批企业倒闭。政府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辨别企业是处于财务性困难还是结构性困难，是技术性破产还是“真破产”。在这个阶段，宏观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供给侧的政策组合，包括财政精准支持，产业政策指导，充分市场竞争政策等组合。

疫情的“长尾”和“肥尾”继续威胁实体经济复苏。首先，消费恢复缓慢，反弹滞后，总需求的下跌是直线的，但反弹却难以弥补损失的消费缺口。以美国 9.11 事件为例，美国航空、酒店和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5 年后才恢复到事件前的峰值。我国在 2003 年非典期间，在宏观刺激政策下，当年投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和贸易都在疫情结束后迅速并强劲反弹，当年 GDP 增长超过 2002 年的 9.15% 达到 10.02%，唯消费增长 7.35%，低于 2002 年的消费增长 8.06%。其次，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和产业链运转，大规模破坏总供给。历史数据显示，全球中小企业占 GDP 的比重 60% 以上和就业的 80% 以上，若持续停工超过 3~6 个月，30% 的中小企业将无法维持经营；若停工 6 个月以上，一半以上中小企业将会破产。疫情冲击下，电子产品、汽车、仪器和重工等全球重要产业链停滞，影响经济同样重大。再次，大规模的失业恢复非常困难。防控疫情期间，裁员和减薪给就业市场带来重创，失业率飙升。在美国，2020 年 3 月到 6 月期间就有超过 4000 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在欧洲，德国政府的特殊补贴计划下，隐含 450 万人失业。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掩盖了真实失业率。4000 万人的失业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要让 4000 万人重新回到就业岗位则非常不容易，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企业倒闭，原来的公司都不存在了，原来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整个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的失业率高居不下，需要长时间调整。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能力和有空间继续在第二阶段偿付危机阶段支持企业，并在第三阶段扩大投资规模支持经济复苏。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意大利 2008 年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为 106%，2019 年增长到 135%，IMF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155%；美国 2008 年政府负债占 GDP 比为 74%，2019 年增长到 109%，IMF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131%。各国政府高财政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欧洲债务危机后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目前欧

元区隔夜存款利率仅为 -0.5% ，几无货币政策空间。美国在 2007 年 9 月金融危机前联邦基金利率高达 5.25% ，为应对危机，美联储连续降息至 2008 年 12 月的 0% 至 0.25% 超低水平，累计下调超过 5 个百分点。而此次疫情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仅为 1.5% 至 1.75% ，仍处低位，可执行货币政策空间大幅缩减。

政府已经面临政策空间枯竭的困境。在流动性危机的第一阶段，为保障实体经济和居民不出现大规模破产和失业，维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各国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以减少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内的各主要央行放宽了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信贷向实体经济的流动。美联储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针对疫情紧急出台“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工具用到极致。财政救助方面，美国财政 3 轮救助计划总共提供约 2.5 万亿美元。欧洲出台了 7500 亿欧元的复兴计划和上万亿欧元的货币宽松。这些救助都已经逼近政府已有的政策空间极限。

2020—2022 年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抗疫和复工并存，居民担忧未来，会增加储蓄，使得储蓄率上升。在美国和欧洲，居民拿政府救济金存入银行不消费，使得消费持续下跌，储蓄率升到历史高点。同时因为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产业结构变动不确定，企业投资愿望急剧下降。我们同样观察到在美国已有的企业兼并项目被大批地取消，统计表明私人投资降到最低点。

所有这些预示，世界经济复苏将会是一个缓慢的弱过程。我们预测，世界经济在未来 5 年都会在低增长阶段。因为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美国和欧洲通货膨胀的预期非常悲观，未来通货膨胀率超过 1% 的概率较低。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负利率，美联储零利率。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步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如图 11 所示，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利率下降为 0，通货膨胀率在 0.7% 和负值之间波动，经济增长平均为 $0.5\% \sim 0.8\%$ 。主要的支撑点是政府不断地发行债券刺激和维持经济稳定，央行则不断地扩大资产负债表，不断地货币化财政赤字。这是日本模式，欧洲也已经在 2012 年欧元危机后进入这个格局。美国也在疫情推动下进入了这个状况。

四、展望：新趋势和新视角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我们看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构建新的思维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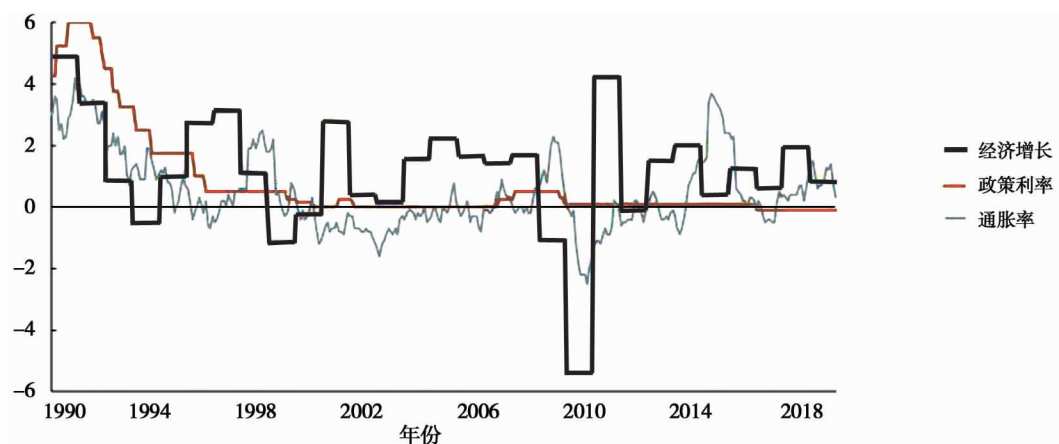


图 11 日本式衰退——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 (%)

数据来源：IMF、日本央行。

（一）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百年不遇的疫情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构建面向未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系统。

第一，建立智能化敏捷的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TTTT 系统），包括检测疑似病例（Test）、追踪确诊患者（Tracking）并追溯其接触者（contact Tracing），加上医疗系统的能力（Treatment）。从源头、传播途径和治疗三个维度遏制疫情，精准抗疫。第二，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增加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间的信息共享。第三，加快加强构设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疗体系，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完善地方流行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第四，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第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第六，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微观体系。

（二）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各国财政部及央行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来避免金融和经济崩溃，这些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迅速缓解了危机的流动性问题，稳住了市场和经济。

但财政和央行都跨过了传统的“红线”，进入新的领域，留下了影响今后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现实压力和制度挑战。

世界各国政府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发达经济体中，通过收入支持、扩大失业保险、工资补贴、工资津贴、税费退还及豁免实现的直接转移，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0%；同时，财政对过渡性融资，即企业延期缴纳所得税、个人税款及贷款，以及或有融资，包括股权注资和贷款提供担保等或有融资，占 GDP 的 30%。两者共计注入资金占 GDP 的 40%。IMF 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基本赤字将增加 GDP 的 8 个百分点。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公共债务将大幅增加。而更高的债务水平，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会给潜在的增长带来压力。

制度的挑战更为严峻。例如美国 2020 年政府债务迅速从占 GDP 的 100% 飙升到 130%，远远高于传统的共识 60% 的上限。因为经济低迷，政府债务还在继续上升，但是在零利率下，传统债务对 GDP 的比重已经不重要，因为虽然债务上升，政府的债务付息成本在下降。例如，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占 GDP 比重从 2007 年的 79% 在 2018 年上升到 100%，但同期政府付息成本占 GDP 的比重却从 2.8% 降到 1.8%。因为债务的可持续性主要看付息水平的可持续性，这样在零利率政策下，政府似乎可以继续并无限制地举债。新的政府债务和财政约束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利率水平上升呢？政府借债的市场新边界又在哪里？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国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行动，防止金融崩溃。一方面，央行使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稳定市场。先是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美联储还介入了市政债券市场。这样，央行进入了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在日本，为避免家庭、企业及市场的情绪急剧恶化，日本央行扩大了资产购买，包括购买日本国债、企业债，以及购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提供了高达 120 万亿日元的市场支持，约相当于日本 GDP 的 20%。

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下调了购买资产的信用级别，有时甚至低于投资级别。就美国而言，美联储向地方当局扩大了支持。大量流动资金以极快的速度注入市场，在短短几周内，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就大幅增长，大大超过了 2008 年至 2010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幅度。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的职能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央行在危机中履行了传统职责，即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通过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包括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等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能正常运作，继续提供信贷。但是，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还直接进入市场，成为“最后做市商”，在市场参与者争相出售资产以获取现金，市场做市商无法应对包括美债在内的长期资产供应激增时，购买了大量美债。另外，美联储还在财政部及国会的支持下，成为非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重启 2008 年危机时曾推出的商业票据和资产抵押证券融资机制，设立贷款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并购入企业债。当央行从“最后贷款人”到“最后做市商”时，是一个根本的职能变化，严重影响央行的独立性。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而且介入和“移动”市场，市场出现了新的市场和央行的“博弈”。最后，尽管央行采取了关键举措，但其影响仍有一个根本局限：央行能提供临时融资，但不能转移实际资源。

美日央行的上述种种做法是否会侵蚀央行独立性，是时下热议的问题，如果央行持续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政府则更容易发行政府债券，并将收入用于财政支出。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独立性是否有风险？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央行跨过了“红线”却是不争的事实。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退出更是现实的挑战。

（三）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

对新兴市场而言，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更加严峻。除了全球化面临威胁，全球价值链遭受破坏，防控措施导致各种经济活动受到影响，许多新兴市场还不得不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汇率下跌的困境。这些国家的侨汇收入是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其总额一直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总和，但在疫情中却急剧下滑。

在紧迫的形势下，新兴经济财政部门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支持卫生部门、家庭和公司。一些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扩大了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社会援助，为特定行业提供了补贴。但是，因为本国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新兴市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资源限制。初步估算，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财政转让约占 GDP 的 3%，或有融资也是相近的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刺激水平，新兴市场的降息幅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即便如此，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及财政赤字立即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并造成了资本流动的逆转。疫情危机的前 8 周就有近 1000 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新冠疫情造成的资本流动的跌幅，远超美联储在 2013 年 5 月 22 日暗示可能削减购债规模带来的“削减恐慌”以及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下跌总和。在巴西和波兰等国，外国直接投资变成了资本外流，套利交易发生了

逆转。本币债券的利差与外币债券的利差飙升。紧随其后的是债务评级被下调。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重新定价，导致新兴市场国内金融状况急剧收紧。

危机明显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能“尽一切能力挽救经济和金融”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国家和集团，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可以不断货币宽松。另一个是只能“尽一切能承担的成本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没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地位问题就这样具体而残酷地提到了世界的面前，构建公平、包容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提到了国际社会面前。

（四）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

反思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内在原因。美国在 2008 年的危机以前，美国劳动力的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每年增长 3% 降到了 2008 年左右低于 0.7%。特别是男性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从 90 年代开始下降了 4 个百分点。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最高的在 2000 年左右的 4% 降到了 2008 年的 2%。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恶化，从 1980 年开始，最高收入 1% 的家庭，累计的收入增长率达到了 280%，最低收入 20% 的家庭仅增长 25% 左右。这是危机前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但政府并没有察觉这些根本的结构变化，反而在政治上出台了社区住房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发展解决民众福利和公平，并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结果让已经在深处发生变化的、开始脆弱的经济面又选择了错误的新政策和导向。这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根本的重要原因。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到年增 0.8% 的水平，收入分配继续恶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收入 1% 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 12% 翻番上升到 24%，而 50% 的底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跌了一半，从 24% 掉到 12%。疫情是对全球经济最具有破坏性的一次冲击。疫情危机下，产业链被打断，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下滑。我们预测全球劳动生产率都将大幅下滑，连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滑落到 0.3% 左右。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恶化，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非白人民众的疫情感染率远远高于平均数，经济体中最脆弱的部分，即中小企业和非熟练工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发展中国家约 1 亿人口因为疫情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

我们预判，中期内经济缓慢增长，失业居高不下，央行零利率，股市继续高扬，经济结构改革步伐缓慢，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收入则继续偏向有资本的群体，收入差距

会进一步恶化。制定包容的经济金融政策，防止经济问题向社会和政治问题转化是疫情后经济金融最大的挑战。

（五）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疫情危机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政府反应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笔者在 IMF 工作时期观察到，危机中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关联系数及互动系数急剧上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实体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全球经济金融的联动是一个新的网状结构或板块结构，外部的冲击影响变得日益重要，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关联的结构的理解。我们观察到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危机初期并没有大量物资和资金的流动，但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和互动系数迅速地从 20% 左右上升到 90%；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增长的关联和互动系数也迅速地从不到 10% 上升到 76%。

世界经济金融的高度互动，是因为世界经济金融越来越多地成为以信心主导的经济金融活动。现代通讯技术发展，信息瞬间传遍全球，市场信心/情绪很容易在瞬间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成为一个新的以信心为基础，以信息传导为主导的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的全球经济金融。本次疫情危机中，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又一次急剧上升，全球经济波动、震荡、溢出、关联和互动达到新的高峰。疫情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冲击的速度和规模表明，当前各国独立的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边界已经被严重冲击，预案外部经济金融冲击、储备政策空间、加强国际沟通合作都是宏观经济金融管理的重要议题。而外部冲击的速度也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灵敏度和反应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疫情是一场完美风暴，它不但改变今天，也正在改变远方的地平线。未来正在我们眼前展现，但世界经济金融已变成市场和政策的博弈，不确定性陡增。在巨变的世界经济金融面前，我们唯有保持谦卑并认真观察，以从中捕捉机遇，化解风险。

责任编辑：谷 岳

· 国际经济 ·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与 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 *

王晓红 孟丽君 郭 霞

摘要：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及特征，刻画出该领域通过开放创新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主要包括：以吸引跨国投资为主导的起步时期，吸引跨国投资与信息技术外包双引擎的高速成长时期，规模实力增强与全面发展时期，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从 ICT 领域的发明专利、出口竞争力、RCA 指数等不同维度，论证了技术引进对于提升中国 ICT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最后，基于课题组对全国 160 家 ICT 服务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印证了技术贸易对 ICT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信息通信技术 服务贸易 创新能力 技术引进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孟丽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郭 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信息服务，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行业，^①包括由原材料供应、信息通信设备制造、通信技术服务与开发、电信运营商及其他终端客户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当

* 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课题《全球技术贸易的现状、发展前景及中国机遇》研究成果。课题组长：江小涓，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在研究期间，作者得到江小涓教授的多次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博士后谢兰兰也参与了研究，作者一并表示感谢。

①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16 年 12 月。

前，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ICT 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及产业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竞争最激烈的**关键性行业之一**，在各国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ICT 产业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ICT 行业通过开展技术引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的服务贸易，**高效组合全球信息技术创新资源**，成为 ICT 产业技术积累的主要来源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我国 ICT 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其发展路径与技术贸易密不可分。通过对这一行业的研究，对于理解一个产业如何通过技术贸易获得外溢效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典型意义。

一、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以吸引跨国投资为主导的起步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 2000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我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全球 ICT 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并通过引进技术、市场采购、设立研发中心、业务培训、外包服务等不同方式释放技术外溢效应，为我国 ICT 产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加快了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并为服务贸易迅速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1. 跨国公司成为我国 ICT 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20 世纪 80—90 年代，全球主要 ICT 企业先后进入中国市场，如阿尔卡特、富士通、西门子、爱立信、北方电信、摩托罗拉、朗讯、诺基亚等。我国很快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重要国际市场，2000 年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在华业务分别占其全球业务量的 13%、13% 和 10%。^① 2000 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计算机整机及外设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达 45.9 亿美元和 4 亿美元，移动电话和集成电路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达 2182 万美元和 9108 万美元。外资企业在我国 ICT 产业中占绝对主力，2000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外资企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65.39%。通过大力吸收跨国投资带动了我国 ICT 产业高速增长，1991—2000 年期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年均增速达 22.37%；截至 2000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累计设立外资企业 4440 家，实际利用外资额 265.36 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额约占整个行业的 80%。^② 其中，外资企业的移动电话产量占比

^①江小涓等：《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与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9～330 页。

^②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03》，商务部网站，2003 年。

77.45%，国内市场销售量占比 60.63%，出口量占比 98.98%。集成电路制造业累计设立外资企业 293 家，实际利用外资额 13.67 亿美元，外资企业国内销售额占比 51.5%。^①

2.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不断释放技术创新动能

ICT 跨国公司在制造业投资的同时逐步设立研发机构，以满足针对我国市场新产品开发的需求。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体系中地位不断升级。起初主要进行应用研究直接服务于本土市场，通过科研和生产一体化增强市场竞争力，后期则兼顾全球战略布局，从事基础研发的数量逐渐增加。我国不仅为跨国公司生产提供了巨大市场，而且为其研发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许多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中心升级，为区域或全球市场提供新技术。如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 1999 年升级为微软亚洲技术支持中心。二是技术创新成果丰硕。到 2000 年三资大中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拥有发明专利 248 项，占比 20.44%，为我国 ICT 产业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② 如自 1995 年以来，微软在华研发中心为我国市场提供了中文版的 Windows 95、Office 95、Windows 98、Office 97、Windows NT 3.51 和 4.0 版本等一系列软件产品；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完成近 100 项研发成果全部推向市场；朗讯中国贝尔实验室人均研究产出已经超过美国贝尔实验室。三是以本土科研人员为主。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除少量高级研究人员来自国外，大多数在国内招聘。在高薪和高福利吸引下，大批科研人员从国内科研机构、企业和大学加入跨国公司。如微软中国研究院的 60 位中国研究人员中，20 位研究员有海外留学背景，40 位副研究员大部分是中国各著名高校的博士。朗讯公司旗下贝尔实验室的 500 名科研人员中，96% 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③ 此外，随着跨国公司 ICT 制造业转移对本土化设计服务的需求增加，跨国公司继续转移设计服务。1990—1999 年期间，世界 500 强在华设计机构约 15 家，涵盖了通信、IC、软件、计算机、视听产品、家电等领域。^④

3. 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的主要方式

陈涛涛对 1999 年以前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以行业间溢出为主，本土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发生上下游产业链关联，接触和学习生产、管理和技术知识。^⑤ 一是直接技术转让。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本土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得技术，合资企业在跨国母公司的技术支持下迅速实现量产能力。二是本地化采购。为跨国

① 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03》，商务部网站，2003 年。

② 国家统计局、科技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佚名：《综述：外资研发中心中国遍地开花》，新浪网，2000 年 10 月 23 日。

④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2～54 页。

⑤ 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9 页。

公司提供配套服务成为许多本土企业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起点。为了使产品质量达到要求，跨国公司需要持续对本土配套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理念和技术培训，帮助本土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三是通过合作研发带动本土研发力量成长。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主要有设立独资研发机构，委托国内科研机构开发和联合开发三种形式。如摩托罗拉、诺基亚、朗讯、惠普等企业都与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四是人力资本外溢效应。跨国公司通过聘用本土员工、技术培训等方式为我国 ICT 产业培养了大批技术管理人才。许多在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工作的本土科研及管理人员日后“跳槽”，自己创立技术公司或加入本土企业。

4. 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本土 ICT 企业迅速成长

跨国公司在技术研发、规范、标准等方面具有显著示范作用，本土企业通过“干中学”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快速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以“巨、大、中、华”^①为代表的我国 ICT 企业在与外资同步成长中逐渐发展壮大。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内一批新锐企业，如北大方正、联想等效仿跨国公司设立了研发机构，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国内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专利迅速增长，1997—2000 年国内企业专利申请量年增长率分别为 5.44%、13.11%、38.13%、43.02%，而同期国外企业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分别为 23.52%、17.47%、5.65%、19.12%。^② 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1》显示，到 2000 年在大中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中，39.68% 设有研发机构，63.92% 开展技术研发活动，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为 11.82%，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等高端技术人员占 67.45%，在所有行业中最高。

5. 积极利用外资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催生了我国软件业

一方面，外资在我国软件业成长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2000 年，我国设立的外资软件企业从 159 家增至 1065 家，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5213 万美元增加到 3.6 亿美元。外资软件企业的技术优势主要集中在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等高端领域，许多本土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共同研发技术和承接项目，提升了业务能力和软件产品层次。如东软先后与日本阿尔派（ALPINE）株式会社、东芝和飞利浦成立合资公司，海辉软件与日本 JBCC 株式会社组建 JBDC 株式会社等。另一方面，承接国际外包业务对于本土软件企业在技术、知识、渠道、品牌、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促进效应，使许多本土软件企业“淘到第一桶金”，由小规模、封闭式经营逐渐进入规模化、国际化发展阶段。如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软与日本电气开展研发合作后逐步发展软件出口，2000 年出口额达 720

^①指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企业。

^②信息产业部：《2006 年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报告》，《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0 期。

万美元。^① 东软 1994 年与日本 ALPINE 株式会社合作，承接汽车辅助软件开发和车内主要软件开发。文思信息 1995 年成立之后，先后与国际商业机器（IBM）、微软建立长期合作关系，1998 年为惠普、甲骨文和硅图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博彦科技 1995 年成立之初就承接了微软 Windows 95 操作系统的本地化和测试项目，1998 年开始进行惠普的多语言测试项目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软件产业保持每年 20% 以上的高速增长。2000 年软件业收入总额 593 亿元：其中，国内软件产品销售额 238 亿元，软件服务收入 322 亿元，软件出口额 33 亿元。虽然在全球软件业中占比仅为 1.2%，但已经形成一个崭新的产业。2000 年我国从事软件研发和销售的企业约 5000 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的软件企业约 60 家，其中 10 亿元以上 6 家。^②

（二）吸引跨国投资与信息技术外包双引擎的高速成长时期（2001—2010 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 ICT 服务贸易成长最快的时期。我国加入 WTO 加快了电信业等服务业开放步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 ICT 企业来华投资，外资研发机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我国本土 ICT 企业的规模和技术能力持续提升，推动 ICT 设备制造企业向技术服务型企业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承接国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促进了 ICT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1. ICT 服务贸易呈现高速成长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2001—2010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速达 29.7%，2010 年 ICT 服务进出口额为 145.8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10.4 倍。从出口看，2001—2010 年我国 ICT 服务出口年均增速为 34.4%，2010 年 ICT 服务出口额 104.8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14.4 倍，占我国服务出口额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2.2% 上升至 5.9%。从进口看，2001—2010 年我国 ICT 服务进口年均增速 22.3%，2010 年 ICT 服务进口额为 41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6.1 倍，占我国服务进口额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1.7% 上升至 2.1%。从进出口差额看，2001—2010 年期间，除 2002 年出现逆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顺差，2005 年之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2010 年贸易顺差达 63.7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106.2 倍。这一时期，ICT 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 12.1 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 ICT 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提升。

2. 外商投资仍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一，跨国公司对 ICT 领域投资保持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设立离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母公司或第三方提供服务。2006 年在我国软件与相关服务业中外商

^①本刊专题组：《出口实绩——软件出口企业调查实录》，《软件世界》2001 年第 11 期，第 62～79 页。

^②佚名：《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周锡令教授谈我国软件产业现状与发展》，《中国信息导报》2001 年第 12 期，第 59～60 页。

独资企业占 50% 以上，2010 年我国软件与相关服务业中的外资企业达 1846 家，其软件及服务收入达 2773 亿元，相当于 2006 年的 2.4 倍。^① 截至 2001 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我国 ICT 产业的投资累计 105 亿美元，2001—2010 年美资对华 ICT 产业的直接投资额基本稳定在年均 16 亿美元左右，10 年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164.9 亿美元。^② 微软从 2003 年起先后与中软、创智、神州数码、浪潮等签约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大规模在我国市场布局。

第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技术水平继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且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三星集团自 2000 年成立北京通信研究院之后，2005 年在南京、苏州和上海设立研发机构，不断扩大研发力量，研究人员超过 2000 人。三星公司的目标是将我国建成三星集团第二个全球研发基地，因而不断强化研发本土化以扩大中国市场，2010 年三星电子在我国的营业额达到 396 亿美元，占其全球市场份额的 29%。又如爱立信制定 2001—2005 年在华发展计划，着力从高科技投资、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及研发和人力资源四个领域提高投资。自 2000 年起爱立信在我国的研发投入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2002 年设立的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逐步成为爱立信全球的研发中枢之一，2004 年爱立信将在中国研发的 3G/WCDMA 基站运往欧洲市场。

第三，与跨国公司合作促进本土企业成长。本土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获得了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网络，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之中。如浪潮、东软等软件公司与甲骨文、英特尔是合作伙伴。2006 年浙大网新与道富集团合作开拓欧美金融外包市场，道富集团通过合作获得网新恒宇公司 90% 的股权，网新则承接了道富集团一系列核心技术平台系统和外包订单业务。

3. 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推动软件出口大幅增长

2001 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促进软件外包发展的一系列政策，^③ 2001—2010 年信息技术外包实现高速发展。2001—2005 年我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 52.1%，奠定了服务外包产业起步期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并形成了一批规模效应明显的软件

①数据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软件篇）200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软件篇）2010》。

②数据来源：荣鼎公司。

③2000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 号）（简称 18 号文件）；2001 年国家六部委出台《关于软件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 680 号文件）；200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九部门联合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 年至 2005 年）》（简称 47 号文件）；2007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 号），文件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其他相关文件还有：《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 号），《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 号），《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 号）等。国家部委相关政策有：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财企〔2008〕32 号），2006 年商务部组织实施“千百十工程”等。

园。2008—2010 年信息技术外包（ITO）在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中占比平均为 65%。国内软件外包企业迅速成长，2001 年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大多是一二百人的规模，经过 10 年左右发展，文思创新、博彦科技、中软国际和软通动力等一批领军企业已经达到万人规模，并陆续在纽交所、纳斯达克、港交所和国内上市。这些企业通过为微软、IBM、日电、富士通等跨国公司提供软件外包服务，搭建起国际桥梁，逐渐走进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市场。据工信部统计，2010 年我国软件外包企业约 5900 家，产业规模达 2750 亿元，其中国际业务收入为 2381.2 亿元。截至 2010 年服务外包企业共获得六类国际资质认证达 2810 个。2001 年在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认证中，全国仅有近 20 家企业通过 CMM2 以上的认证。截至 2010 年，全国通过 CMM3 级以上评估的企业已达 700 多家。^①承接国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带动了我国软件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商务部数据，2010 年我国软件出口额达到 97.3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19460 倍，2003—2010 年期间年均增长 310%。

4. 我国 ICT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起步

随着我国 ICT 企业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并购和境外上市等方式加快“走出去”步伐。2010 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 5.06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56.2 倍，2003—2010 年的年均增速为 78%，高出同期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平均增速 20 个百分点。2010 年我国软件企业有 11 家在境外上市，融资金额 13.17 亿美元，有 8 起跨境并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几家大型基础电信运营商通过在海外设立分公司、研发中心及跨国收购等方式“走出去”，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拥有电信相关的运营牌照，通过并购和合资进入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非洲等国家（地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如 2008 年 263 公司收购美国第三大网络电话运营商 iTalk 进军美国 VoIP^② 市场，2009 年阿里巴巴斥资 3 亿美元，打造“全球速卖通”平台。

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规模 and 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2010 年我国软件产业收入达 13588 亿元，是 2001 年的 18.1 倍；在世界软件业的占比达 18%，较 2001 年增加 16.5 个百分点（图 1）；从业人数由不到 30 万人增加到 200 多万人。2001—2010 年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由 6948 件增至 81966 件，年均增速

^①具体为：60 多家软件企业获得 CMM5（含 CMMI5）级别评估，40 多家企业获得 CMM4（含 CMMI4）级别评估，600 多家软件企业获得了 CMM3（含 CMMI3）级别以上评估。

^②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即将模拟声音信号数字化，以数据封包的形式在 IP 网络上实时传递，简言之就是网络电话。

达 31.5%（图 2）。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持续积累扩大。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0 年 6 月与信息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 111.8 万件，占各工业行业^①专利申请总量的 35.8%；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76.6 万件和 35.2 万件，分别占各工业行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申请总量的 45.4%和 24.5%。信息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比重达到 69%，高于各工业行业发明专利申请比重 15 个百分点，表明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活跃度和创新能力领先于其他行业。^② 从 ICT 行业内部看，电信业一直是《专利合作条约》（PCT）中申请比例最大的行业，2010 年全球 PCT 专利申请前 10 名企业中，中兴、华为分列第二、第四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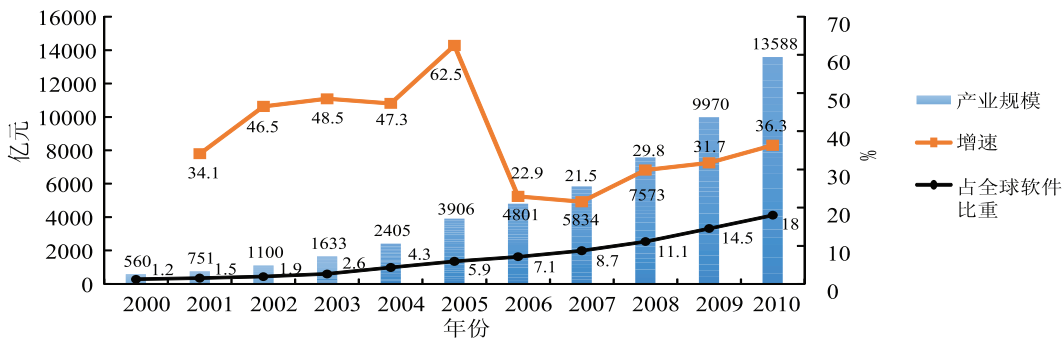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0 年我国软件产业规模、增速及占世界软件产业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软件篇）2010》《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 2005—2006》《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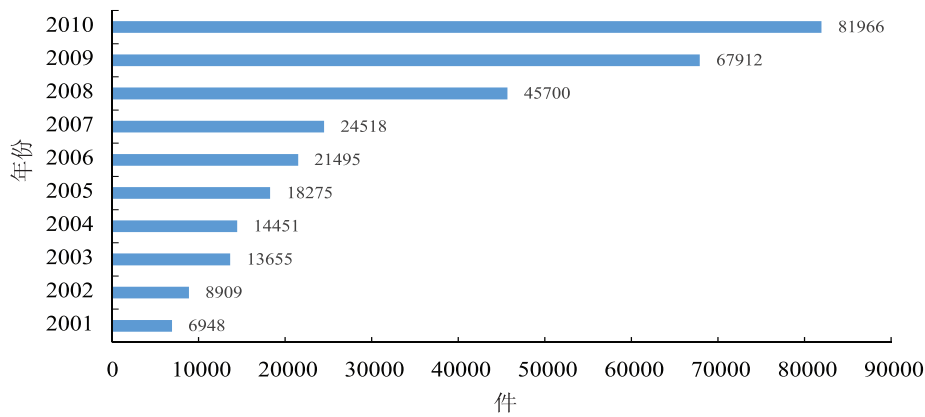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0 年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件）

数据来源：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国家版权局。

①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轻工、石化、钢铁、汽车、纺织、船舶和有色金属行业。
②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2010 年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报告》，《电子知识产权》2010 年第 12 期。

（三）规模实力增强与全面发展时期（2011—2015 年）

“十二五”时期，我国 ICT 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增长，规模化、创新化、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深入发展为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带来创新突破、应用深化、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同时，2011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的印发，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造了有利环境。ICT 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国际并购等方式快速扩大规模并加快国际化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

1. ICT 服务贸易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

2011—2015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从 189.43 亿美元增加到 370.14 亿美元，年均增速 18.23%，占服务贸易总额比重由 4.22% 增长到 5.66%。从 ICT 服务出口看，2011—2015 年我国 ICT 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速 16.69%，占全球比重由 3.78% 上升到 5.83%；2015 年 ICT 服务出口额为 257.84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11.06 倍，在我国服务出口中的占比由 6.91% 上升到 11.79%。从 ICT 服务进口看，2011—2015 年我国 ICT 服务进口年均增速 22.21%，高于出口增速 5.52 个百分点。2015 年 ICT 服务进口额达 112.30 亿美元，是 2011 年的 2.23 倍，占服务进口总额比重为 2.58%。我国 ICT 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也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2015 年顺差达 145.54 亿美元，是 2011 年的 1.64 倍。

2. 软件出口规模实力明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第一，软件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且具备较强内生增长动力。2011—2015 年我国软件出口年均增速达 23.53%，2015 年软件出口执行金额为 333.93 亿美元，相当于 2011 年的 2.33 倍。软件出口主体结构已经由外资企业主导向内资企业主导转变。2012—2015 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合计占总额比重分别为 36.59%、37.12%、41.26%、71.29%。内资企业对软件出口的贡献度明显上升，标志着我国软件业发展已经形成内生增长主导模式。软件出口市场已经形成覆盖全球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015 年我国软件出口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前 10 位的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芬兰、英国、德国、瑞典。

第二，离岸信息技术外包保持高位增速且逐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我国软件出口始终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为主导。2011—2015 年信息技术外包出口执行金额从 138.7 亿美元增加到 316.8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22.94%，占软件出口的平均比重为 96.85%。这一时期的信息技术外包呈现出价值链、附加值明显提升的特点。2014 年在 ITO 离岸业务中，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执行金额占比最大为 41.0%，其余依次是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占比分别为 27.3%、11.5%，其中集成电路设计增速高达 100.8%。

2015 年软件研发外包在 ITO 领域中占比上升为 68.8%，全年完成离岸合同执行金额 217.9 亿美元，在 ITO 离岸业务中占主导地位；其次是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第三，信息技术企业的实力明显增强。2015 年我国软件前百家企业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6005 亿元，占全行业收入的 14%，同比增长 13.1%；实现利润总额 1524 亿元，同比增长 48.2%。其中，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共有 55 家，软件业务收入占前百强的 60.7%。软件业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共有 7 家，其中京东尚科、科大讯飞、金山软件、华讯方舟、阿里云软件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79%、73%、69%、68%、63%。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不断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通过国际并购、国内重组和上市融资不断获取核心技术，壮大规模实力，逐步由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提供单一技术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由承接单一项目向与发包方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转变。如东软、博彦科技、海隆软件、浙大网新等 10 家企业在 A 股上市，软通动力、文思信息技术、中软国际、海辉软件 4 家企业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这一时期软件外包业发生了多起并购案。如文思信息技术与海辉软件合并成为我国最大的离岸 IT 服务供应商，博彦科技收购美国大展集团旗下 6 家子公司等。通过并购重组企业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获得了研发团队和客户资源，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球业务拓展能力。一批企业已经逐步从提供应用程序开发、测试业务等服务向提供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转型，并且通过并购方式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构建全球业务网络。

第四，技术创新能力和人才素质显著提升。一方面，企业外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增长。2011—2015 年 ICT 企业外部 R&D 经费支出由 35.14 亿元增加到 93.29 亿元，增长了 1.7 倍，年均增长率为 27.65%，在工业企业外部 R&D 经费支出中的占比从 9.88% 上升为 17.93%；同期，企业内部 R&D 经费支出从 941.05 亿元增加到 1611.68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4.4%。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 2015 年增长至 292360 件，是 2011 年的 2.67 倍，年均增速达 27.87%。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量分别从 2011 年的 7189 件、40980 件和 62159 件增加到 2015 年的 100785 件、60533 件和 170387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93.5%、10.24% 和 28.67%。我国软件从业人数由 2010 年的 260.3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781.5 万人，年均增长 24.6%，成为吸纳就业增长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98%，30 岁以下从业人员占 78%。从就业分布的行业看，除 IT 领域占 35% 之外，制造、交通、教育、电信、金融等领域的软件从业人数占比超过 48%，反映出软件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越来越强，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增强。2015 年软件百强企业研发人员共 55 万人，占

总人数比重达 54%。根据 2015 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中国银行业 IT 解决方案市场 2015—2019 预测与分析》数据显示，美国软件开发人员数量在全球占比为 19.2%，中国、印度分别列第二、第三位，占 10.1%、9.8%。

3. ICT 行业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利用外资保持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 ICT 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一批有实力的软件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2015 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 68.20 亿美元，较 2011 年增长 8.8 倍，较 2007 年增长 22.4 倍，2011—2015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72.16%，在全部对外投资额中占比由 1.04% 上升为 4.68%。企业在海外融资、并购、设立研发中心等活动明显增多。2015 年蚂蚁金服收购印度支付服务企业 One97 25% 的股权，同年阿里与蚂蚁金服投资印度电商 Paytm，成为其最大股东。中兴通讯、京东加快在俄罗斯、印尼、印度、巴西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布局。华为在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

与此同时，ICT 服务业利用外资保持稳步发展。2011—2015 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 26.99 亿美元增加到 38.36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9.19%，远高于 2.14% 的同期整体增速，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占比由 2.33% 上升为 3.04%。外资企业仍是 ICT 行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2016》数据显示，在全部外资工业企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最高，2015 年该领域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73607 人年、内部研发经费支出 2696888 万元、研发机构 875 个、专利申请数 17554 项，分别占当年全部外资工业企业的 22.4%、19.9%、14.0% 和 27.9%。值得关注的是，外资 ICT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占比高达 66.4%，高于内资 ICT 企业 58.4% 的占比。

（四）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时期（2016 年至今）

进入“十三五”以来，我国 ICT 服务贸易实现量质齐增，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ICT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大幅跃升，涌现出华为、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领先的 ICT 企业，以及 5G、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国际领先技术。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不断迈向价值链高端，软件出口市场日益多元化，规模实力显著提升。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引擎，“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发展，组合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更加突出，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1. ICT 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2016—2019 年期间我国 ICT 服务贸易额由 391.1 亿美元增至 807.6 亿美元，年均增

速达 27.34%，占服务贸易总额比重提升到 10.9%。从服务出口看，2016—2019 年 ICT 服务出口年均增速达 26.62%，占我国服务出口额的比重由 12.7% 上升到 22.3%；全球占比由 2016 年的 5.8% 增至 2018 年的 8.3%，仅次于印度（10.19%），成为全球 ICT 服务第二大出口国。2019 年 ICT 服务出口额 538.6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 2 倍。从服务进口看，2016—2019 年我国 ICT 服务进口年均增速高达 28.83%，反映出技术进口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2019 年 ICT 服务进口额达 269.0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 2.1 倍，占我国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5.4%。从长周期看，我国 ICT 服务贸易基本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2005—2019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额增长了 17.7 倍，年均增速达 22.8%，其中出口额增长 22.1 倍，年均增速 25.1%；进口额增长 11.1 倍，年均增速 19.5%。ICT 服务贸易顺差是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2019 年顺差达 269.6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近 2 倍，是 2005 年的 245 倍。由此表明，我国 ICT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提升，对于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和改善贸易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表 1、图 3）。2020 年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服务出口增速下降 7.3%，ICT 服务出口仍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10.9%，体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表 1 2001—2019 年我国 ICT 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顺差	出口占全球 ICT 出口的比重	出口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	进口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
2001	7.30	6.70	0.60	—	2.20	1.70
2002	11.90	16.00	− 4.10	—	3.00	3.50
2003	17.40	14.70	2.70	—	3.80	2.70
2004	20.80	17.20	3.60	—	3.30	2.40
2005	23.30	22.20	1.10	1.33	2.80	2.65
2006	36.96	25.03	11.93	1.80	3.93	2.48
2007	55.19	32.90	22.30	2.20	4.40	2.55
2008	78.22	46.75	31.47	2.61	5.38	2.99
2009	77.10	44.42	32.68	2.68	6.29	3.04
2010	104.76	41.03	63.74	3.34	5.87	2.12
2011	139.08	50.35	88.74	3.78	6.92	2.03
2012	162.47	54.90	107.57	4.23	8.06	1.95
2013	170.98	76.24	94.74	4.14	8.26	2.31
2014	201.73	107.48	94.25	4.58	9.21	2.48

续表 1

年度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顺差	出口占全球 ICT 出口的比重	出口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	进口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
2015	257.84	112.30	145.54	5.83	11.79	2.58
2016	265.31	125.79	139.53	5.79	12.66	2.78
2017	277.67	191.76	85.91	5.61	12.17	4.10
2018	470.58	237.70	232.88	8.28	17.64	4.53
2019	538.60	269.00	269.60	—	22.26	5.36

数据来源：商务部、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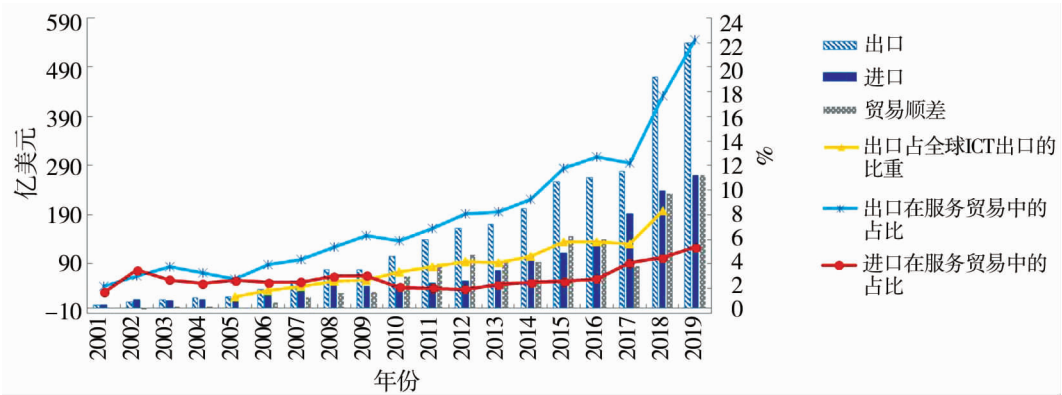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19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UNCTAD 数据库。

2. 软件出口整体规模实力明显增强

第一，软件业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价值链持续向高端跃升。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全球 193 个国家和地区，除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等传统出口目的地外，对“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出口规模和增速稳步提升。2019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执行金额达 69.3 亿美元，占比由 2012 年的 13.8%提高至 15.9%。2016—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执行金额由 342.30 亿美元提高至 434.81 亿美元，年均增速 8.3%，仍是一个较高增速。尤其是结构不断向高端业务发展。2019 年信息技术外包出口执行金额为 426.82 亿美元，在软件出口中占比 98.16%，其中信息技术研发外包、运营和维护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三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343.59 亿美元、71.32 亿美元和 11.53 亿美元，占信息技术外包总额比重分别为 80.5%、16.71%和 2.70%。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我国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尽管该部分目前占比不高，但发展势头迅猛，2019 年同比增长

154.53%，合同数、协议金额分别增长 3309.38%、201.39%，将成为我国未来软件出口的重要增长点。在信息技术研发外包中，软件研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及测试服务占比较高，2019 年上述三项出口执行金额分别为 229.31 亿美元、51.23 亿美元和 30.84 亿美元，分别占信息技术研发外包的 66.74%、14.91%和 8.98%。从长周期看，2003—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年均增速为 104%，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额分别是 2010 年和 2003 年的 4.47 倍和 86962 倍（图 4、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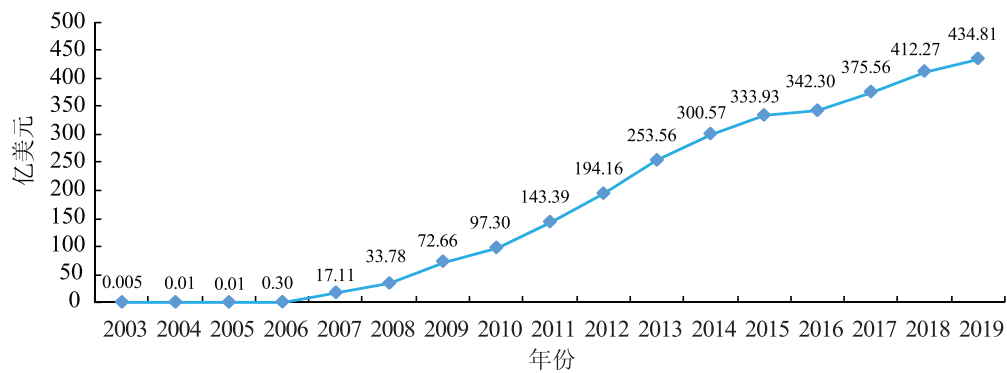


图 4 2003—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额

数据来源：商务部。

表 2 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分类情况 单位：万美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同比	协议金额	同比	执行金额	同比
总计	57945	- 6.33	6040831.61	7.70	4348133.17	5.47
信息技术外包（ITO）	54208	- 5.60	5886944.03	8.02	4268214.94	6.36
信息技术研发服务	46637	- 8.85	4767666.20	11.31	3435943.25	- 0.14
软件研发服务	36256	- 7.34	3008950.17	- 0.24	2293107.26	- 9.23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	5417	- 5.15	646691.03	22.56	512314.88	7.70
测试服务	1664	6.80	388373.89	32.84	308429.62	71.32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898	58.38	145242.39	76.01	107266.64	48.46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	1137	40.72	119531.68	158.78	55949.74	34.47
其他信息技术研发服务	1265	- 62.68	458877.05	44.17	158875.10	9.67
运营和维护服务	6480	4.16	969773.86	- 13.46	713154.67	36.24
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	5789	- 1.16	914820.91	- 2.41	673630.05	33.42
网络与信息安全服务	89	-	4044.06	-	3662.64	-
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	602	65.38	50908.88	- 72.20	35861.99	93.17

续表 2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同比	协议金额	同比	执行金额	同比
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	1091	3309.38	137752.35	201.39	115294.92	154.53
云计算服务	56	75.00	8644.92	-81.09	6547.99	-85.54
人工智能服务	94	-	23988.71	-	7600.84	-
区块链技术服务	926	-	103759.01	-	100930.80	-
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	15	-	1359.72	-	215.28	-
软件产品	3737	-15.76	153887.58	-3.22	79918.23	-27.10
系统软件	576	-40.74	12866.62	-52.81	10673.42	-48.74
应用软件	3141	-8.05	140678.67	20.64	67852.91	-17.71
支撑软件	20	-58.33	342.29	-97.74	1391.91	-78.05

数据来源：商务部。

第二，内资企业保持主导地位，民营企业成为软件出口的主力军。2019 年内资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额 225.57 亿美元，占比 51.88%，较 2016 年提升 3.8 个百分点。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 49.4%；外资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额 169.58 亿美元，占比 39%，较 2016 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软件业出现由外资主导向内资主导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体现出通过长期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已经形成内生增长的产业发展格局（表 3）。

表 3 2016—2019 年我国软件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亿美元，%

企业性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执行金额	占比	执行金额	占比	执行金额	占比	执行金额	占比
全国	342.30	100	375.56	100	412.27	100	434.81	100
内资企业	164.43	48.04	229.75	61.18	250.06	60.65	225.57	51.88
港澳台投资企业	41.23	12.05	32.13	8.55	33.72	8.18	39.84	9.16
外商投资企业	138.86	40.57	112.63	29.99	142.77	34.63	169.58	39.00

数据来源：商务部。

第三，经济效益保持较快增长，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16—2019 年全国软件业务收入从 48232 亿元增长到 71768 亿元，年均增长 14.2%；从业人数从 586 万人增长到 2019 年的 673 万人，年均增长 4.7%。2016—2019 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从 40.78 万件增加到 148.44 万件，年均增长高达 53.8%。其中，2019 年教育、医疗、物联网、信息安全等

软件类别登记增幅均超过 35%，高于整体增速。5G 软件登记数量增长幅度达 681.88%，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软件类别之一。

3. 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贸易表现优异

我国 ICT 服务出口结构不断改善，基本形成了软件、集成电路、电商平台、云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服务出口多元化格局。2020 年一季度在遭遇新冠疫情，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增速下降 7.6% 的情况下，ITO 中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云计算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数字服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213.6%、16.2% 和 14.5%。Synergy 报告显示，我国云提供商拥有亚太地区公共云市场 40% 的份额，其中阿里云 2019 年营收 52 亿美元，增长 63.8%，全球市场份额占比 4.9%，在 Canalys 发布的 2019 年全球云市场排名中列第四位，仅次于亚马逊云、微软云、谷歌云。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统计，2018 年我国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交易额超过 4900 亿元，同比增长 55%，预计到 2020 年第三方跨境支付行业规模将突破万亿元。移动应用数据和分析平台 App Annie 公布 2019 年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前 10 名的 App 中，支付宝成为非社交类 App 第一名。2019 年支付宝的全球用户超过 10 亿，目前全球 54 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支付宝消费。2019 年微信支付覆盖 60 个国家和地区，支持 16 种不同货币直接结算。2019 年上半年全球区块链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前 10 名企业中有 7 家企业来自中国，其中，阿里、中国平安分别以 322 件、274 件专利排名第一、第二位，前 100 名企业中我国占 67%、美国占 16%。^① 截至 2019 年我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量累计 7 万件，居全球第一位。其中，北斗系统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相关产品和服务已输出到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车辆船舶监管、智慧港口等解决方案，已经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得到应用。

4. ICT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

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 ICT 服务企业，这些企业逐步由单纯的硬件设备制造商向软硬件一体化的服务型制造商转型，尤其是软件企业不断拓展融合应用，加强产业链协作，整合上下游和跨领域资源，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日益突出。《财富》杂志发布的 2019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全球共有 55 家 ICT 企业上榜，中国与美国并列第一，各有 17 家企业上榜。^② 2020 年 1 月工信部发布的《2019 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软件百强企业共完成

^①知识产权产业媒体 IPRdaily 与 incoPat 创新指数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 年上半年全球区块链企业发明专利排行榜 (TOP100)”。

^②中国企业含台企。

软件业务收入 8212 亿元，增长 6.5%，其中 1/3 以上的企业收入增长超 20%，华为、阿里、百度、腾讯、中通、海尔、京东、中兴、浪潮、中软排名前 10 位。2019 软件百强企业 R&D 投入强度均超过 10%，研发人员合计 67 万人，占从业人员比重超过 6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 13 万件，同比增长 50% 以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开源软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正在加速拓展。如华为、阿里、浪潮、用友等企业纷纷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方面，软件业正加速与传统产业融合，另一方面，制造企业的信息技术能力快速提升。如海尔、大疆、大族激光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也跻身前 30 位，标志着这些制造企业已经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型制造升级。

5. ICT 服务业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双向发展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市场，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的应用场景丰富。同时，我国不断完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持续优化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使 ICT 产业依旧成为外资青睐的主要领域。2018 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 116.6 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 8.64%，相当于 2004 年的 12.7 倍，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第一大领域（表 4）。2020 年 4 月，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与里昂商学院联合发布《中国 ICT 产业营商环境白皮书》显示，2018 年 ICT 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总额 2570 亿美元，2004—2018 年 ICT 外资企业在华收入规模扩大 360% 以上，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年复合增长率达 23.7%，高于电子信息制造业 13.3 个百分点。苹果、英特尔、诺基亚三家企业在华收入近五年涨幅均超过 50%。

在对外投资方面。《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外投资 56.3 亿美元，居各行业第五位，同比增长 27.1%，占当年流量的 3.9%（表 4）；截至 2018 年该领域境外企业 2393 家，占我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5.6%。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通信业对外投资的主力军。《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2019》显示，截至 2018 年中国电信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达 13.72 亿美元，中国移动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网络建设累计投资 98 亿港元。华为、中兴广泛参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电信网络设备、IT 设备和解决方案及智能终端应用于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 50%，华为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超过 16 个。中国通信服务公司在 43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机构，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刚果（金）、沙特、缅甸等国家和地区拓展 20 多个总包项目，合同总额超 10 亿美元。阿里巴巴在全球推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建设，促进普惠贸易发展，支持全球 80% 的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表 4 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占比

单位：万美元，%

年度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占比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占比
2003	5350500	—	—	285465	883	0.31
2004	6063000	91609	1.51	549799	3050	0.55
2005	6032500	101454	1.68	1226117	1479	0.12
2006	6582100	107049	1.63	2116396	4802	0.23
2007	7476800	148524	1.99	2650609	30384	1.15
2008	9239500	277479	3.00	5590717	29875	0.53
2009	9003300	224694	2.50	5652899	27813	0.49
2010	10573500	248667	2.35	6881131	50612	0.74
2011	11601100	269918	2.33	7465404	77646	1.04
2012	11171600	335809	3.01	8780353	124014	1.41
2013	11758600	288056	2.45	10784371	140088	1.30
2014	11956200	275511	2.30	12311986	316965	2.57
2015	12626700	383556	3.04	14566715	682037	4.68
2016	12600100	844249	6.70	19614943	1866022	9.51
2017	13103500	2091861	15.96	15828830	443024	2.80
2018	13496589	1166127	8.64	14303731	563187	3.94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二、技术引进对于提升

我国 ICT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ICT 是我国技术引进最高的领域之一。据《中国科技年鉴》统计，2010—2018 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技术引进费排名除 2010、2011、2016 年列第三位外，其余年份均列第二位。^① 2009—2018 年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

^①2010—2018 年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技术引进金额分别是 12.71 亿美元（第三位）、11.64 亿美元（第三位）、11.57 亿美元（第二位）、27.16 亿美元（第二位）、18.37 亿美元（第二位）、14.8 亿美元（第二位）、10.12 亿美元（第三位）、10.26 亿美元（第二位）、16.15 亿美元（第二位）。

费排名除 2009、2011 年列第三位外，其余均列第二位。^① 以下从发明专利增长、出口竞争力两个维度进行衡量，说明技术引进对于促进 ICT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一）技术引进对于促进 ICT 领域发明专利增长具有明显正向作用

第一，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看。2001—2018 年该领域发明专利申请量由 980 件增至 100216 件，年均增速为 31.29%；有效发明专利量由 939 件增至 300369 件，年均增速达 40.40%。其中，2018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量相当于 2010 年的 7.3 倍、2001 年的近 320 倍。第二，从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领域看。2001—2019 年该领域发明专利申请量由 1176 件增至 23620 件，年均增速为 18.1%；发明专利授权量由零增至 11521 件，2002—2019 年的平均增速达 73.3%。其中，2019 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相当于 2010 年的 1.7 倍、2002 年的 11521 倍。第三，从计算机软件领域看。2001—2019 年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平均增速达 34.7%，2001 年仅为 6948 件，2010 年达 8.19 万件，2019 年增至 148.44 万件。2019 年的登记数量相当于 2010 年的 18.1 倍、2001 年的 213.6 倍（图 5）。第四，从计算机技术海外专利授权量看。2003—2018 年计算机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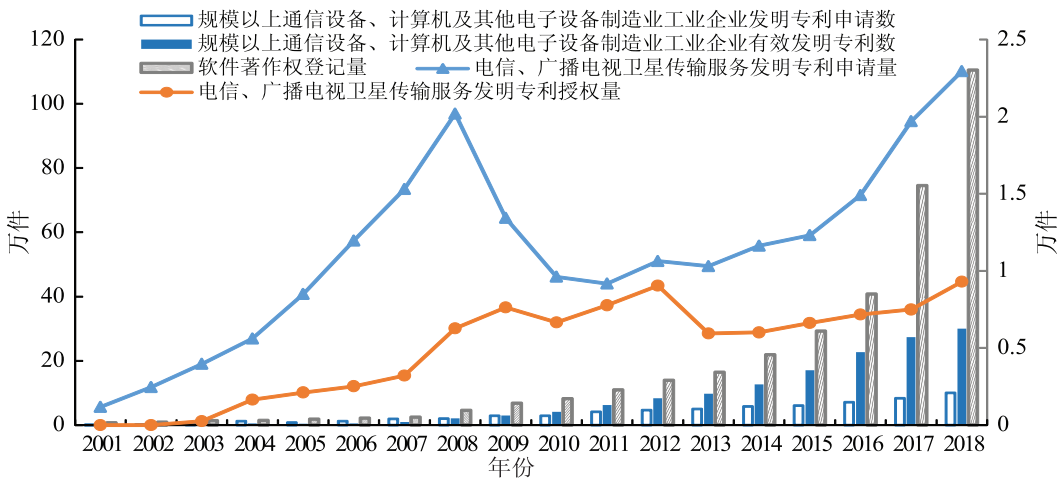


图 5 2001—2018 年我国 ICT 制造业和电信、广电卫星传输服务的发明专利数量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

数据来源：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量来源于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主要依据《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2018）》的分类方法检索分类。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来源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国家版权局。

注：图 5 中左纵轴刻度：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企业、软件著作权专利数量；右纵轴刻度：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专利数量。

^①2009—2018 年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费及排名分别是 54.57 亿元（第三位）、49.46 亿元（第二位）、54.91 亿元（第三位）、56.94 亿元（第二位）、37.21 亿元（第二位）、43.17 亿元（第二位）、57.73 亿元（第二位）、84.27 亿元（第二位）、48.48 亿元（第二位）、113.75 亿元（第二位）。

术的海外专利授权量由 27 件增至 3553 件，年均增速达 38.4%。2018 年计算机技术的海外专利授权量相当于 2010 年的 7 倍、2003 年的 131.6 倍（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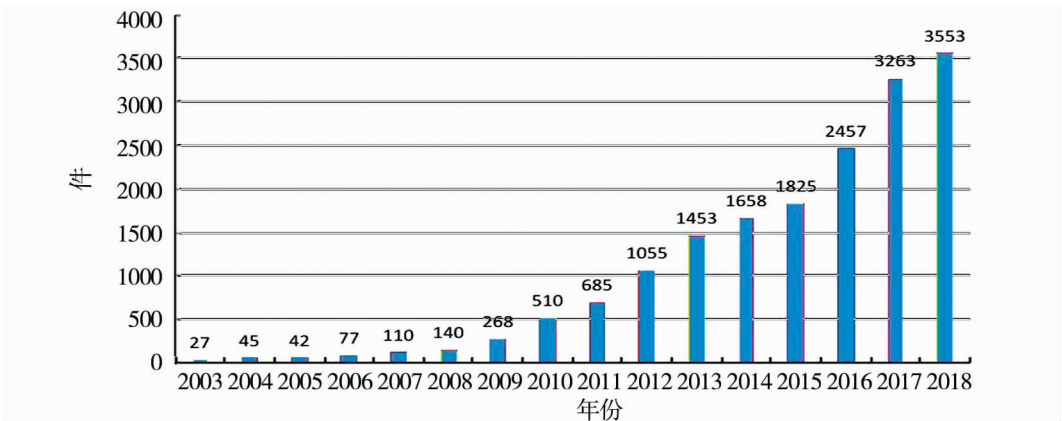


图 6 2003—2018 年我国计算机技术海外专利授权量年度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二）技术引进对于促进 ICT 出口竞争力具有明显正向作用

出口交货值和出口额是体现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里分别以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进行分析。从出口交货值看，2003—2019 年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从 8260.9 亿元增至 56053.8 亿元，年均增速为 12.71%（图 7）。从出口额看，据海关总署统计，2019 年我国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达 4677.2 亿美元，是 2005 年出口额的 2.6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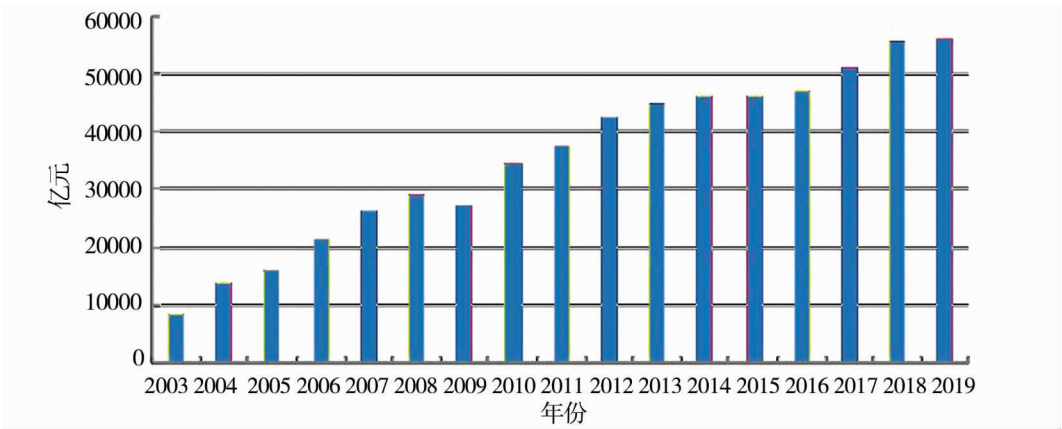


图 7 2003—2019 年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体现我国 ICT 服务出口竞争力的 RCA 指数明显提升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被用来分析一国某种产品或服务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竞争强度 and 专业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RCA_{ij} = \frac{X_{ij}/X_i}{W_j/W}$ 。^① 该方法剔除了国家总出口量、世界总出口量的波动对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很好地反映了一国某一产业出口能力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体现出的相对优势，因而在进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时被广泛采用。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制定的商品或服务国际竞争力标准，当 $RCA > 2.5$ 时，表示该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或服务有极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当 $1.25 < RCA < 2.5$ 时，表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当 $0.8 < RCA < 1.25$ 时，表示具有中等竞争优势；当 $0 < RCA < 1$ 时，表示具有比较劣势；当 $RCA < 0.8$ 时，表示不具备竞争优势。通过对中、德、印、日、美五国 2005—2018 年 ICT 服务贸易 RCA 指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 ICT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并呈现稳定发展态势。2005—2012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 RCA 指数均小于 1，不具有竞争力；2013—2014 年期间具有中等竞争优势；2015 年以来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我国与印度在 ICT 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印度 ICT 服务贸易 RCA 指数由 2005 年的 4.86 下降到 2018 年的 2.91，竞争力不断下降；同期我国 RCA 指数从 0.45 上升到 1.81，竞争力不断增强。此外，德国 RCA 指数保持在 1.05~1.27 之间，具有较强竞争力；美国 RCA 指数保持在 0.45 左右；日本低于 0.3，竞争优势最弱（表 5、图 8）。这里需要指出的是，RCA 指数仅仅反映了服务出口的作用，不能反映出服务进口的作用，因此仅从这一侧面衡量，还不能反映贸易竞争力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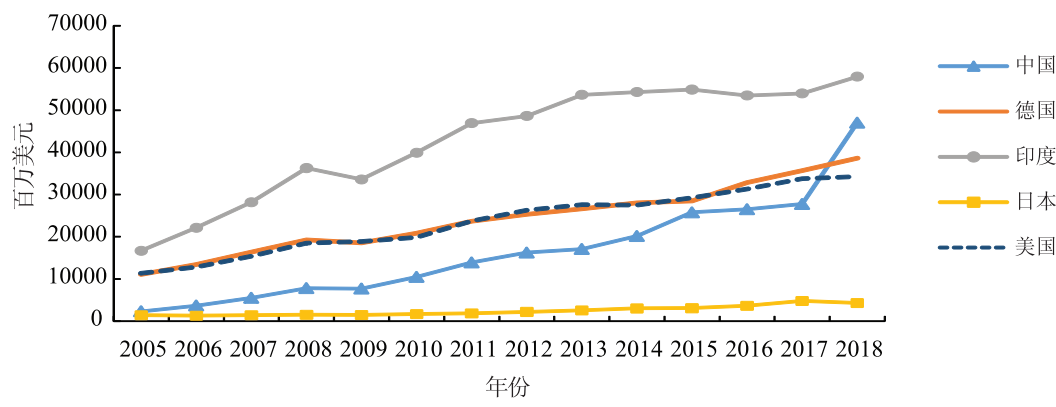


图 8 2005—2018 年主要国家 ICT 服务贸易出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

^① 式中， RCA_{ij} 代表 i 国（地区）j 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X_{ij} 代表 i 国（地区）对世界市场出口 j 产品的出口额， X_i 代表 i 国（地区）对世界市场的总出口额， W_j 代表世界市场 j 产品的出口额， W 代表世界市场产品的总出口额。

表 5 2005—2018 年五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

年度	中国	德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5	0.45	1.05	4.86	0.21	0.46
2006	0.57	1.08	4.65	0.18	0.45
2007	0.63	1.10	4.65	0.17	0.45
2008	0.72	1.07	4.60	0.14	0.47
2009	0.79	1.04	4.53	0.15	0.46
2010	0.73	1.16	4.26	0.16	0.44
2011	0.83	1.13	4.06	0.16	0.45
2012	0.95	1.18	3.95	0.19	0.47
2013	0.97	1.14	4.21	0.22	0.46
2014	1.09	1.10	4.07	0.22	0.44
2015	1.32	1.15	3.94	0.21	0.43
2016	1.39	1.26	3.63	0.23	0.45
2017	1.33	1.27	3.19	0.28	0.46
2018	1.81	1.20	2.91	0.23	0.43

数据来源：根据 UNCTAD 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三、基于全国 160 家 ICT 服务贸易企业问卷调查分析的印证

本课题组于 2020 年 2—3 月期间开展了“关于 ICT 服务贸易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共有 160 家 ICT 企业，分别来自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南京雨花谷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深圳软件园、苏州工业园区软件园和天津滨海新区信息技术服务集聚区，上述 6 个园区均是我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软件园区，集聚了一批主要跨国公司和优秀的国内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具有较强的典型价值和行业代表意义。我们将问卷调查进行如下分类：按企业规模划分，大型企业 53 家，占 33%；中小微企业 107 家，占 67%。^① 按企业营业收入划分，1 亿元以下的 69 家，占 43.1%；1~10 亿元的 70 家，占 43.8%；10~50 亿元的 14 家，占 8.6%；50 亿元以上的 7 家，占 4.4%。按企业人数划分，

^①依照国家统计局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相关划分标准，本次问卷将企业划分为大型和中小微型两类。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大型企业，其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须同时满足大于等于 1 亿元和大于等于 300 人。本次问卷中有 38 家企业，其营业收入达到大型企业标准，即≥1 亿元，但人数未达到 300 人，即<300 人，依照上述标准划入中小微企业中。

300 人以下的占 66.3%，300~1000 人的占 16.3%，1000 人以上的占 17.5%。按照所有制结构划分，共有外资企业 94 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 90.4%，^①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占 9.6%；内资企业 66 家，其中民企占 86.4%，国企占 13.6%。综合以上指标可以看出，上述园区的 ICT 企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贸易对 ICT 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其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是企业获得技术积累的重要渠道。

（一）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1. 技术咨询和服务是企业技术出口的主要方式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出口占企业总数的 73.8%，计算机软件出口占 26.9%。由此可见，离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是 ICT 企业服务出口的主要来源。企业技术进口的总体比例并不高，其中以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进口方式为主的企业占比最高为 23.8%（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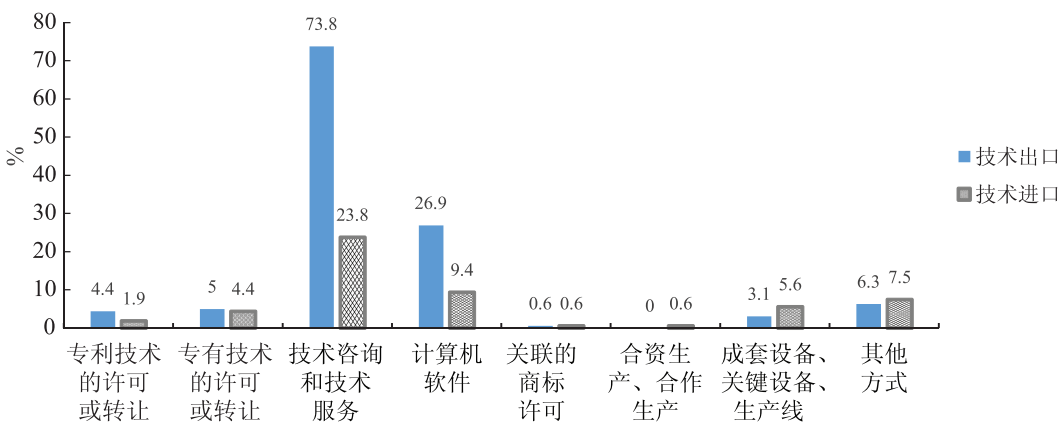


图 9 企业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整理而成。

2.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

问卷调查显示，企业承接离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呈现出显著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人才素质提升、产品交付模式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最为明显，占问卷企业的 67%；其次是促进人才素质提升，占问卷企业的 54.4%；此外，在交付能力、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分别占问卷企业的 30.6%和 13.8%。从问卷企业的类型看，大型企业

^①其中，来自美国、港澳台、日本、欧盟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36.5%、24.7%、16.5%、10.6%。

比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指标占比都高，表明外溢效应更加明显，说明我国许多大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通过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增加了技术积累，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和人才素质（表 6）。据问卷调查企业反映，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获得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体现在示范效应、人才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方面。一是国内企业在外包合同执行过程中通常要接受发包方的技术、规则、标准等方面的培训，本土企业在学习和与外国技术人员共同工作过程中快速掌握行业先进技术、知识、规则、标准和管理经验等，促进本土软件企业快速提高研发水平，融入全球 ICT 价值链体系。二是技术人员在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频繁流动。据南京雨花谷软件园介绍，一个软件技术人员大概平均三年跳槽一次。尤其是早期一批技术管理人员从跨国公司跳槽创立本土软件企业，这些企业都成为我国 ICT 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三是国际服务外包加速了软件园区的产业集聚，集聚效应不仅促进了同业竞争，也产生了示范作用，加速了技术扩散。

表 6 承接离岸软件外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带动效应占比 单位：%

类别	全部	大型企业	中小微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企业总数（个）	160	53	107	94	66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61.9	66.0	59.8	62.8	60.6
人才素质提升	54.4	68.0	47.7	58.5	48.5
交付能力提升	30.6	41.5	25.2	35.1	24.2
交付模式创新	13.8	17.0	12.1	11.7	16.7
服务模式创新	30.6	41.5	25.2	27.7	34.8
其他	8.1	9.4	7.5	7.4	9.1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整理而得。

（二）技术进口同样对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

问卷调查显示，技术进口对于 ICT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人才素质，促进业态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专利增长等方面。问卷企业中有 31.3%认为技术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明显，20%的企业认为对人才素质提升有明显作用，13.8%的企业认为对服务模式创新有提升作用。此外，还有部分企业认为促进了专利增加和业态创新。从问卷企业的类型看，大型企业比中小微企业在各项指标中的占比高，反映出技术进口对大型企业产生的外溢效应更加显著；内资企业在各项指标上都优于外资企业，反映出技术进口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更加显著（表 7）。

表 7 技术进口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带动作用占比 单位: %

类别	全部	大型企业	中小微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企业总数（个）	160	53	107	94	66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31.3	35.8	30.0	24.5	40.9
专利增加	3.8	5.7	2.8	1.1	7.6
人才素质提升	20.0	26.4	16.8	18.1	22.7
业态创新	6.3	9.4	4.7	4.3	9.1
服务模式创新	13.8	17.0	12.1	10.6	18.2
其他	7.5	13.7	4.7	7.4	7.6

数据来源：根据课题组问卷调查整理而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证明，对外开放是提升我国 ICT 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证明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当前，由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导致中美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加速演变，其中技术脱钩是美国遏制我国崛起发展的核心战略意图，数字技术是美国对我国进行技术围堵的重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随着数字技术引领的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在产业链高度融合、技术复杂性和研发强度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开放合作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必然趋势。因此，提高开放合作创新水平，既是有效应对美国技术封锁和围堵的战略选择，也是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应以开放创新为引领重塑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竞争新优势，营造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多边技术合作，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体系和规则变革，在新的全球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版图中赢得机遇。

（一）积极扩大数字技术领域开放

第一，放宽数字技术领域外资市场准入。回顾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电信设备市场几乎全部集中于“八大金刚”^①，以“巨、大、中、华”为代表的本土电信设备商刚起步就在家门口遭遇世界巨头的竞争。但我国并没有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是通过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发挥跨国公司在研发、规范、标准、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外溢和示范带动效应，本土企业通过“干中学”和引进消化吸收快速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更不可能出现华为这样的世界

^①即：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西门子、北电、朗讯、摩托罗拉、富士通。

级企业和 5G 这样的世界领先技术。当前，大力吸引全球数字技术领域跨国公司投资更为重要。一是有利于增强内外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相互依赖性，营造互利合作共赢关系，对于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尤其能够发挥跨国公司的粘合剂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脱钩。二是以平等开放原则为基础为我国数字技术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海外并购、境外研发及建设数据中心等生产经营活动铺平道路。三是继续引入竞争机制和学习效应。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的相互学习、交流和促进，有利于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在技术标准、规范、规则等方面加快国际化步伐。

第二，发挥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新技术。我国具有“市场换技术”的显著优势，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将为各国新的数字技术提供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的广阔空间，将成为孵化培育全球新技术的大市场。尤其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加彰显国内市场优势，为吸引高技术跨国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要鼓励外资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参与制造强国、数字中国、智慧城市等建设，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在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研发补贴等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同等待遇。鼓励外资企业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合作模式创新，探索共创、共享、共赢的体制机制，鼓励合资、合作、交叉持股、专利交叉授权等开放创新模式。

第三，发挥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创新驱动作用。从 ICT 产业发展看，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这些研发中心不仅产生了大量专利技术，而且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对于提升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如到 2019 年三星公司在我国设立 7 家研发中心，研发投入达 28 亿元，研发人员达 4000 余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1970 个。目前，我国 IT 工程技术人才规模居世界前列，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断优化，将有条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中心落地。

（二）稳步推进海外并购、研发中心、科技园区等技术型对外投资

加强技术型对外投资能够有效组合国外先进技术资源、促进技术要素流动。尤其是国际并购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获得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途径。在核心技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大、直接购买困难增多等情况下，并购可以有效规避技术壁垒，使企业短期内掌握核心技术。据晨哨并购统计，2018 年我国企业在科技、媒体和电信业（TMT）领域的海外先进技术并购数占比为 15.65%。近年来，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和科技园成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利用全球人才快速掌握前沿技术的重要渠道。华为、

中兴、阿里、腾讯等企业分别在海外设立了研发中心。此外，华为公司在海外设立了 36 个全球联合创新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技术创新合作。上汽针对自动驾驶、网联汽车、大数据及软件技术等关键领域在以色列、泰国、印尼、英国、印度等设立创新中心和生产研发基地。建议对于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给予适度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用于购置研发设备，聘用海外科学家，在海外申请专利等。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布局 5G、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数字技术，在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输出我国的技术、标准和规则。

（三）积极建立双边、多边和区域等多层次技术合作机制

当前，发达国家试图继续占据全球数字技术的主导地位，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势头加快。因此，数字技术既是各国竞争焦点，也是合作的重点领域，为我国更广泛地加强创新合作、拓展技术来源提供了空间。应积极与主要国家商签双边、多边和区域间的技术贸易投资合作协议，在推动自由贸易、投资协定中增加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等相关内容。重点加强与德国、法国、芬兰、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合作，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区域合作，同时加强与印度、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的合作。一是基于平等原则，相互开放技术投资、技术贸易市场，构建共同研发、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创标准体系的技术合作新机制，形成标准互认、资质互认、规则互认的开放创新局面。二是建立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及有效监管的合作机制和政策对接机制。近期抖音、阿里等数字技术企业海外受挫与我国数字技术领域开放滞后有密切关系。因此，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已成为我国面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尽快建立数据分类管理体制、跨境流动的监管机制，减少数据本地化限制。三是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建立科学家互访、技术人才互访、留学生互派等人才交流机制，通过举办国际论坛等活动促进各国技术相互交流借鉴。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等：《全球化中的科技资源重组与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 70 年》，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4. 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 年第 2 期。
5. 江小涓：《服务外包：合约形态变革及其理论蕴意——人力资本市场配置与劳务活动企业配置的统一》，《经济研究》2008 年第 7 期。

（下转第 71 页）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现状、 挑战和演变前景

杨长湧

摘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历程。与“二战”结束后相比，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虽然仍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三大机构为主渠道，但治理主体的广泛性、治理领域的丰富性、治理机制的多元性和治理规则的复杂性，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与局限性日益暴露，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调整、改革和完善。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模式深刻转换，全球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将呈现新态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望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平衡和有效的方向演进，将经历长期曲折的过程。

关键词：全球经济 治理结构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贸规则

作者简介：杨长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现状

当今世界，主权国家政府通过形成三类组织和合作机制，对全球经济进行治理。一是实体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这些机构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拥有比较庞大的专职工作人员队伍，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渠道。二是非实体性合作机制，包括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金砖国家（BRICS）等，主要为成员国提供对话、磋商和政策协调平台，一般不具有规则构建功能，也没有庞大的专职工作人员队伍。三是由一国提出、多国参与的

经济合作倡议，主要是“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模式和方案。

（一）WTO、IMF 和 WB 为支柱的传统机制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渠道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域日益丰富、机制日益多元，但 WTO、IMF 和 WB 等三大实体性国际组织仍是主渠道。这三大机构具有其他机制短期难以企及的优势：一是所涉领域十分重要。国际经济活动虽然纷繁复杂，但商品和资本流动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构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部分。WTO 是国际贸易领域唯一的多边机构，IMF 和 WB 是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主要支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二是成员众多。目前，WTO、IMF 和 WB 分别有 164 个、189 个和 189 个成员，包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国是否是这几个机构的成员，特别是 WTO 和 IMF 的成员，成为其是否融入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重要标志。三是专业化优势。WOT 专门负责处理国际贸易相关的问题，IMF 和 WB 专门处理国际货币金融相关的问题。这三大机构在 70 多年的运行中，在各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案例，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运行提供有效的监测与指导，为各国贸易、货币和金融等领域的规则构建与能力建设提供比较专业的意见及建议。四是实体化优势。这三大机构都建立了一套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且都有专职人员队伍负责规则实施，某种意义上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国际法基础。相较之下，G20、G7 等非实体性合作机制主要侧重于对话、磋商和协调，一般不会形成有约束力的规则，涉及到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往往需要依靠 WTO、IMF 等既有规则体系。

（二）G20 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G20 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衡。目前，G20 成员人口占全球的 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 55%、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 86%、贸易额占全球的 75%。二是 G20 既有领导人峰会进行战略引领，又有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贸易、劳工就业、农业、能源、数字经济、卫生等专业部长会议进行具体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能够产生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强大影响力。

2016 年举行的 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 G20 议程，特别是在《G20 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下建立了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在全球经济

治理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三）金砖国家等新兴机制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

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机制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其中最重要、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当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其成员涵盖亚洲国家（中国和印度）、欧洲国家（俄罗斯）、非洲国家（南非）和美洲国家（巴西），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 26.5%，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2.1%，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 1/4，在 IMF 的份额占比为 14.84%，在 WB 的投票权占比为 13.39%，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强代表性和影响力。2017 年 9 月在中国福建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国作为东道主首次提出“金砖+”的概念，举办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邀请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等五国领导人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围绕“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主题进行了讨论。“金砖+”概念的提出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举办，某种程度上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走向更加开放、更具弹性、更好推动南南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带来重大新气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是中国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另起炉灶，不是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在接受和参与既有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从增量上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更加优化、更能适应国际经济局势变化，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6 年多，为世界各国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机遇，也给全球经济治理开辟了新路径、带来了新气象。与其他机制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四个特点，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能够独树一帜、特色鲜明。

一是开放包容。“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只要有意愿参与倡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都欢迎。截至 2019 年 7 月，中国已与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 195 份“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府间合作协议。^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员国由最初的 57 个增至 102 个。同时，中国虽是倡议的发起国，但恪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求将倡议打造成为全球公共品。这种开放包容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

^①佚名：《图解：“一带一路”倡议六年成绩单》，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9 月 9 日。

下观，也符合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是对国际合作模式的新探索和新实践。

二是务实落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进行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更伴随大量实实在在的项目和工程，包括基础设施联通、境外工业园区建设、国际贸易便利化等，可以给参与国直接带来贸易投资扩大、经济增长和就业促进等效应。WB 研究组 2018 年的量化贸易模型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GDP 平均增加 2.6%至 3.9%。^①

三是发展导向。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从国际上看，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在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是共同的迫切愿望。“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以发展的视角看问题，不强求规则与标准统一，通过实实在在的资源投入，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发展导向是中国经验与国际局势有效对接和耦合的产物，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重要智慧。

四是设施联通。“要想富、先修路”“要修路、首先靠政府”是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条件。“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方向，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这一经验，也给参与国带去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机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互利合作、共赢发展。

（五）气候变化等非传统经济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生产力发展，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经济安全问题逐步进入国际社会视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1994 年生效，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唯一的多边合作机制，有 197 个缔约方。1997 年在该公约框架下达成《京都议定书》，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2012 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各方经过艰苦磋商于 2015 年达成《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制度框架。2019 年 11 月，美国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成为唯一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在网络安

^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 年 4 月。

全领域，中美、美欧、俄美、英美等主要经济体形成网络安全双边对话与合作机制，欧盟、北约等开展了区域内网络安全合作，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国际电信联盟（ITU）等积极推进构建网络安全多边合作机制。

二、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其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其对外政策正在深刻调整；二是不能适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三是不能满足全球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跟不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推进，也不能有效解决发展失衡加剧、金融风险上升等突出问题。

（一）美国对外政策深刻调整，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1918年美国提出威尔逊主义后，除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少数时间外，其对外政策体现为一贯的、明确的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三个理念主导下，“二战”后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架构。“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大发展，与当时美国继续秉持这三个理念密不可分。然而，当前美国正在改变倡导百年的这三大理念，从“美国责任”转向“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一转向，是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恐非一时权宜之计，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规则和方法陷入前所未有的分歧状态。

“美国优先”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基础。国与国之间要在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形成稳定合作，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的客观事实，在汲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对等承担国际责任。因此，责任意识特别是大国的责任意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基础。否则，在国际社会某种程度处于无世界政府的丛林状态下，如果各国特别是大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相应的国际责任，合作就很难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就无从谈起。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公开抛出“美国优先”理念，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在应对气候变化、宏观政策协调、发展援助等领域通过“退群”推卸国际责任，不仅减少了国际公共品供给，而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在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形成十分负面的示范效应。

保护主义严重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基础。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流规则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商品和要素跨国自由高效流动。这套规则虽有弊端，但总体是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美国自 2018 年以来，举起保护主义大棒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这套规则带来两方面严重影响：一是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不符合 WTO 规则，特别是在《1974 年贸易法》301 条款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违反了其 20 世纪末关于“301 调查”将完全遵守 WTO 规则的公开承诺，给 WTO 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带来明显损害。二是美国作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其保护主义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比如，2019 年 7 月日本对韩国发起贸易摩擦，很难说没有美国保护主义的影响。

单边主义严重破坏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基础。多边主义方法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这种方法虽然耗时费力，但最终形成的规则体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容易形成比较稳定的机制。但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谈判等尝到单边主义的甜头，对多边主义越来越兴趣阙如，甚至威胁退出 WTO。不难想象，若任由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通过多边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多数将“跛足”前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机制尚不能完全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19 世纪末期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一直在拉大，世界长期处于“大分流”态势。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世界从“大分流”向“大趋同”的转折点。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态势日益明显。IMF 测算，按照现价计算，1992 年发达经济体 GDP 占全球比重达到 83.6% 的峰值，此后呈现持续下行趋势，2019 年该比重已降至 60%，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GDP 全球占比从 16.4% 升至 40%。

然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主渠道地位的 IMF 和 WB 这两个传统机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反映。国际金融危机后，IMF 和 WB 虽然进行了改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投票权，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垄断了管理机构的控制权，特别是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独享否决权。按照规则，IMF 和 WB 的重要议案都需要获得 85% 以上的投票才能通过，而美国在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分别达到 17.407% 和 15.87%。也就是说，在 IMF 和 WB 中，凡是不符合美国意愿与利益的规则，无论其对全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多么有利，都可能被美国一票否决。

（三）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尚不能有效解决获益不均这个突出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促成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扩散的同时，也带来获益不均的问题，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不同国家、不同群体贫富差距拉大。从国家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远大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地位，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金融风险增加。不少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摆脱了贫困，但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地位被长期锁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开放，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金融体系也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之下。过去 30 年，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 GDP 差距扩大近 120 倍。从群体看，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最富有的 1% 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极端贫困人口数仍超过 7 亿人。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造成岗位流失，中产阶级收入减少，社会结构有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的倾向。这些问题暴露了经济全球化没有实现普惠共享的弊端，也成了反全球化力量集中攻击的软肋。

然而，以 WTO、IMF 和 WB 为代表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强调效率优先、增长优先的治理理念，倾向于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但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

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推动经济全球化模式出现深刻调整。然而，现有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尚不能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不少新兴领域的规则还处于几近空白的状态，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比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货物贸易强度降低、服务贸易比重上升成为大势所趋。全球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在 2010 年后未出现明显增长，而服务贸易、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等无形产品和服务则快速增长。然而，WTO 虽有服务贸易规则，但以正面清单方式进行市场准入谈判，各国服务贸易壁垒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同时，服务贸易不仅涉及准入问题，更涉及大量边境后规制协调问题，这在知识产权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但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重点仍在市场准入方面，缺乏对边境后规则的深入磋商和协调。再比如，对就业和收入不平等可能加剧的问题缺乏充分准备与有效应对措施。与过去的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速度、广

度和深度都达到空前程度，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就业市场的两级分化趋势可能加剧，财富将日益向创新者、投资人和股东等技术资本所有者集聚，他们与工薪阶层的贫富差距将更加悬殊。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推动下的企业组织平台化，也会加速财富与权力向少数平台集中，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可能主宰各行各业市场，形成新的寡头格局。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应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获益不均方面已经捉襟见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能带来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加剧问题，将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五）国际金融市场急需提升抗风险能力，但现有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金融全球化对于提高全球金融运作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以及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加剧了各经济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缺乏有效的联合金融监管机制，欧债危机、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频繁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供求关系的小幅变化往往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这种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形成严重威胁。构建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救助能力，对于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演变趋势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问题倒逼特征，是在积累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未来，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以更好适应国际局势变化的需要，但也必将经历各方激烈博弈和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但传统机制和新型机制都将深刻调整

全球经济治理基本架构创建于“二战”结束前后，70 多年来历经大调整、大发展和大改革，形成当前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多个机制的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未来，这套结构预计维持基本的稳态，但其内容将发生深刻调整。

一是 WTO、IMF 和 WB 的延续与调整。WTO 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各类区域贸易协定是重要补充，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适应货物

贸易全球价值链调整以及服务贸易、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业态发展，WTO 规则将越来越多地深入边境后领域，知识产权、补贴政策、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的规则将逐步完善。IMF 和 WB 仍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各类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IMF 和 WB 将继续面临扩充资源提升贷款能力和改革治理结构增强代表性与包容性这两个重要任务。

二是 G20 等新兴机制的巩固与深化。G20 成员的涵盖面和代表性，是除 WTO、IMF 和 WB 外其他合作机制所不能比的。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10 多年的实践表明，G20 对于各国宏观政策协调和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够发挥十分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未来很长时期预计 G20 将继续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同时，G7 作为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主要政策协调机制、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主要合作机制，将继续对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影响。但 G7 面临如何更好处理与 G20 关系的问题，金砖国家则面临如何更好提升功能以及如何通过“金砖+”扩大覆盖面的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治理模式的日趋成熟与定型。当前，共建“一带一路”正在转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更加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和产能合作，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积极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创的模式和经验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肯定、总结与推广，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大亮点和新特色。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如何深化与完善的问题。包括：完善战略规划机制，推动设施联通等领域的战略规划制定；完善金融保障机制，让项目建设更多实现利益攸关方共同融资；完善安全保障机制，让项目能够持续运营，保障境外中国人员和资产安全，等等。

（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增强是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仍将遭遇阻力

未来较长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仍有很大空间，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成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果在主要发展中国家快速推广应用。因此总体看，发展中国家有望继续保持较发达经济体更快的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上升。IMF 预计，2024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将进一步升至 44% 左右。

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必然趋于增强，但来自既得利益国的阻力仍将十分强大，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地位的上升速度将明显慢于其经济实力的上升速度。一是 IMF 和 WB 治理结构改革将进一步

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但美国独享的一票否决权短期恐难以撼动，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二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力推发展中国家认定机制改革和边境后议题谈判，希图掌握新一轮 WTO 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削弱发展中国家在 WTO 改革中的地位。三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债务陷阱论”“环境破坏论”“分裂欧洲论”等论调将继续存在并花样翻新，妄图破坏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阻遏“一带一路”影响力扩大。

（三）增强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是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仍难找到有效方案

获益不均是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症结，是近年来逆全球化兴起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经济全球化中的获益不均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之间获益不均，二是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出现获益不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一些国家和阶层没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二是一些国家和阶层虽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但长期被锁定在分工低端环节，只能获取十分有限的增值收益；三是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当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已逐渐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适应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从获益不均出现的三个原因入手，着力扩大经济全球化覆盖面，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各国政策协调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問題，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群。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为增强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积极贡献智慧与方案。特别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扩大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投资参与度，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机构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推动 G20 杭州峰会形成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明确提出共享繁荣指标或基尼系数指标，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探索新路径，实践新模式。然而，彻底解决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容性和普惠性不足的问题，短期仍难找到有效方案。这是因为，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根子在各国国内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差异，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的完善程度，全球经济治理可以帮助相关国家改善这些问题，但终究无法替代各国自身的政策制定。同时，作为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分离主义、民粹主义正在其国内抬头，给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四）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形成是大势所趋，但短期内各方可能产生激烈交锋

两类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露出端倪。一类是“一带一路”倡导的“发展导向的互联互

通”规则。这套规则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导向，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着力打造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金融支持体系和安全保障机制，不强求边境后规制统一。这套规则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要求，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另一类是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加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力图打造的“高标准广覆盖”规则。这套规则直指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目标，同时将边境后规制作为重点，力图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产业补贴、技术转让、数字贸易、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反腐败等边境后规则领域进行协调乃至统一。这套规则一定程度符合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迈向深入的要求，得到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支持，也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在力推这套规则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使其成为 WTO 改革谈判的重点。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等的经验看，要在诸多领域形成一揽子规则，特别是在补贴政策、数字标准、劳工标准等比较敏感的边境后领域形成规则，必将引起各方激烈交锋，很可能出现迟迟未果，最后各方只能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自行其是的情形。

（五）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是大势所趋，但短期内仍难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商品、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频繁，信息和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震荡等传统经济风险以及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经济风险，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各国经济安全的共同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提升各类风险应对能力，以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包容和平衡增长，减少市场震荡乃至危机对人类生产生活的破坏。未来，以 IMF 为核心、各类货币金融合作机制为重要补充的金融安全网络，将不断提升对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危机救助能力。以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合作机制将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核心作用，G20、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将越来越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中国作为主要碳排放大国将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机制也是可期的。然而，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风险蔓延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美国作为主要碳排放大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带来巨大挑战；各国在数据流动、数据存储、隐私保护等网络安全关键问题上存在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矛盾，因此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

绝非坦途，必将经历长期的体制机制建设和复杂的国际博弈过程。

参考文献：

1. 杨长湧：《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9 年版。
2. 庞中英：《1945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教训》，《国际观察》2011 年第 2 期。
3. 傅星国：《WTO 非正式决策机制“绿屋会议”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0 年 3 月。
4. 隆国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三个判断》，《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3 期。
5. 隆国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作用》，《人民日报》2017 年 8 月 28 日。
6. 李由：《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与中美方案的历史考察》，《经济问题》2018 年第 6 期。
7. 陈建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逻辑与趋势》，《学习时报》2019 年 12 月 27 日。
8. 赵龙跃：《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70 年》，《太平洋学报》2019 年 10 月。
9. 黄茂兴、叶琪：《G20 二十年：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责任担当与发展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11 月 19 日。
10. 崔志楠、邢悦：《从“G7 时代”到“G20 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
11. 黄梅波：《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有效性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04 年第 9 期。
12. 叶华：《西方七国集团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13. 张玉柯：《从 GATT 到 WTO——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14. 刘菲：《从 GATT 到 WTO》，《财贸经济》1994 年第 12 期。
15. 蒋丽、张小兰、徐飞彪：《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9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基于数字经济视角理解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敬艳辉 李 玮

摘要：数字贸易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贸易形式，已成为当前主要国家竞争的焦点。目前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本文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指出数字贸易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义的数字贸易还应包括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同时，分析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数字化服务即狭义数字贸易的发展形势，研究我国面临的短板，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关键词：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 可数字化服务

作者简介：敬艳辉，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李 玮，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一场重塑经济版图的“数字革命”，“互联网+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壮大，预计 2025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23 万亿美元，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模式迅速发展，得到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发展数字贸易进行决策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数字贸易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外对数字贸易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也没有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本

文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来认识数字贸易，分析其主要特征和重要意义，探讨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一、数字贸易概念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观点

美国是最早采用数字贸易概念的国家。2013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I》中首次定义“数字贸易”为，通过固定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产品与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包括数字内容、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其他数字产品与服务四部分，但不包括在线订购的实物产品。2014 年发布的《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II》将“数字贸易”重新定义为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交付产品和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在此前基础上扩充使用数字技术订购、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欧盟 2015 年发布的《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提出，数字贸易是利用数字技术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日本在 2018 年的《通商白皮书》中提出，数字贸易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与信息的商务活动。

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概念，定义为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网络远程交付的服务。世贸组织一直延用 1998 年《电子商务工作方案》关于电子商务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电子方式生产、分销、营销、销售或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二）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定义

李忠民等（2014）认为数字贸易是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主导的经济革命，是以知识为基础，在数字技术催化作用下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动领域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马述忠等（2018）认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伊万·沙拉法诺夫等（2018）认为，狭义上，数字贸易是指依托互联网，以数字交换技术为主要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易互动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准的创新的商业模式平台；广义上，数字贸易还应包括 ICT 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数字产品及服务、人员流动和数据传输四个核心因素。由此可见，理论界对数字贸易的认识和研究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数字贸易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深化。

二、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一）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超越国界而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贸易形式

数字贸易的雏形可追溯至互联网诞生之初的收发电子邮件。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界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贸易活动，从 B2B（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发展到 B2C（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进一步到 C2C（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C2B（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普及，许多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数字化可贸易的服务，原来需交付货物才能完成的贸易发展为交付数据信息即可完成。数字贸易在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方面展示出显著的竞争优势，发展速度远高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重要形式。

（二）数字贸易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地域边界，是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由于数据信息可以接近于零的成本快速复制并以接近光速通过互联网传输，可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内在发展要求各国间信息互联互通和广泛共享。数字贸易使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物理界限，使数字技术的成果得到更大规模的普及应用，提升数字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客观上必然要求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在更广范的网络空间中实现更大利益。

综合分析，数字贸易是跨越国境交易数据资源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信息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展数字贸易需依托本国数字经济的产业基础，又可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的产业优势。

三、数字贸易的内涵和外延

（一）数字贸易的定义

各国和国际组织目前尚未对数字贸易形成权威的统一定义，但对数字经济已形成普遍共识和权威定义。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理解数字经济有助于加深对数字贸易的认识。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应用、全要素数

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形成包容、创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阶段。

鉴于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紧密联系，参照二十国集团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本文认为数字贸易可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来提升贸易效率、优化贸易结构的贸易活动”。这样定义的优点有三，一是直接对接国际最高标准，便于获得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二是体现数字贸易的主要特征，从要素、载体、方式、成效等维度进行限定，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比较清晰；三是数字贸易的业务范畴与数字经济保持基本一致，可随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应用相应拓展，数字贸易的外延可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

（二）数字贸易的分类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即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产业数字化，也称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包括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分析，总体上数字贸易可分为数字技术贸易和数字内容贸易两类，分别对应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分。数字技术贸易是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跨境贸易，狭义上包括云计算、软件技术、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卫星定位等数字服务贸易，广义上还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跨境贸易。数字内容贸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或数字信息平台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狭义上包括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数字影视、数字音乐、数字传媒、在线学习、在线旅游等数字服务跨境贸易，广义上还包括基于跨境电商平台实现的 B2B、B2C、C2B、C2C 商品交易。由此可见，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存在交叉重叠部分，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义的数字贸易还应包括 ICT 产品贸易和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

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开辟了新空间，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由于当前各国对数字贸易没有确切的统计，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数据作为狭义数字贸易的测度，具体包括金融、保险、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规模为 2.9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服务

出口总额的 50%，2005—2018 年年均增长 7%，高于同期服务出口 6% 的年均增速。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上也占据优势，占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的 76%。为便于对比分析，本文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计算方式。

（一）美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美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一大国，2019 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3.1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 61.3%。依托强大的数字平台、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经济基础，美国积极通过美韩、美澳、美加墨等自贸区协定推动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本地化，积极为美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引导制定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以期主导数字领域的话语权。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 年美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 5378 亿美元，占美国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 61.4%。其中，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出口 1174 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28.7%；金融服务出口 1357 亿美元，占全球的 26.1%；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出口 1051 亿美元，占全球的 18%；研发服务出口 496 亿美元，占全球的 25.1%。美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口 3131 亿美元，顺差达到 2247 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 78.2%。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测算，数字贸易对美国实际 GDP 的综合贡献率达到 3.4%~4.8%，并增加大约 240 万个就业岗位。同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占据全球云计算行业规模的 60% 左右，主导着全球云计算服务行业。

（二）欧盟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 年）》的数据，德国、法国为欧盟主要的数字经济大国，2019 年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为 2.44 万亿美元和 1.17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64.3% 和 43.2%。欧盟通过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全方位数据法律规则，2015 年推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明确建立欧洲单一数字市场的三大支柱；2018 年发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禀赋优势，保障欧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在不断提升，已成为欧盟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促进了欧盟数字贸易的发展，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 年，欧盟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达到 1.27 万亿美元（包括欧盟内部出口），占欧盟服务出口总额的 56.3%。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3322 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49%；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 2746 亿美元，占全球的 44.4%；金融服务出口 1674 亿美元，占全球的 32.2%；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出口 1525 亿美元，占全球的 37.3%。同时，欧盟是全球第二大云计算服务市场，全球市场份额约 20%。

（三）英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英国是欧洲的数字经济强国，2019 年数字经济规模为 1.76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2.3%。英国政府于 2015 年出台《2015—2018 年数字经济战略》，倡导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把英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数字化强国。2017 年，英国发布《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对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和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而周密的部署，详细阐述了脱欧后将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并对未来推进数字转型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主要包括：连接战略、数字技能与包容性战略、数字经济战略、数字转型战略、网络空间战略、数字政府战略和数据经济战略等七大战略。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 年，英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 3046.8 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 74.6%。其中，金融服务出口 803.1 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15.4%；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出口 663.5 亿美元，占全球的 11.4%；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 634.6 亿美元，占全球的 10.2%；保险服务出口 256.7 亿美元，占全球的 18.7%。2019 年英国的可数字化服务进口 1681 亿美元，顺差 1365.8 亿美元。

（四）日本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日本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三大国，2019 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4 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7%，在全球范围仅次于美、英、德、韩等国。日本目前为全球第三大电子商务市场，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 年，日本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 1165 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 56.8%。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467.3 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11.4%；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出口 291.2 亿美元，占全球的 4.7%；金融服务出口 137.9 亿美元，占全球的 2.6%；研发服务出口 76.4 亿美元，占全球的 3.9%。2019 年日本的可数字化服务呈逆差状态，逆差 120 亿美元。

（五）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形势

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5.2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6.2%，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通信产业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测算，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 15.6%，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7.7%，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推出“互联网+”行动、大数据战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取得快速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测算，2019 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金额 1435.5 亿美元，呈快速增长态势，在服务出口中的比重为 50.7%。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53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7.9%；其他商业服务出口 73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占全球的 5.2%；金融服务出口 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仅占全球的 0.7%。知识产权专利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保险服务均呈大幅逆差。

综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基于自身优势主导或引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以进一步扩大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相对于美欧日主要经济体，我国数字经济比重偏低，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有待进一步提升，可数字化服务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相对较弱，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数字经济地位不相匹配。

五、加快发展我国数字贸易的思路

基于数字贸易内涵、外延的研究，以及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的对比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思路。

（一）夯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础

数字经济是发展数字贸易的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数字贸易首先要夯实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关键是要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强化基础性研发设计，前沿性、基础性技术创新能力，重点加大对 5G、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关键共性技术支持力度，加快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数据科学理论体系、大数据计算系统等重大基础研究进行布局，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鼓励基于数据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坚持确保安全前提下数据开放、市场主导的原则，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制定数据资源确权等制度，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保护力度。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农业、工业数字化转型，将专业知识技能转化为数字形式的产品和服务，又要通过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其跨境传输交付水平。

（二）适当扩大数字服务业开放力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当前我国关于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基础电信服务的规则与美欧分歧较大，规则谈判处于较为保守被动的地位。为避免美国利用美欧、美日、欧日区域经贸协定对我进行合围，我们应利用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适当扩大数字服务业开放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数据本地化限制、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提升互联网服务开放水平。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和上海自由贸易区新片区，通过先行先试为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实现数据跨境便捷流动积累发展经验。

（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为继续抢占发展先机，发达国家正不遗余力地推动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明确了我国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原则。要深入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区域自贸协定中对数字贸易的立场和规则，又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的关切。既要听取阿里、腾讯、华为等数字巨头企业在国际上扩大进攻利益的建议，也要听取国内中小数字创新型企业的建议，还要从用户角度了解一般企业和公民对于数据保护的意见。兼顾数据安全与有序流动、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资源利用、当前发展和长远规划的关系，寻求数字贸易各参与方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方面的关注和利益。

（四）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建立规则标准体系

依托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为跨境电商搭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依托我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先优势，利用 G20 等多边舞台推出电子支付、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数字产品征税、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的中国方案。在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管理、简化海关进口税收征管体系方面，积极推广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中国实践。在建立跨国电子认证、在线交易、跨境支付、跨境物流服务、在线通关、监管信息互换等国际规则标准方面，提出中国倡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剧烈而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将进一步促进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应充分把握在全球率先复工复产的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我国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参考文献:

1. 徐金海、夏杰长:《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改革》2020年第5期。
2. 曾培炎:《中美应反对脱钩 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经贸磋商》,《全球化》2019年第12期。
3. 王晓红:《推动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全球化》2019年第8期。
4. 张茉楠、周念利:《数字贸易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挑战、趋势及中国对策》,《全球化》2019年第6期。
5.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
6. 夏杰长:《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 伊万·沙拉法诺夫、白树强:《WTO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机制研究——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
8. 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9. 李忠民、周维颖:《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对策思考》,《全球化》2014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上接第50页)

6. 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7. 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8. 王晓红、朱福林、柯建飞:《服务外包:推动中国服务业开放新引擎》,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
9.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李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与中国技术跨越式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刘绍坚:《软件外包:技术外溢与能力提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 王洛林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3—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李蕊

欧盟数字贸易发展的新动向及展望^{*}

谢兰兰

摘要：新兴数字服务方式和内容不断涌现，服务可数字化水平大幅提升，为欧盟数字贸易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政府监管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政策议题。欧盟凭借优越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条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单一市场数字政策的集成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领域规则的制定，树立欧式规则的全球话语权。

关键词：欧盟 数字贸易 数字经济治理

作者简介：谢兰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

一、欧盟数字贸易发展状况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之一。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区域内每天产生海量的业务量和数据量。日均发送 200 亿封电子邮件、1500 万条社交媒体信息并完成 6500 万次网上搜索，预计 2020 年欧盟数字经济的价值将增至 7390 亿欧元，占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4%。凭借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市场潜能，欧盟数字服务出口的比较优势凸显，也使欧盟成为全球数字科技企业稳定的业务市场和重要数字服务出口市场。

（一）数字贸易发展基础设施完善

欧盟总体信息化程度和互联互通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为数字服务开展跨境贸易

^{*} 本文为商务部课题《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19》部分成果。

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环境。国际电信联盟（ITU）2019 年发布的《衡量信息化社会报告》显示，2019 年欧洲的信息化程度领跑全球。其中，个人互联网使用率（82.5%）、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33.6 部）、每百人固定宽带数量（31.9 部）、每百人移动电话数量（118.4 部）、移动宽带覆盖率（99.1%）、每个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国际带宽（211kb/s）均居于全球最高水平，每百人的移动宽带数量（97.4 部）仅低于北美地区（104.4 部）。欧洲的国际带宽使用量全球占比达 25%。此外，得益于欧盟近年来对宽带网络的持续投资和取消联盟内漫游费等措施，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欧洲的移动宽带资费处于全球低水平区间，性价比较高。

欧盟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市场环境最规范的区域。数字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并不断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和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网络安全方面，随着《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二版《支付服务修订案》（PSD2）和《网络与信息安全法令》（NIS）、《欧盟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逐步落地，政府对网络安全的监管强度不断升级。为了管理网络谣言，2019 年，欧盟成立欧洲数字媒体监测中心，对网络平台内容进行审核并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民众的媒体素养。2020 年初，欧盟委员会还将启动一项对《欧盟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实施效果的全面评估，旨在评估社交媒体和搜索平台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力度。

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19 年 3 月，《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通过，进一步加强保护数字环境下内容创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作品的合规传播和利用。此外，欧盟严厉打击非授权软件使用。商业软件联盟（BSA）《2018 年全球软件调查报告》显示，欧盟非授权软件使用率 28%，低于全球 37% 的平均水平；其中西欧地区低至 21%，仅次于北美地区（16%）。

（二）数字贸易规模大，是全球主要的出口来源地

欧盟是全球数字服务主要的出口来源区域。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欧盟 ICT 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服务和信息服务）出口稳步增长，从 2011 年的 2095.5 亿美元增至 2018 年的 3068.7 亿美元。2018 年欧盟 ICT 服务出口额占全球的 54%。欧盟 ICT 服务出口来源国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基础最好的西欧地区，其中欧盟 15 国的 ICT 服务出口额 2801.6 亿美元，占整个欧盟比重高达 91.3%。

数字技术改变了服务交付方式并极大提升了服务产品的交付能力，助推欧盟服务贸易快速增长。UNCTAD 数据显示，2018 年，欧盟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 14490.6 亿美元，占全球的 49.4%，占欧盟服务出口额的 56.9%，在全球各区域中最高。同期，其可数

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是 ICT 出口额的 4.9 倍，按 UNCTAD 测算，目前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的价值是 ICT 的 5 倍，其可数字化服务出口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表 1 2011—2018 年欧盟 ICT 服务出口 单位：百万美元,%

区域	出口情况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全球	出口额	368080	384260	413480	440770	442600	458560	495390	56825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8.34	8.46	8.54	8.48	8.92	9.11	9.12	9.72
发展中经济体	出口额	96640	104290	112090	124490	131510	136480	141320	16886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7.80	7.85	8.04	8.27	8.94	9.31	8.88	9.71
转型期经济体	出口额	6220	7170	8660	9510	9110	9630	11400	1366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5.38	5.71	6.31	7.48	8.50	8.97	9.34	9.95
发达经济体	出口额	265220	272810	292740	306780	301970	312450	342660	38574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8.68	8.84	8.84	8.61	8.92	9.04	9.22	9.72
欧盟 28 国	出口额	209550	212940	231510	241190	235250	241490	266170	30687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10.76	10.97	10.98	10.56	11.11	11.18	11.34	12.06

资料来源：UNCTAD 数据库。

表 2 2011—2018 年欧盟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区域	出口情况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全球	出口额	2078390	2148360	2331710	2554480	2465000	2546600	2722090	293140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47.12	47.32	48.17	49.17	49.67	50.62	50.14	50.15
发展中经济体	出口额	415280	452860	487350	538180	542410	555770	593390	65987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33.50	34.11	34.96	35.74	36.88	37.92	37.30	37.96
转型期经济体	出口额	31390	35140	40090	37810	31840	30840	34880	3943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27.14	28.01	29.21	29.74	29.70	28.72	28.57	28.74
发达经济体	出口额	1631720	1660360	1804270	1978490	1890750	1959990	2093820	223210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53.39	53.79	54.52	55.54	55.86	56.68	56.34	56.23
欧盟 28 国	出口额	1032660	1046700	1152910	1281030	1205580	1246690	1342020	1449060
	在服务贸易中占比	53.01	53.93	54.68	56.11	56.91	57.70	57.16	56.94

资料来源：UNCTAD 数据库。

注：可数字化交付贸易包括采用数字技术交易的保险、金融、知识产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及其他服务。

（三）新兴数字服务消费需求催生进口市场

欧盟消费者在数字媒体、在线游戏、搜索等市场的旺盛需求，催生了庞大的进口市场。

数字广告领域，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形成了强大的用户追踪能力，成为数字广告最重要载体。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8 年社交媒体广告行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欧盟用户使用的主要社交媒体为脸书（Facebook，43.6%）、油管（YouTube，28.6%）、推特（Twitter，4.3%）、照片墙（Instagram，2.5%），全部来自美国。这意味着欧盟用户为全球数字广告支付了高昂成本。数据分析公司 Statista 预测，2020 年美国在全球市场收入最高的 5 大数字广告市场分别是中国（578 亿美元）、英国（183 亿美元）、德国（169 亿美元）、日本（131 亿美元）和法国（126 亿美元）。欧盟成员国中，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比利时、波兰、奥地利、芬兰和爱尔兰 9 国合计为美国在线广告支出高达 250 亿美元。受众数量也间接证实了欧盟庞大的数字服务消费能力。We are Social 数据显示，2019 年 10 月份，Facebook 核心产品广告受众最大的 20 个来源国中有 4 个欧盟国家，包括^①英国（3700 万人）、法国（3100 万人）、意大利（3000 万人）和德国（2800 万人）。世界最大的图片分享网站 Pinterest（美国）广告受众最大的 20 个来源国中欧盟国家占 17 席，其中德国（1120 万人）、法国（1058 万人）和英国（1036 万人）受众高达 1000 万以上。美国公司在欧盟搜索引擎市场的集中态势更加明显，仅谷歌（Google）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就高达 90% 以上，其广告投放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线游戏领域，欧盟是全球主要的游戏输入区域。Sensor Tower 统计，2019 年欧洲移动游戏总下载量达 104 亿次，同比增长 9.5%，欧洲用户在移动游戏中的支出达 74 亿美元，占欧洲移动应用市场总收入的 66%。欧洲的移动游戏市场，海外公司份额较大。2019 年，在欧洲最畅销的移动游戏中，收入最高的 10 款游戏有 6 款来自欧盟外国家，下载量最大的 10 款游戏有 7 款来自欧盟外国家；另一方面，欧盟本土游戏发行公司的海外份额较低，全球竞争力不足。App Annie《2020 年移动市场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游戏 App 下载量前 10 位中，只有一款丹麦游戏公司开发的 Subway Surfers。

欧盟的搜索引擎市场集中度十分高，基本全部被美国企业覆盖。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调查，Google 在欧盟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90%。以德国和英国为例，2019 年 2 月 Statista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市场主要的搜索引擎分别是 Google（93%）、必应（Bing，

^①2019 年 10 月，英国尚未正式脱欧。

14%)、雅虎 (Yahoo, 11%)、DuckDuckGo (5%) 和 AOL. (3%); 英国市场主要的搜索引擎分别是 Google (94%)、Bing (20%)、Yahoo (19%)、Ask (5%) 和 AOL. (4%)。值得一提的是, 欧盟指控 Google 对小型竞争对手滥用垄断地位, 并开出三项共计 90 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至今双方仍在博弈。

表 3 2019 年欧洲最畅销游戏前 10 名

排名	收入最高前 10 位			下载量最大前 10 位		
	游戏名称	发行公司	国别	游戏名称	发行公司	国别
1	Coin Master	Moon Active	以色列	Brawl Stars	Supercell	芬兰
2	Candy Crush Saga	King	英国	Color Bump 3D	Good Job Games	土耳其
3	Clash of Clans	Supercell	芬兰	Fun Race 3D	Good Job Games	土耳其
4	Brawl Stars	Supercell	芬兰	CallofDuty: Mobile	Activision	美国
5	Gardenscapes	Playrix	俄罗斯	Homescapes	Playrix	俄罗斯
6	Homescapes	Playrix	俄罗斯	Sand Balls	SayGames	白俄罗斯
7	Pokemon GO	Niantic	美国	Run Race 3D	Good Job Games	土耳其
8	Empires&Puzzles	Zynga	美国	Aquapark. io	Voodoo	法国
9	PUBG Mobile	Tencent	中国	PUBG Mobile	Tencent	中国
10	Clash Royale	Supercell	芬兰	Subway Surfers	SYBO Games	丹麦

资料来源: Sensor Tower。

（四）新兴数字服务出口领域市场主体的全球地位不突出

从市场主体看, 欧盟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能级较低。《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提出,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强国的两极, 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中, 中美两国企业合计占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 75%、物联网支出的 50%、公共云计算市场的 75% 以上, 并占全球 70 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 90%, 而整个欧洲份额仅为 4%。

尽管欧盟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很大, 但在新兴数字科技领域还没有世界级企业。基本全部被美国企业覆盖。2019 年, 福布斯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百强企业》, 评选出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 100 家数字科技企业。其中, 美国 38 家、中国 14 家、日本 13 家、欧盟 12 家。除了数量上不占优势, 欧盟上榜的企业排名普遍靠后, 主要位于 50 名以后。

究其原因, 一是美国数字科技企业抢占先机, 已经深入渗透欧洲市场, 客观上压缩了欧洲本土企业的市场空间。二是欧洲人口数量少, 互联网活跃用户绝对数量少, 加之多语言环境造成的天然障碍, 对本土数字科技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形成障碍。三是欧盟企

业对数字技术的利用程度不高，对互联网销售和营销重视不足，制约了在线业务扩展。2019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显示，只有 18% 的欧盟公司使用云服务，21% 的企业使用社交媒体与客户联系，在网上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中小企业数量停滞在 17% 左右。四是人力资源数字技能水平低。据统计，43% 的欧盟人口缺少数字技能，17% 则完全没有数字技能。在劳动力中，高水平数字技术人才短缺严重。10% 的劳动力没有数字技能，35% 没有基本数字技能，只有 3.7% 的劳动力具有高级互联网技能。

二、2019 年欧盟数字经济治理进展

（一）欧盟数字经济治理进程

金融危机后，欧盟积极寻找摆脱危机、提振经济的新举措，数字经济被提上日程，一系列围绕数字经济的政策应运而生。2015 年 5 月，欧盟发布《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规划文件，作为数字经济的宏观顶层设计，力图通过一系列举措移除法律和监管障碍，打造统一的数字市场，为欧盟经济注入新动力。单一数字市场战略确立了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最大化实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等 3 大支柱和 16 项具体措施。其后围绕《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密集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力求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规范化轨道，并努力在规范和发展间寻求平衡点。此外，各成员国也相继发布数字经济战略或行动计划。如英国的《英国数字战略》、德国的《数字经济 2025》等，尽管很多欧盟国家没有数字经济总体战略，但事实上其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大数据战略、人工智能战略或网络安全战略中。

总体来说，欧盟已经构建了覆盖全境、渗透各成员国、完整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框架，并积极争夺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二）网络安全治理

欧盟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治理，并在数字经济治理中保持了一贯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严格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安全，另一方面在保证数据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非个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发挥数字技术最大的社会经济潜力。2018 年 5 月，GDPR 正式实施，条例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一般规则，并协调欧盟成员国的相关数据隐私法律，为欧盟内外个人数据保护提供确定性法律保护。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先后于 2018 年 1 月和 2019 年 11 月发布了《GDPR 适用指南》和《GDPR 域外适用指南》，针对 GDPR 条款进行规范性解释，为条例实施提供有效指引。在个人数据以外的电子数据的处理方面，欧盟主张

数据流动自由化。2019 年 5 月,《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正式实施。条例针对欧盟范围内的机构、组织和企业,旨在保障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并对数据本地化要求、主管当局的数据获取及跨境合作、专业用户的数据迁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为有效应对数字化和连接性增加带来的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各类风险,进一步完善网络和信息通讯安全保护框架,2019 年 6 月,《欧盟网络安全法案》正式实施。《法案》规制内容主要为欧盟机构在处理个人用户、组织和企业网络安全问题的过程中加强网络安全结构、增强对数字技术的掌控、确保网络安全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制,旨在促进卫生、能源、金融和运输等关键部门的经济,特别是促进内部市场的运作。

(三) 重塑数字服务税规则

根据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全球以属地为标准对国际企业征税,这为大型互联网公司提供了避税便利,形成不公平竞争并对欧盟造成巨大税收损失。在国际税收规则协调进程缓慢的背景下,欧盟率先提出数字服务税改革解决方案。2018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一是长期解决方案,改革欧盟公司所得税适用于数字活动的规则,推动欧盟成员国对产生于其境内的互联网公司利润征税,纳入征税范围的互联网公司只要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在一个成员国内年收入超过 700 万欧元;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成员国内有 10 万名以上的用户;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一个成员国达成超过 3000 份数字服务商业合同。二是临时解决方案,对全球年收入 7.5 亿欧元,且在欧盟境内营业额达 5000 万欧元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征收 3% 的临时数字服务税。该提案在欧盟内部分歧严重,各成员国政府对如何定义数字服务内容无法达成一致,且招致爱尔兰、卢森堡等低税率成员国反对,提案没有获得通过。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利益诉求明确的国家陆续推出单边数字服务税方案。

(四) 欧盟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中的谈判立场

总体看,欧盟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中的立场经历了由防守到进攻的转变。在 2020 年 2 月 19 日发布的《单一数字市场战略》和《塑造欧洲数字未来》两份数字战略规划中,欧盟都提及在第一轮数字经济竞争中落后的事实,希望凭借强大的数字经济基础和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舞台积极作为,率先确立欧式数字贸易规则主导地位,并成为第二轮数字经济竞争的领导者。

欧盟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提议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实质性推动了国际税制改革进程。受欧盟提议的启发,印度、韩国、印尼、墨西哥、智利等多国都开始推动本国的数字服务税方案。在多边框架层面,作为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牵头人的经合组织(OECD)已

经对数字税的国际关系和利润分配提出了框架性概念，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管辖地和利润创造地不一致的现实，对《税收示范公约》中属地征税规则进行调整，确保各国能够对其领土内的数字利润征税，并致力于统一协调全球 137 个国家和地区就跨国数字企业缴税地点及缴税比例等新规则重启谈判，以尽快修改现行的跨境数字税则，形成全球共同框架，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则挑战。

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方面，欧盟在区域内和国际谈判中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原则，但坚持保持欧盟国家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个人隐私绝对安全和严格监管，这与美国在数字经济中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2019 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日本提出基于信任的跨境数据流动并积极推动建立数据流通联盟，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在《大阪数字经济宣言》上签字，承诺致力于推动全球数据的自由流动并制定规则。

三、欧盟数字贸易发展展望

从欧盟近年的数字经济政策走向看，数字化转型仍然是其经济发展的重头戏。2020 年 2 月 19 日，欧盟启动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塑造欧洲数字未来》，同时宣布《欧盟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等配套政策文件，覆盖数据、人工智能等多个数字经济领域。一方面实现数据赋能目标，在欧盟建立统一的数据市场，利用其境内产生的海量数据，在交通和医疗等行业培育新一轮创新，同时为小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公私部门合作调动整个产业链资源，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加快人工智能部署。由于人工智能系统非常复杂，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重大风险，因此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在一些高风险领域需要清晰的规则。欧盟将继续实施严格的消费者保护规定，以应对不公平商业行为并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按照计划，2020 年欧盟还将出台《欧盟数字服务法》作为配套法规以更好支持新一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在数字贸易领域，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2019 年欧盟相关成员国陆续宣布征收临时性数字服务税，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欧盟设定的数字服务税征收条件是全球年收入高于 7.5 亿欧元且 5000 万欧元来自欧盟的数字企业，征税对象的针对性很明确，主要是 Google、Facebook、Amazon（亚马逊）、Apple（苹果）等美国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2019 年美国与法国在数字服务税领域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法国宣布数字服务税征税方案后，美国随即发起对法国数字服务税的“301 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法国数字税歧视美国企业”为由，提出对价值 24 亿美元的法国进口商品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尽管美法间都致力于解决这一争议，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但法国追求“财政公平”和美国主张“非歧视性”的利益诉求不同，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

性不大。后续美国可能对意大利、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实施的数字税展开调查。2020 年，如果 OECD 框架下数字税改革方案进程受阻，欧盟单方面达成数字税方案，欧盟与美国之间必然形成一轮贸易报复和反制局面。

英国脱欧为欧盟数字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冲击和机遇。2020 年 2 月 1 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开始与欧盟在经贸关系领域展开谈判，预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脱欧过渡期。此后英国将以主权国家身份与欧盟重新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数字贸易领域对欧盟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欧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将不再适用于英国，未来英国与欧盟在信息技术产业的贸易关系可能经历一段摩擦期，冲击欧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第二，信息技术行业是英国对外部劳动力最大的行业。脱欧后，英国在人员自由流动、劳工标准、行业标准与法规方面的变化可能导致大量从业于英国数字科技领域的欧盟成员国劳动力回流欧盟区域内，为欧盟提供更加丰富的高水平劳动力。第三，英国离开欧盟统一市场后，已经适应欧盟规则的众多跨国数字科技企业，极有可能为了降低标准和制度的遵从成本，选择到英国以外的欧盟国家投资。第四，伦敦作为欧盟金融中心的地位将被逐渐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从而改变欧盟金融服务贸易格局。英国脱欧前，伦敦是欧盟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为欧盟成员国提供大量跨境金融服务。英国脱欧后，欧盟的金融服务贸易格局将更加多元化，伦敦承接的部分欧盟金融业务将逐渐被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承接。

参考文献：

1. 肖汉雄，杨丹辉：《欧洲软件业与贸易的发展态势、影响因素及趋势展望》，《全球化》2018 年第 6 期。
2. 杨希：《欧盟个人数据保护体系的代际发展及借鉴——内部规制与外部扩展的典范》，《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3. ITU.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2019.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19.pdf>.
4. UNCTA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2466>.
5. OECD. *The OECD Digital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2019. Trade Policy Papers No. 221.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梁泳梅 李 钢

摘要：中资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对非洲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分别从以企业为主体的视角和以成果及产品为主体的视角分析了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影响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从以企业为主体的视角看，中资企业在非投资的影响路径包括较好地拉动当地就业，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当地人力资本的素质，通过培育供应商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能力，通过捐赠和社区服务等社会责任活动提升当地的包容性。从以成果和产品为主体的视角看，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基础设施增强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基础与空间，在非生产的产品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物质产品，提升了其生活水平。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非洲 对外投资

作者简介：梁泳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 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工业园区以及各种民生工程，有效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发展联动起来，提高了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增进了东道国的民生福祉。近年来，

^{*} 本文为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 19ZDA048）的成果。

中资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2019 年笔者前往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对中铁二局、中土埃塞公司、中车株机公司、埃塞东方工业园管委会、三圣药业等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大使馆经商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与埃塞本土企业家和普通民众进行了交流，对中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中资企业在非投资的情况及非洲国家包容性增长的情况

（一）中资企业在非投资情况

根据《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达 1430 亿美元，列全球第二位，其中流向非洲的投资有 5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主要流向刚果（金）、南非、莫桑比克、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从 FDI 的存量来看，中国是非洲的第五大投资来源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19》，2017 年末来自中国的 FDI 存量达 430 亿美元，仅次于法国、荷兰、美国 and 英国。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绝大多数为非金融类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等行业，这三大行业在 2018 年末的投资存量分别占中国对非总投资存量的 32.0%、22.7%和 13.0%（见表 1）。2018 年中国在非洲的绿地 FDI 项目为 11.9 亿美元。

表 1 2018 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单位：亿美元

行业	存量	占比（%）
建筑业	147.6	32.0
采矿业	104.8	22.7
制造业	59.7	13.0
金融业	50.7	11.0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29.7	6.4
小计	392.5	85.1

资料来源：《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中国已经成为这些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2018 年，埃塞俄比亚接受到的 FDI 有 33.1 亿美元，当年 FDI 存量达 222 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7.7%，埃塞俄比亚最大的 FDI 来源国前三名是沙特阿拉伯、中国和美国。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在近年有明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纺织、电力和电讯等行业。

（二）埃塞俄比亚包容性增长情况：工业基础薄弱、就业问题较突出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2019 年 GDP 为 756 亿美元，人均 GDP 为 720.3 美元。埃塞俄比亚经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低。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非常低。2005 年，埃塞俄比亚经济主要以农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分别占 GDP 的 45.6% 和 42.1%，工业较弱，仅占 13.2%。2010 年，工业占 GDP 比重甚至跌至 10.4%。同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多党议会选举中获胜开始执政，由于该政党对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重视，埃塞俄比亚的工业有了较快增长。2019 年，工业占 GDP 比重在 2019 年占到了 24.4%，第三产业占 39.4%，农业占 36.2%。但从整体上看，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另一个表现是，工业体系非常不完善，产业链不全，大多数产业无法在国内形成配套生产。埃塞俄比亚的工业目前主要有纺织、橡胶、皮革等少数行业。特点之二是：进出口失衡较严重，逆差巨大。由于工业薄弱，大量产品包括生产中的大量中间品都需要依赖进口。与此同时，能用于出口的产品却很少，主要出口价值量较低的农产品，尤其是咖啡。例如，2016 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商品出口总额为 17.2 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是咖啡产品，占 7.2 亿美元，第二大类出口产品则是豆类等干蔬菜，占 2.5 亿美元。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自然带来大额的国际收支赤字，2019 年该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为 55 亿美元，从而导致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工业生产中许多需要大量进口中间品的行业都受到了影响，产能利用严重低下。

就业问题是埃塞俄比亚包容性方面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埃塞俄比亚中央统计局对城镇就业的调查数据，2018 年埃塞俄比亚 14 岁以上的城镇人口约为 1323 万人，城镇失业率为 19.1%，最高峰时 1999 年曾达 26.4%。2018 年 15~29 岁年轻人口的失业率是 25.3%，而且在 15~29 岁的失业人口中，有 23.2% 是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埃塞俄比亚中央统计局关于 2018 年城镇就业的调查显示，城镇 10 岁及以上的人口，被雇佣率为 50.1%。在这些就业人群中，有 52.3% 是有薪雇员，41.1% 是自雇人群，而无薪的家庭工人的数目也不少，占被雇佣人口的 4.6%。埃塞俄比亚通常认为，其农村人口基本是不存在失业问题的。例如，埃塞俄比亚早在 1982 年的一项农村劳动力调查就显示，有 97.5% 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但是，该调查同时也发现，就业人群中有 50% 的人是无薪的家庭工人。埃塞俄比亚就业人口的工资也比较低，根据 2018 年城镇就业的调查，有薪雇员的月平均工资为 3131.7 比尔（约为 693 元人民币）。

埃塞俄比亚无论是在增长还是在包容性方面，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中资企业在非直接投资，正好为埃塞俄比亚的包容性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帮助。

二、FDI 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增长的增长模式，其核心是“增长”，包容性则是对增长的方式和结果的要求。对于包容性的解读和定义有很多方面及维度，例如，经合组织（OECD）认为包容性强调社会整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且能公平分享成果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包容性更加强调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本来就蕴含了扶贫的要求，可以通过增加就业和较普遍地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来实现。另外，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包容性增长还要考虑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得到了大部分文献从理论到实证上的支持。FDI 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现代技术和资本投入，Steve（2014）使用 50 个非洲国家 1980—2009 年间的面板数据，测算 FDI 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 1980—1994 年间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1995—2009 年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向正面。

FDI 会产生溢出效应，并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FDI 的溢出效应可以分为横向溢出效应和纵向溢出效应。横向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业务内容相似但技术水平有差异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主要是技术的转移。而且，外国公司生产的新产品，也给了本土企业采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提供了信心及可行性保障（Meyer，2004）。纵向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不同的产业之间，例如，外国投资公司通过向本土企业采购中间产品来增加市场需求，促进本土企业扩大生产（Rorg，Greenaway，2004）；或者是帮助本土企业改进管理和组织架构，改善所供产品的质量、提供技术支持等（Meyer，2004）。

同时，FDI 还有力地推进了技术进步。Findlay（1978）认为 FDI 通过外国公司使用的更先进的技术、管理实践等方式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溢出效应。Rorg 和 Greenaway（2004）提出，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技术，同时还包括管理方式、营销能力，以及通过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而获得的实际市场准入等。Crespo 和 Fontoura（2007）总结了 FDI 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途径，一是示范和模仿，即东道国本土企业通过模仿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获得进步；二是劳动力流动，即员工在跨国公司获得新技术后再流动到本土企业，促进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三是竞争，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提升了其技术和资源配置利用水平；四是将本土企业纳入跨国公司的产

业链中，如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或者是成为跨国公司中间产品的客户。

（二）FDI 对降低贫困、提高居民收入的影响

FDI 对包容性的影响包括多个方面，增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降低了贫困等。对包容性的影响是通过其他因素发挥间接作用，通过推动技术进步等溢出效应来提高居民收入。外国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劳动力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使这部分劳动者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和更高的劳动收入（Borensztein et al, 1998）。对于降低贫困的影响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的，政府能够从 FDI 建立的企业中收取税收，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并为民众提供有利于减贫的公共服务（Klein, 2001）。但是 FDI 对于降低贫困的作用大小还取决于东道国的一系列因素（Mercy, Nicholas, 2017）。如果对国内投资是一种补充作用，则 FDI 对减少贫困十分有利；如果对国内投资是一种替代作用，则有可能挤掉了总投资对减贫的影响（De Mello, 1999）。另外，FDI 所采用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绿地投资对减贫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并购和重组（Meyer, 2004）。还有，FDI 进入东道国的目标也会产生不同的减贫效果。为了东道国市场而来的 FDI，较有可能导致本土就业的增加；为了原材料而来的 FDI，更可能使出口受益而非减贫受益（Chang, 2003）。

除了理论研究外，国外也有小部分研究从实证上分析 FDI 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的影响。以非洲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其中，Gohou 和 Soumare（2012）就 FDI 对非洲国家的减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总体上看 FDI 有效减少了非洲地区的贫困，大约 1 美元的人均 FDI 能够提升人类发展指数（HDI）0.5 个基点；但是 FDI 对福利的影响也因地区而异，FDI 对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福利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但对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影响不大，对西部非洲的结果有好有坏。总体来看，国家越贫穷，FDI 对提高民众福利的影响就越大。Fowowe 和 Shuaibu（2014）针对 30 个非洲国家做了 FDI 对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 FDI 确实对于降低贫困有积极的作用，越是贫困率较高的贫穷国家，FDI 对减贫的积极作用就越明显。另外，有少部分文献实证研究认为 FDI 加重了贫困，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拉美国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从文献分析来看，FDI 对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确定。通过对中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的案例分析，确定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造福非洲人民，中资企业还做了许多特别的努力。对这些做法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 FDI 影响当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有利于提供更丰富的视角来看待 FDI 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三、从企业为主体的视角看中资企业在非投资 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可以按照产生影响的主体不同分两个视角来进行考查。第一个视角是从产生影响的主体是中资企业本身，或者说中资企业在非洲进行生产这种活动本身来看其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由于企业生产需要雇佣当地劳动力并支付劳动力工资，必然会对当地的就业和居民收入产生正面影响。而中资企业在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中，又特别注重对当地员工各种技术和能力的培养，因此其对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尤其深远。第二个视角是中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或者是投资的成果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由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类建设以及制造业产业，其修建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从物质上为非洲日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提供的当地原本十分短缺的药品等工业产品，为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的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源于一般性的 FDI 对东道国所产生的拉动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在于中国企业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多数中国企业愿意无私地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技术和能力培训；中国企业所传递的勤劳奋斗的精神与文明有利于更好地推动非洲当地快速发展经济；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当地的社区服务和捐资助学等活动，也直接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包容性。

（一）中资企业在非投资拉动当地就业并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曾有报告指出，2005—2016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了 293 个项目，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13 万个。2016 年，来自中国的 FDI 在非洲创造的就业岗位达 38417 个，是美国（11430 个）的 3 倍多。中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占当年全球 FDI 在非创造的就业岗位的 29.7%。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筑业、制造业等，制造业又主要为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埃塞俄比亚的中资企业，绝大部分的用工都来自当地，较好地拉动了当地的就业。例如，中铁二局在建设亚吉铁路和埃塞俄比亚轻轨时，施工期间聘请的当地雇员超过 15000 人。在亚吉铁路施工高峰期，雇用的当地员工占总用工量的 90% 以上；在亚吉铁路运营期间，也雇用了 2000 多名当地员工。依托于亚吉铁路这个主要的交通和物流运输大动脉，埃塞政府在沿线规划了 14 个工业园。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埃塞有限公司承建了其中 5 个工业园项目，光施工部

分就雇佣了当地员工 3 万余人。工业园区建设好后，成为了当地稳定的就业吸纳器。例如，2018 年投资的阿瓦萨工业园，如今就有 2.9 万当地人在园区内就业，待全面开工投产后预计能提供 6 万个工业岗位。

另外，也有众多的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非洲或进入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或者设立工业园。例如，中国在埃塞的首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东方工业园，引进了华坚制鞋、三圣药业、利达牛仔裤厂等企业，至 2018 年已经吸引了 83 家企业，创造了 1.3 万个就业岗位。在拉动就业的同时，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还较大地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一般而言，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雇佣当地员工所付的薪酬都要高于一般的本地企业。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在东方工业园的纺织企业工作的工厂，平均薪酬要比一般的埃塞企业多出 50% 左右。而修建亚吉铁路的中铁二局给当地工人的薪酬更高，通常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一般埃塞企业的 2 倍多。

（二）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大幅提升当地人力资本的素质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劳动力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动力素质不仅仅是指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而获得的文化程度，还包括对于实操技术的把握、企业和社会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与经验，以及整个民族或者是劳动力主体对于工业文明的认可及由此带来的对工作与休闲之间取舍平衡的观念改变等内容，后面的这些内容均很难通过教育而只能通过参与到现代工业化的发展中才能获得。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及中国企业对非洲劳动力的雇佣，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素质，尤其是提升了不能通过教育而只能通过就业才能获得的那些素质。

1. 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当地劳动力的素质。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作为人才基础，而这也正是多数非洲国家所缺乏的。为了更好地推动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还在非洲投资建设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为非洲国家培训专业技术人才。例如，2019 年，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吉布提建设成了非洲第一个“鲁班工坊”，为当地培养轨道交通专业和物流商贸专业等 4 个专业的技术人才。而且“鲁班工坊”是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紧密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吉布提“鲁班工坊”设有铁道运营实训区、机车模拟驾驶实训区、企业模拟经营认知实训室、叉车驾驶技能实训区等多个高标准教学区，并在亚吉铁路那噶德车站设立了“校外实训基地”。中国投资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弥补了当地没有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的空白，为非洲国家培养了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2. 提供工业化的训练。有些非洲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由于还没有进入工业化阶

段，大部分劳动力都还不适应工业生产的工作时间安排，纪律性和时间观念都不强。例如，在笔者调研过程中，不少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的企业都反映，与中国工人相比，埃塞工人更倾向于休闲而不是工作。埃塞俄比亚实行周薪制，每周发放一次工资。部分埃塞工人会在拿到一周的工资之后，就去买酒喝和休闲了，下一周就不到工厂上班了。等到什么时候工资花完了，便又重新返回工厂寻找工作。于是，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给埃塞俄比亚员工进行的培训，不仅仅包括技术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工业化文明所内涵的努力工作等文化。中华民族作为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员工为埃塞俄比亚员工言传身教的展示了勤劳、努力、实干、奋斗的精神。许多中资企业的埃塞俄比亚员工都感受到了这种民族精神的冲击，并坦言他们也应该更好地学习这种勤劳和奋斗的精神，以获取更美好的生活。

3. 对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培养。由于埃塞俄比亚相对落后，人才缺乏，缺乏大型项目的管理运营经验。中资企业在埃塞的投资并不局限于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提供运营等服务，以帮助埃方运营人才快速成长，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如，在亚吉铁路完成建设之后，铁路承建方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又签约了亚吉铁路 6 年运营权，将中国的铁路运营理念和模式引入到埃塞俄比亚，并积极地为埃塞俄比亚培训运营和管理人才。中方通过组织埃塞俄比亚员工，包括列车司机、乘务员、通讯员等到国内进行培训，开展“师带徒”一对一培训，以及邀请国内西南交大等院校的专业人员到埃塞俄比亚进行现场教学等方式，为当地培养运营团队，目前已有 2000 名当地员工获得了培训，这些员工未来将成为埃塞铁路事业的中坚力量。

4. 客观上为当地培养了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天生就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从无到有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家需要从工厂中、从企业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早期的企业家需要首先在工厂工作，获得一定的技术和能力，了解产品市场等信息，然后以这些技能和信息为基础，另外寻找资金，自己开设小企业并一步步将企业做大。这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道路之一。而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也希望非洲国家能够复制中国企业家成长的模式，培养出更多的非洲本土企业家，从而设立更多的非洲本土企业，增强经济活力和推进社会发展。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设立的工业园区，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萌芽和趋势。笔者到在埃塞设厂的三圣药业调研时，据该企业介绍，由于三圣药业在埃塞俄比亚的技术、设备尤其是管理方式都是非常先进的，因此在该企业工作了半年多的普通工人跳槽到了其他企业，就能轻易地直接成为那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另外，还有很少量的工人在中国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自己独立出来，在工业园周边开设了类似的企业或者是为中国企业提供中间品的企业，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的企业家。

（三）中资企业通过培育供应商，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还注意积极地培育当地供应商，形成良好的制造业发展生态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产业升级。在非洲进行生产的制造业企业与在中国进行生产的制造业企业相比，所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是产业配套不齐全，整个地区或国家的产业链条都比较短，对于重工业行业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生产中需要的大部分零部件供应商都较难在当地找到。这种状态，对于非洲国家整体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无疑也是很大的制约。因此，为了实现中资企业与非洲国家的共赢，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非常注重积极培育当地供应商的发展。例如，中车株机南非公司，为了在南非顺利进行电力机车生产，花费了五六年时间，针对企业所需要的 400 多种类型的中间产品，寻找了 330 家供应商，对其进行技术培训、技术转移和购买服务等方式的帮扶。其中，有 12 家供应商成为其重点帮扶对象，中车株机长期派遣技术人员到这些供应商中进行面对面的技术指导，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成功地将所需的复杂技术转移至当地供应商，使其能够自主进行配件的生产。通过中资企业对当地供应商的培育，实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互惠互利，共同成长，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

（四）中资企业进行的捐赠和社区服务活动，提升了当地的包容性

除了开展正常的商业业务和生产活动之外，中资企业通常还会在非洲当地进行捐赠和社区服务等活动。一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获得更多的认可从而更好地开展业务；二是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潮在中国已经相对成熟，中国企业已经有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认识到需要通过自身的活动来提升当地的包容性增长。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中资企业尤其是中资国有企业承担了较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和社区服务活动，提升了当地的包容性。例如，中土亚吉铁路项目在开工前，就已经制定了社会责任规划。项目开工后，中土集团中方项目管理人员主动去了解铁路沿线周边社区的民众有什么困难，并力所能及地为其解决困难。例如，中土集团在德雷达瓦地区捐助了当地学校，在孔博查市为当地小学生捐赠学习用品，向阿瓦萨当地小学生宣传普及工业园区知识。

另外，许多建筑类的中资企业还积极地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和专业优势，为项目周边的民众解决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引起的困难。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地区“饮水难”的问题。因为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多蕴藏在地下，而在旱季，偏远地区的村民需要去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取水，不仅取水难而且水质也不好。中土集团、中铁公司等中国企业在附近开设项目后，开始为当地居民派送水车、在营地外铺设水管、为当地居民打井并教会其打井技术，解决当地人的“饮水难”问题。

企业多花成本也真心实意地希望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看，在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鲜活地展现出了明显的共利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他利性。这种类型的外资企业对于提升东道国的包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从成果和产品为主体的视角看中资企业在非投资 对当地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中资企业在非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类建设以及制造业产业，主要成果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对非洲长期的包容性增长意义非常深远。另一类成果则是当地比较短缺的工业品（例如药品等），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其生活水平。

（一）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基础设施的综合作用

基础设施对于民众福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且明显的。相关研究表明，在非洲，与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规模相对比，基础设施对福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新的基础设施有利于改善生活水平并极大的提升民众整体幸福感。

中资企业在非投资最主要地集中在了建筑业，尤其是基础设施类的建筑业。至 2017 年，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助和融资修建的铁路及公路均已超过 5000 公里。其中，以亚吉铁路和蒙内铁路为代表的两个已经完工并成功运营的铁路项目，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投资之一。亚吉铁路是由中土集团与中铁二局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建设的铁路，全线长约 752 公里。该项目的埃塞俄比亚段 2011 年 12 月签约，吉布提段 2012 年 1 月签约，至 2016 年 10 月全线正式通车，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商业运营。亚吉铁路总合同金额为 40.8 亿美元（包含了全线设计、施工与机车车辆采购），其中绝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中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亚吉铁路的建成，弥补了埃塞俄比亚没有海岸线和出海口的地理劣势，打通了埃塞出海铁路大通道，打破了埃塞作为内陆国的发展局限性，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基础。亚吉铁路的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极大地缩短了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港口的货运时间。可以预见，该铁路对于促进贸易往来、提振国家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能有效改善区位优势和运输效率之外，亚吉铁路还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其他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亚吉铁路开通以来，带动了沿线经济带的发展。埃塞政府在亚吉铁路沿线或与亚吉铁路相连的公路附近，规划了 14 个工业园；此外，中国企业也在亚吉铁路沿线投资开发了多个工业园区。产业聚集的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工业园区建设与物流仓储业的发展，有效激发了沿线经济活力，沿线土地价格大幅增值，沿线民众就业大幅增加，初步起到了“一条铁路带动一条经济带”的效果。

（二）中资企业在非生产的产品极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制造业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中资企业投资的行业涉及纺织、制鞋、日用化工、制药、家具家电、汽车组装、装备制造等，其生产的产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中资企业生产的部分产品甚至还是非洲国家紧缺的物品，从而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三圣药业，是由中国重庆三圣股份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建设的，于2018年6月正式投产，主要生产埃塞俄比亚急需的抗感染类、消化类、心血管类的普通药品。埃塞俄比亚的药业企业非常少，规模也很小，技术水平更是有限，许多普通的药品如对乙酰氨基酚片、阿司匹林、氯化钠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等药品都无法生产。埃塞俄比亚国内85%的药品需求必须通过进口才能满足。三圣药业投产之后，较大地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医药产业的生产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对埃塞俄比亚民众的医药保障。

五、小结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增长十分迅速，对于当地的包容性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从以企业为主体的视角来看，一方面，由于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以及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其他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因此，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特别重视与强调“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提供工业化的训练、对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方式，真心实意地为提升非洲国家劳动者的技术和能力而展开了大量额外的工作。同时，还积极地培育当地供应商并进行技术转移培训，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企业除了在包容性增长方面为非洲国家贡献颇多，在包容性发展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履行社会责任，在非洲当地进行捐资助学、扶助和提供社区服务等活动，还帮助当地打井取水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困难，宁愿企业多花成本也真心实意地希望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上看，在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于提升东道国的包容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成果与生产产品为主体的视角来看，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增强了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与空间，同时也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物质产品，提升了其生活水平，增进了东道国的民生福祉。

可以说，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对于提升当地的包容性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影响，一部分来自于FDI所普遍共有的对东道国包容性增长的普遍性的、共性的提

升作用；另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来自“一带一路”深化发展背景下，中国企业所认可的“共建共享”“共同繁荣”的理念。由此理念而产生的中国企业为提升东道国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发展水平、为提升东道国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将比来自其他国家的 FDI 更有利于促进非洲地区的包容性增长。

参考文献：

1. Findlay, R. *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2, 1978.
2. N. Crespo, M. P. Fontoura. *Determinant factors of FDI spillovers – What do we really know?* World Dev., 35 (3) (2007).
3. Steve Loris Gui – Dibyab.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n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ree decades of panel data analyses*. Research in Economics, Volume 68, Issue 3, September 2014.
4. Gaston Gohou, Issouf Soumaré.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duce Poverty in Africa and are There Regional Difference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40, Issue 1, 2012.
5. Borensztein E., De Gregorio J. an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45, 1998.
6. Gorg H. and Greenaway D. *Much ado about nothing? Do domestic firms really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4 (2).
7. Meyer K. E. *Perspectives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4).
8. Mercy. T. MAGOMBEYI, Nicholas M. ODHIAMB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20, Number 2, 2017.
9. De Mello L. R. J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led growth: Evidence from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 51, 1999.
10. Chang H.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ssues*, Ha Joon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Anthem Press, 2003.
11. Klein M., Aaron C. and Hadjimichael B.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01.
12. Fowowe B. and Shuaibu M. I.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od for the poor? New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Eco Change Restruct, 2014.

责任编辑：沈家文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杨 萍 李 伟 应晓妮

摘要：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需坚持生态友好型发展理念。本文首先阐述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增长等相关理念，进而介绍日本生态城市、美国生态工业园区和美国芝加哥三州都市区绿色经济发展等国际经验。在介绍相关理念与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现状、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复杂深刻变化，提出长三角生态友好型发展需形成新模式，需由区域项目协同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转变。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权责边界并加强规划协调，统一市场准入和项目监管，统筹土地管理与盘活土地指标，破除制度障碍并促进要素流动等。

关键词：长三角 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 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杨 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李 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后；

应晓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根据《总体方案》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有利于率先探索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有利于率先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

一、生态友好型发展及相关国际经验

（一）生态友好型发展

1. 可持续发展

1992 年里约峰会首次提出发展应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为实现这种可持续性，应当将环境考虑纳入社会 and 经济发展。根据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将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与经济增长脱钩，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制定并发布《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① 提出了 17 项人类需要在 2030 年以前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决心采用统筹兼顾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到 2030 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的资源使用效率，按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案十年框架》，努力使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②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旨在“降耗、增量、提质”，即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通过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消耗、环境退化和污染，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净福利收益。

2. 绿色增长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绿色增长是指在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自然资产能不断提供人类福祉不可或缺的资源和服务。^③ 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增长的重要背景。绿色增长构想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而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集。绿色增长以可持续发展倡议为基础，旨在找到更清洁的增长来源，包括抓住机遇发展新的绿色产业、就业岗位和技术，同时也管理与向绿色经济转变相关的结构性变革。绿色增长是一个战略性概念，是能在经济与环境界面实现具体可衡量进展的政策运作议程，它使政府把环境放在中心位置来考虑。

根据 OECD 绿色增长分析框架和测度指标，对中国在全球绿色增长中的相对进程进

①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0/1。

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http://www.gywx.org/article/599>。

③OECD：《迈向绿色增长：给决策者的简介》，OECD 网站，2011 年 5 月。

行了系统评估。^① 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在提升资源环境生产率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需深入挖潜；现行政策尚不足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尤其是高速发展时期所累积形成的高污染负荷，必须充分依靠更为广泛的政策工具；未来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将环境因素真正融入不同层面的政府决策和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中，并确保产业与环境的政策目标和措施能够协调统一、相辅相成；从长远看，加快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持续改善双重目标至关重要。

任何绿色增长战略的基本要素都包括两大类政策。第一类是促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保护相互给力的广泛框架性政策。其中包括竞争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构架等。这是在人们熟悉的经济政策内容中增加一种新认知：环境和经济是可以双赢的。创新政策也应被加入这一类。第二类是激励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使污染者付出更高代价的那些政策。政策组合中既有基于价格的工具如环境相关征税，也有非市场工具如规章、技术扶持政策和自愿方法。

3. 生态友好型发展

根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位居“示范区”肩负的三大任务之首。在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中，“要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集约节约发展，加快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为长三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路径和提供示范”。可见，与绿色增长一样，生态友好型发展也是一个战略性概念，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政策议程和改革议程。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集，生态友好型发展就是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坚持绿色发展和集约节约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生态文明水平。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要在生产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实现废物的循环利用，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二）生态友好型一体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1. 日本生态城市（ECO TOWN）建设

在日本，生态城市是循环型经济社会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日本生态城市建设

^①OECD:《中国：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绿色和包容性增长》，OECD网站，2013年3月。

始于 1997 年，由其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共同负责。日本生态城市是在零排放的构想下，将产业所产生的废弃物再重新运用，作为其他领域的原料，即以总投入量等于总产量为终极目标，达到零废弃物。若再考虑废弃物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则为零排放。不仅是资源再生利用，对于环境冲击的减缓也有相当的贡献。甚至在资源再生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可作为暖气或热水的热源，垃圾可做成固体燃料，都有助于节省能源。总体而言，通过生态城市建设，不但可以发展新的产业、繁荣地方，而且可以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有助于节能减碳。

日本认为单一产业不易达成零废弃物的目标，但由数个产业组成的产业团体或跨行政区结合的区域全体共同参与，则有达成这一目标的可能。在跨行政区的一体化发展，创造不同于以往只注重大量生产的社会，属于全新的循环型生产系统。

日本循环型经济制度以《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为主，除了鼓励再使用、再生利用，也呼吁支持再生产品，以塑造或培育生态友好型产品市场，进而促进生态友好型经济蓬勃发展。

日本从点开始试行，再推广到面，藉由个体影响整体。各项技术细节，包括废弃物品回收范围是否有扩大潜力；既有静脉设施是否充分运用；搬运与处理是否经济有效；再生产品供应是否安全无虞等，在地方上经过逐一确认后方才进一步建立网络或推广至其他地区。在日本，人们提出 3R 制造概念，即减少原料（reduce）、重新利用（reuse）和物品回收（recycle）。生态城市内的 3R 业者，可以藉由计划的推动，整合地方政府、市民、废弃物制造者及相关业者，共同稳定提供循环资源，进而培育循环，促进地方发展。

2. 美国生态工业园区

工业部门向来为资源消耗量占比最大的部门，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如何将循环经济应用于工业部门更显重要。通过工业生态系统概念进行工业区资源整合、建立生态工业区体系、构建资源循环和高生态效益之产业环境，已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推进产业生态化及资源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抓手。

1993 年，美国成立白宫可持续发展委员会（PCSD），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PCSD 于 1995 年指定四个工业区作为示范性生态工业园区，即弗吉尼亚州的 Cape Charles、田纳西州的 Chattanooga、德州的 Brownsville 以及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其中位于美墨边境的 Brownsville 采用虚拟网络模式，即生态工业区的成员企业，不严格要求位于同一区域，而是通过计算机模型与资料库建立联系，构成区域间成员废弃物交换的网络连结，因此具有跨区域特性。

根据 PCSD 的定义，生态工业园区：一是一个彼此相互合作且与地方社区有效率地分享资源的企业体所形成的社区，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环境品质并促进关于人类商业及地方社区资源的公平。二是经过规划的物质及能源交换的系统，旨在寻求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最小化，减废并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关系。

3. 美国芝加哥三州都市区的绿色经济发展^①

大芝加哥都市区包括芝加哥及周边伊利诺、印地安那和密歇根三州相连地区（以下简称“三州都市区”）。面对日益紧张的环境压力和经济挑战，三州都市区认真分析判断绿色发展前景与发展机会，选择重点发展的绿色专业化部门，并根据专业化部门特点制定专门政策，以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和提升城市吸引力。从绿色经济发展行动实施效果看，三州都市区已显示出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三州都市区已成为美国重要且不断成长的绿色集群，特别是专业能源服务集群所在地。三州都市区中的密尔沃基（Milwaukee）都市区是美国最重要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水技术集群所在地。三州都市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绿色经济出口区，清洁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年出口值在 20 亿美元左右，大大领先于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都市区，上述都市区的绿色经济年出口值在 10 亿美元左右。另外，绿色经济的发展也对提升城市吸引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州都市区的绿色专业化部门与以往的专业化部门及发展基础密切相关。芝加哥市的四大专业化部门分别是：专业化能源服务、照明、绿色建筑和建设服务、暖通空调和建筑控制系统。芝加哥曾经拥有的气候交易所也为其储备了能够进行碳计算的环境专家。正是基于上述条件，芝加哥市有志于通过发展绿色建筑和绿色基础设施，成长为美国最佳环境友好型城市。密尔沃基大都市区拥有美国最强的水效率技术，还有与之相配套的空气和水净化技术。目前，有 150 多家公司和研究机构落户于密尔沃基大都市区，它们生产与水相关的产品，提供与水相关的服务，开展与水相关的研究。此外，电池技术、应用和照明也是密尔沃基大都市区重要的专业化部门。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愿景，三州都市区着力解决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力资本不足、技术储备不足问题，积极推动丰富的研发实验室优势向创新资产转化，设立优先投资于三州都市区的风险投资基金，完善创新生态环境，促进关键绿色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多层次治理体系等。

三州都市区在人力资本、创新和治理政策方面的主要经验有：一是需要私人部门和

^①OEC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Cities and Green Growth: The Case of the Chicago Tri-State Metropolitan AREA.

公共部门通力合作，以解决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短缺和技术错配问题；二是绿色发展相关的研发活动应加强与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当地企业能够从技术转让中获益；三是信息共享和统一能效计划有助于三州都市区为都市区绿色集群发展营造更稳定的营商环境；四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绿色研发、清除立法障碍、提供碳定价的清晰信号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三州都市区绿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小结

综上国际经验：第一，一体化有利于推进和实现生态友好型发展；第二，生态友好型发展离不开创新，要积极打造创新生态环境；第三，推动生态友好型发展，需要区域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合作；第四，绿色专业化部门选择离不开已有的发展基础和条件；第五，要努力解决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人才短缺、技术错配、治理体系不适应等问题；第六，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打造有利于绿色集群发展的稳定的营商环境。

二、推进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以下简称“两区一县”），面积约 2300 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约 350 平方公里）；并选择青浦区金泽镇、朱家角镇，吴江区黎里镇，嘉善县西塘镇、姚庄镇作为一体化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面积约 660 平方公里。

（一）发展现状

1. 水平较高，差异明显

示范区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仍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既有发展水平不同，也有发展势头和发展格局上的差异。2019 年，上海青浦区实现生产总值 1166.25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 9.46 万元/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0.6 : 37.2 : 62.2；苏州吴江区实现生产总值 1958.16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 14.93 万元/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9 : 51.5 : 46.6。苏州吴江产业基础较好，拥有丝绸纺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光电通讯四大主导产业，其中丝绸纺织、电子信息达千亿能级，光电通讯、装备制造为百亿能级。吴江人均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是青浦的 1.6 倍和 2.3 倍。嘉兴嘉善县发展水平居中。2018 年，嘉善县实现生产总值 582.6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 10.02 万元/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3.8 : 41.1 : 55.0。

2. 一体化发展开始起步

示范区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顺利起步。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共同推进示范区及先行区空间规划编制、重大项目梳理、组建管理推进机构等工作，组建示范区理事会及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于2019年11月5日挂牌运作，执委会结合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破题，研究形成了“项目清单”“制度创新和政策清单”。“两区一县”积极开展示范区建设相关工作。嘉善县设立县委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交通、能源、环保等18个专题工作组，对嘉善区域的定位、规划、布局、机制等进行研究，对先行启动区涉及的西塘、姚庄两镇开展全方位调查摸底，完成与上海、江苏的政策差异化研究。全县各领域深入开展了三地交流合作活动，建立毗邻地区界河保洁合作等一体化联动协作机制30多项。吴江区研究制定《吴江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形成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初步成果。制定支持汾湖先行启动区建设11条措施。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联合发布2019年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就产业协同、生态共保、服务共享等七个方面达成共识。沪苏湖高铁工程可获批，通苏嘉甬高铁稳步推进。顺利开通长三角跨省（上海、浙江）异地就医门诊直接刷卡结算。

3. 生态环境普遍改善

示范区“两区一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2019年，青浦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二级及优于二级的天数为283天，AQI优良率为77.5%，较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吴江空气优良天数为268天，优良率为73.4%。青浦19个地表水环境质量市考断面达标率为100%，较上年提高15.8个百分点；吴江7个“十三五”地表水环境质量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达到85.7%，比上年提高14.3个百分点。青浦区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79.28万吨标准煤，为控制量的92.2%，比上年下降5.3%；产值能耗0.0531吨标准煤/万元，下降1.1%。吴江全面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四项污染物指标排放量目标和上级下达的非电减煤任务。作为国家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嘉善生态文明样板区建设取得新进展。2019年1—6月，嘉善14个县控以上断面中，Ⅱ类水断面1个、Ⅲ类水断面10个、Ⅳ类水断面3个，分别占7.2%、71.4%、21.4%，与上年同期相比，Ⅱ类水断面增加1个，Ⅲ类水断面减少2个，Ⅳ类水断面增加2个，Ⅴ类水断面减少1个；PM_{2.5}平均浓度39μg/m³，同比改善15.2%；臭氧平均浓度为103μg/m³，同比改善5.5%。

（二）推进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 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

在快速全球化时期，区域一体化议题关注的重点一般是将区域整合进入全球经济体

系之中，通过区域规划、都市圈规划，使区域治理以一种开放式的沟通与合作的形式做更有效的整合及合作，解决由于行政区各自为政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问题，以维护和提升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加快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重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区域一体化的关键议题已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特别是生态环保和创新发展。关键议题的变化对示范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挑战与机遇并存。示范区集政策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基础于一身，完全可以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探索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和建设创新型社会，变压力为动力，为实现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

2. 国内发展条件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正在由中高速转向中速。受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储蓄率下降、结构调整、重化工业阶段逐步结束、城镇化速度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幅提升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行，估计由“十三五”时期的 6.5% 左右降至 5.5% 左右，比“十三五”时期低 1 个百分点左右。相对于 1978—2017 年 9.5% 的年均经济增速，5.5% 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我国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显现，一方面对示范区生态环保公益性项目建设财政保障产生不利影响，^① 另一方面也倒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保持较高、实现结构转型等目标的实现形成一定压力，需要把准方向，有所作为，逆势而上。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由小康社会向高质量社会转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人民群众对于美

^①2018 年 10 月底全球绿色经济高峰会（The World Green Economy Summit, WGES 2018），世界绿色经济组织委托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中心开展的研究成果《2018 年绿色经济报告：驱动商业、金融及政策创新》（The World Green Economy Report: Inspiring innovations in business, finance and policy, WGER 2018）指出：要全面落实绿色经济发展，主要挑战之一是确保投资。为达成联合国提出的 2030 年永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约为 2.5 兆美元。

好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民主参与等方面的诉求更高更广更多元。这为示范区推进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3. “对接上海”诉求与示范区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要求碰撞交融

区域内城市间的协作交流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长三角区域内，由于地缘相近、经济相依、语言相通（小长三角），又有长江、运河、太湖串连，历来就有不同形式、不同范围间城市相互协作与互通的传统。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越来越多的长三角城市将“对接上海”作为推动一体化进程、分享一体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和工作抓手。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上海已经拥有的中心城市地位，而且在于上海正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正在强化其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换句话说，对接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就是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主动分享上海的资源优势，主动捕获上海五大中心、四大功能建设中的发展机遇。

根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选择在沪苏浙三省市交界的区域建设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要探索不打破行政边界，引导交界区域从行政区向共建区演化发展，为全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探索有益经验。从2019年人均生产总值看，“两区一县”中，处于上海市外部圈层^①的青浦发展水平最低。可见，仅仅从青浦出发的共建无法满足“对接上海”的夙愿。实践中，如能发挥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地位，通过政策支持和“对接上海”诉求与示范区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要求在碰撞中不断交融，将有利于推动示范区由项目协同转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有利于更好调动和发挥“两区一县”各类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更好贯彻落实示范区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任务，更好达成示范区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目标。

三、探索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

（一）发展路径

根据《总体方案》，示范区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路径包括：一是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锚固生态基地，后植生态优势，构建优美和谐的生态空间，建设著名文化生态湖区，打造生态价值新高地。二是着力发展绿色经济，打造国际一流

^①根据地均建筑面积、三产能耗、地均产出、人口密度、房价、地均就业等9个指标的计算，可将上海市分为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部圈层。

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三是打造江南水乡文化品牌，建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打造绿色宜居新高地。

（二）重点任务

1. 稳住生态优势，构建良好生态本底

一是要加强太浦河饮用水安全保障，以太浦河为重点，大力推进周边及沿岸地区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岸线综合整治，对湖泊水体提出明确水质目标。二是要全面强化各类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执行国家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制定并实施分年度的落后产能淘汰方案。对精细化工、纺织印染、包装印刷、家具人造板、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砖瓦机械喷漆加工等行业加快推进升级改造。

2. 以自然与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为元规则设计新体制

近期，示范区可以对水田林草湖等要素试行生态银行办法，把分散的公共池塘资源集中起来变成资产，由专业化的第三部门进行保护和经营，获得的收益给资源所有者分红。长期内，需设计一个以“自然与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为元规则的新架构。

3. 利用区位优势，打造生态价值型产业

示范区需依托湖荡水网、田园风光、古镇文化等资源，提升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品质和能级。围绕环淀山湖、元荡、汾湖联合打造马拉松、自行车、水上运动等体育活动品牌，大力发展体育产业。融合科技、人文等元素，培育发展生物科技农业、创意农业、观光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

4. 发展绿色产业，孵化绿色科技

针对太湖蓝藻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以及淤泥、湿垃圾、危险废弃物处理等生态环境问题，引入和孵化出更多环保科技企业。发展智能制造集成、高端智能装备与测试设备、大数据及云计算、先进传感器及物联网、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高性能医疗设备、移动医疗等产业。进行产业布局规划，明确功能定位。

5. 推动系统能力转型

政府要从以前的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力转向搭建创新平台（如创建和管理公共—私人研发平台）、联接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系统、防治系统失灵、推动产权交易等能力转型。企业从规模扩张思路转向创新发展思路，今后应学会搭建企业产品开发平台、加强组织学习与集体学习、促进研发合作与形成研发网络。在社会层面，一要加强信任关系，建立和塑造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二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三要建

立、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

四、从区域项目协同到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长三角的一体化，还是珠三角的一体化，项目协同总是一体化最先开始的地方。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实现互联互通，可首先达成物理层面的一体化。但是从示范区而言，只有项目协同难以实现其定位和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与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相近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都是以政策议程的形式来不断取得共识，并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和推广的。因此，示范区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过程一定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制度的建设过程，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生态友好型发展之路。从目前情况看，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应关注以下方面。

（一）明确权责边界，加强规划协调

一是尽快明确执委会权责边界，赋予执委会在跨区域项目行政审批、项目管理等事项上的省级事权，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赋予其最大自由，切实发挥其统筹协调功能。部分需要细化的职能，可经报省市一级政府后，由执委会下放给“两区一县”政府，形成纵横结合的管理模式。执委会要引导“两区一县”做好投资项目储备，建立示范区重大基础设施和跨省域重大合作事项项目库，向国家争取划拨专项土地指标和奖补资金。

二是加强项目规划的协调性。重视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引入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绿色城市等建设理念，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智能化技术手段，提升规划设计水平。建立统一的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推进示范区各级各类规划成果统筹衔接、管理信息互通共享。

三是探索建立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推进税收征管一体化，实现地方办税服务平台数据交互，探索异地办税、区域通办。对新设企业形成的税收增量属地方收入部分实行跨地区分享，分享比例按确定期限根据因素变化进行调整。探索设立以区域土地出让金为资金来源的示范区项目协同发展专项资金，共同出资设立示范区投资开发基金，专门用于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

（二）统一市场准入，统一项目监管

一是制定统一的项目准入标准。在两省一市现行政策基础上，整合制定统一的示范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对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告知性备案。按照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聚焦投资强度、环境友好度和未来成长度，全力引进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优质项目。

二是建立统一的企业（项目）监管服务平台。建立统一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对跨区域重大项目探索建立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跟踪督办机制。建立示范区内企业自由迁移服务机制，对落户示范区的企业，在政策条件、程序方式和服务措施等方面执行统一的标准。梳理确定示范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建议清单和示范区政务服务通办事项电子证照共享应用清单，推动示范区政务服务事项的跨省通办。

三是建立健全跨地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探索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归集标准，共同研究制定示范区区域协同社会信用标准框架合作协议，探索设立“示范区信用科技实验室”。联合制定示范区内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办法，逐步探索建立失信行为标准互认、信息共享互动、惩戒措施路径互通的跨区域信用联合惩戒制度。

（三）统筹土地管理，盘活土地指标

一是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收储和出让管理机制，统筹平衡年度土地收储和出让计划，明确具体的用地结构、布局和规模。探索执行统一绩效标准和资源利用效率标准的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二是探索示范区内存量土地盘活机制，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承载容量。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开展调整（撤销）建设用地批文审批，盘活批而未供土地转用指标。推进存量用地二次开发，实施增量土地差别化出让制度改革。完善符合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要求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依法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进一步放活宅基地。

三是采用灵活的土地指标管理方式。探索建立跨区域统筹用地指标、盘活空间资源的土地管理机制，探索形成区域间统筹建设用地规模、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空间指标的创新机制。争取两省一市支持，适当给予示范区部分土地周转指标，用于临时性的土地周转和产业升级。调整示范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口径，将省级以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从建设用地总规模中分离出来，同时，规划新增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规模由省级层面或争取国家层面统筹安排。

（四）破除制度障碍，促进要素流通

一是在示范区建立土地使用权、排污权、用能权、产权等要素综合交易平台。建立技术创新成果市场交易平台，制定统一的成果转移转化支持政策，实现区内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市场化配置。加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合作，研究建立跨区域交易合作机制，

推进信息、场所、专家等资源共享，鼓励市场主体跨区域自主选择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二是探索建立统一的人才评价体系，破除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打破户籍、身份、人事关系等限制，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证书、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跨区域同行业认证、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人员资质互认互准。试点推行“人才绿卡”，促进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人才与企业科技人才的双向流动，完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加强对紧缺急需技能人才和高端人才的联合培养。制定示范区特殊人才需求清单，面向高层次和特需人才建立专门的服务平台和交流平台。推进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和培训实训资源共享，协同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国际人才招引政策，推动开展国际人才引进、国内人才居住落户、人才培养培养等领域创新试点。

参考文献：

1. 陈雯、孙伟、袁丰等：《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2. 黄征学、肖金成、李博雅：《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改革》2018 年第 12 期。
3. 席恺媛、朱虹：《长三角区域生态一体化的实践探索与困境摆脱》，《改革》2019 年第 3 期。
4. 马仁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政策供给及反思》，《学术论坛》2019 年第 5 期。
5. 梅亮、陈劲、余芳珍：《创新演进与范式转移——可持续转型理论的源起、特征与框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 年第 10 期。
6. 陈卓淳：《可持续转型理论中利基研究新进展》，《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 年第 4 期。
7. 刘志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再思考——兼论促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与手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8. Yeung Henry Wai - chung. Strategic coupling: East Asi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Mazzucato Mariana. Mission - 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8 (05).

责任编辑：谷 岳

· 产业 发展 ·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与建议*

丰晓旭 雷尚君

摘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特征是技术引领下的创新发展，同时二者还需要满足发展质量、综合竞争力、需求变动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在“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产业集聚升级、生活性服务的消费传导等内容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创新、投入、产出、需求和区域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模式也蕴藏其中。为推进“两业融合”的深度发展，在尊重市场供需选择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在扶持重点融合领域，协调区域发展关系，捋顺工作机制，培养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和人才体系建设方面精准发力。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丰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雷尚君，湖南工程学院经济学院讲师。

2019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与以往文件不同的是，此次文件直接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国生产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1903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升级战略与重大政策研究》（2020CJYB003）部分成果。

将融合发展的重点聚焦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阐述了一些新业态和重点领域，明确指出了当前“两业融合”的发展重点与方向。

本文围绕这一热点问题，从总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发展趋势和融合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应有范围、融合模式以及促进“两业融合”的政策做出分析。

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应有范围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内都是被广泛运用的概念，近些年不断出现在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地方政府的规划文本中，但在二者的概念和内涵方面存在不同的解释与界定。

对先进制造业的解释，陈宝明（2006）认为先进制造业应突出对高新技术成果、先进管理模式、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既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也包括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模式的应用已成为产业主导的那一部分传统制造业。殷醒民（2009）则从量化角度，提出以劳动生产率与盈利率来度量“先进制造”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重点。谢巧生（2019）认为先进制造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的，指具备先进技术、先进生产运营模式和先进组织方式，能够从研发到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采用高新技术和创新模式，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制造业。本文从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中总结和提取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特征，以此界定当前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应有内涵。具体来看，《中国制造 2025》中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定位突出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创新应用引领，强调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强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应用，努力争取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二是综合质量效益的提升，既对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有要求，又包括了产品质量提升、质量监管和品牌建设等内容；三是融合发展，其中主要强调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四是绿色化发展，要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从这些角度看，先进制造业既包括了新技术、新模式应用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创新业态，又包括了许多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上述四个原则性的特征是判断其先进性的主要依据。

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在国内使用广泛，最早出现于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被先后使用过。此后，在不少地方的五年发展规划中，都把现代服务业放在了重要位置。然而，对现代服务业内涵的界定及其包含的行业范围等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学术界普遍认为，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是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更加突出了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其发展的动力来

源包括社会总体进步，经济不断发展和分工的专业化等方面。王一鸣（2017）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征概括为：服务外部化、产业融合化、价值高端化、要素知识化、组织网络化、企业平台化、分布集聚化、结构生态化和发展离岸化，这些发展特征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表现形式。夏杰长等（2019）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由传统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和经营模式更新而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同时，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不能将其外延过度扩大，否则，现代服务业和服务业这两个概念就没有区别，而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标准就是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本文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沿用这一观点。

当然，科技创新与应用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两个概念的相对性特征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时间上的相对性，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与阶段，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认定范围是有选择性的；二是空间上的相对性，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会根据其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基础来认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上能够体现其先进性或现代性特征的，可称之为该时点下的先进制造业或现代服务业。

总结来看，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其首要的核心特征都是技术引领下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涵盖了新技术应用下的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等内容。对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中国来说，这种创新发展具有原则性和方向性，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至少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要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二是要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球综合竞争力；三是要更好地适应现代需求及其变动趋势；四是要遵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服务业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还需要从满足现代需求的角度考虑，将部分依靠新技术和新模式应用升级发展起来的现代生活性服务业纳入其中。而根据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与之相关联的能够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衍生制造也应该被纳入到先进制造业的范围之中。因此，我们不主张严格划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及界限，而应该突出技术与创新这一核心特征的重要性。从提升我国产业综合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繁荣问题需要重视，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问题同样需要高度关注，而“两业融合”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抓手。

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模式与表现形式

我们应该认识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受市场与政策双重影响的，积极拓展“两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这就需要我们分析“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入手，总结“两业融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发展情况，精准地寻找和分析政策引导的着力点与可行性。

（一）“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表现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也正处于产业深度融合与调整的战略变革时期，而能够体现融合发展的领域或业态基本上都符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属性特征。具体来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从发达国家产业演变历史看，基于专业化分工、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等角度的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日趋凸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地位开始不断提升。一方面，许多制造业企业逐渐选择外购从制造业内部分化出的或从市场内萌发的生产性服务，将其作为中间投入要素或生产过程的支撑型要素，以更好地实现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许多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客户的需求体验与服务保障，客户在产品消费中还需要消费大量的互补性和延伸性的服务，这些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了密切配合制造业争取更多价值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稳居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首，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偏重于组装制造，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价值链上游（如研发设计、前期研究等）和下游（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的许多高端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而以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为手段，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符合我国的产业发展要求。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2. 创新应用下的“两业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

随着价值链重心逐渐向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市场营销等服务领域转移，加上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需求端对服务的深远影响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的规模、速度、广度及深度不断提升。而“两业

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也在积极改变着传统的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受此影响，我国传统产业的原有边界变得愈发模糊。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一大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和消费的内容与方式。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成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主攻方向，新技术应用渗透到传统制造业的诸多环节，在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表现明显。因此，在工业 4.0 阶段，不能孤立看待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原有的服务外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多地表现为使得产品全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面向市场提供的是实物产品与全面服务的“泛产品”综合体。因此，产业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日趋减弱，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具体来看：

一是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企业竞合格局加速变化。从实践层面看，现代企业的经营业务拓展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同时存在，这直接导致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再固化，今天的合作伙伴可能成为明天的竞争对手，原来不相关的企业也可能迅速建立起互补关系，共同拓展市场，动态弹性的竞合格局或将更为普遍。

二是传统的产业形态也在发生直接变动。一方面，制造业的产业形态正在从传统的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制造业企业正在努力向价值链两段拓展和延伸，纷纷从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客户需求和产品服务系统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对研发、设计、物流、营销、品牌管理等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服务业制造化的现象也日渐明显，服务企业融入了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效益和生产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一些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服务企业，凭借其研发设计、物流网络、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其在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企业，发展起了自身的或为其服务的制造工厂。

两类变动的共同作用使得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经营范围与适应能力面临较大的调整与提升，许多新业态由此出现。例如，考验生产线和供应链的柔性定制、面向消费需求的服务衍生制造等。

3. “两业融合”成为传统产业集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产业集聚发展作为一种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特定发展阶段和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集群在资源配置效率、就业与收入、综合吸引力、经营成本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确带来了不少积极作用。国内学者引入了产业集群理论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广泛分析。在发展基础薄弱时期，制造业专业化集聚在短时期内使得许多地方获益很大，但那些积极的改善都集中在特定发展阶段。经历过数量与规模的积累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许多传统集聚产业园区的局限就开始逐渐显现，例如恶性竞争、成本压力、功能单一、协调性差等。

在新时代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对产业发展有了更新的定位与更高的目标。可以说，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服务，这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集聚区都面临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成为传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产业定位上，“两业融合”使其更加符合先进生产力和现代需求的发展方向；在产业配合上，“两业融合”会放大集聚发展所应该有的协调配合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在产业创新上，“两业融合”会强化集聚区内技术创新应用及其溢出效应的良性循环。

4. 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的需求也会传递到制造业领域

产业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产业体系之间的联动与配合，而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满足仍然离不开相应的实体产品制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直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现代需求已经成为引导我国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为相关联制造业的发展释放了强劲的新动力，对相应的配套生产也提出了高质量的新要求。

现代生活性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对接“泛产品”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拓展空间。例如，现代旅游服务的配套问题，为更好地迎合现代旅游者的消费需要，地方发展旅游业时，需要丰富本区域内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尽管旅游消费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仍然离不开实体产品制造的支持与配合，现代旅游装备、特色旅游商品、新技术娱乐体验等旅游消费内容都需要配套研发、制造与营销管理。又如，围绕“一老一小”的生活性服务配套问题，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决定了“一老一小”在现代消费中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潜力。健康养老服务需要更加智慧化的健康医疗一体化产品，围绕孩子的抚养、教育与成长催生了更多的细分市场，也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衍生出了更多发展机会。

（二）“两业融合”的五种一般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并概括出五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模式：

1. 创新驱动型融合

从创新应用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制造业在产品换代、商业模式、生产组织方式、运营模式和产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创新变革。一方面，在新兴技术驱动下，制造业纷纷从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服务为特色的服务型制

造转变升级，制造业的服务外包也在技术革新的影响下日趋市场化；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所需要的变革内容也正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所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现代服务业需要通过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技术创新应用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的广度与深度。

2. 投入互促型融合

从生产投入端看，随着生产性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制造业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中，服务投入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员工培训和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日益增加；同时，在许多服务业最终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制造业产品投入所占的比重也在加大，如移动通信与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服务也同样需要大量的制造业“硬件”投入。

3. 产出互补型融合

从产出端看，制造业实体产品必须与相应的配套服务绑定在一起使用，形成完整的互补关系，才能使消费者获得完整的功能体验，是一个集产品咨询、施工安装、使用指导、维护管理和报废回收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的“泛产品”，其内涵已经从单一的实体产品，扩展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全面解决方案。在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出互补融合的方式更加灵活，在线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不断加强。

4. 需求联动型融合

从需求的角度看，伴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生活性服务业焕发生机，由此引发众多周边衍生产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带动相关制造产业的共同发展。例如，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的繁荣发展能够带动大量的衍生制造需求，由此联动了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工艺纪念品、文化创意产品、电子图书音像制品、专业服装鞋帽、专业装备与器材、健康食品、医疗器械等实体产品的生产需求，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动式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在给相关服务业企业带来有效支撑的同时，也给相关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种紧密结合的联动发展模式极大丰富了“两业融合”的内容。

5. 集群互助型融合

从区域层面看，集群互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转型升级与价值攀升。在具体的实践中，集群互助至少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制造业集群与“依托制造业的服务业集群”之间的互助融合发展，实现二者的互相依存、渗透和融合，需要在供应链的优化、配套功能的衔接、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提升等方面加以重视；二是身处不同区域的制造业集群与纯服务

业集群之间的互促融合发展，实现二者在互助市场关系上的有效衔接，需要在市场供需机制与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努力。

（三）“两业融合”的三大表现形式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某一融合创新实践兼具多种模式的特征，这也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应有表现。在多种模式的选择中，“两业融合”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1. 服务型制造

服务型制造在本质上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价值链上的相互支撑与渗透，其动力依据来自市场的需求变动和厂商的价值提升。前者以制造业产出供给服务化为具体表现形式；后者以投入辅助服务化为具体表现形式。具体到先进制造业企业，融合内容涉及创意孵化、研发设计、共享平台建设、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现代生产性服务领域。“两业融合”进程的加快为服务型制造提供了更多协同盈利的新选择，有助于保持服务型制造在发展方向上的先进性。

2. 生产性服务专业化、社会化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更高，一方面，在拓展全球视野和聚焦最新应用的基础上，现有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亟需的支持服务领域内容；另一方面，有基础、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也需要积极利用优势业务板块，向社会提供第三方专业化服务，市场化地开拓盈利空间。一些制造业企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薄弱服务环节则转为向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市场寻求合作。

3. 服务衍生制造

服务衍生制造是在产需互动导向下发展起来的服务需求引致制造。具体到现代服务业当中，则表现为向制造环节的延伸与拓展。例如，品牌电商、文化旅游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企业通过积极整合要素资源，以委托制造和品牌授权等方式向相关联的制造领域拓展；科研院所、专业研发设计企业等单位则运用知识技术优势积极将成果应用到制造业领域；创意咨询类的企业将文化创意产业延伸到制造领域，也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等。

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政策着力点

随着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总体而言，其进程正处于高速上升的阶段，仍然有很大的进

步空间，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分析“两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助于更为精准地提出相应对策。

（一）“两业融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具体来看，我国的“两业融合”发展在创新应用程度、区域差异、配套政策、融合主体和人才支撑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

1. 融合深度不够，创新力度不足

随着政策层面的引导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认识开始不断增强。尽管在融合意识上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具体发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惯性思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多处于组装加工环节，受竞争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仍然安于现状，竞争策略上也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获取盈利的空间正在逐步被压缩；另一方面，许多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并未达到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要求的高度，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融合深度难以保证。

近些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较快，但其整体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研发设计方面，许多企业欠缺或没能达到先进技术所代表的核心竞争力；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方面，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走出去”方面，我国企业多为单兵突进，缺乏技术研发、市场研究、法律顾问、融资安排、风险管理等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配合。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两业融合”的深度亟待拓展。

2. 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协同性较差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发展程度与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各地方的起步基础、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基于地方利益和政绩观的影响，我国地方各自为政的产业引导情况普遍存在，在项目立项上缺少因地制宜的冷静思考和差异化互补性的科学分析，存在一定的盲目跟风和过度追热的情况，最终出现产业雷同性的竞争、载体重复性的建设、信息资源不成体系等许多资源浪费的问题。区域间协同性较差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两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3. 适应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滞后，政策配套难以落地

在范围上，“两业融合”发展涉及许多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整合问题，容易产生交叉行业和新业态。长期以来，部门间的主管范围和工作职责已经固化，在传统的部门分工面

前，融合发展所带来的许多边缘性新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在监管与服务上容易出现重叠矛盾与责任推诿并存的现象，这将直接导致政策服务配套与现实市场需求之间的对接出现偏差。例如，审批环节繁琐，获得资金支持相对困难，监管要求不一致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两业融合型企业实际困难的解决进度。融合创新相关的政策支撑和服务能力不足，适应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两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当前的一些政策较为笼统，难以落地发挥效用，融合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融合型企业在用地、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仍然存在，营商环境与配套服务仍需进一步改善。

4. 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融合型企业相对较弱

近年来，我国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部分企业对融合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有着较强的意识和能力，在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但整体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企业在组织规模、创新能力、服务技术、品牌质量和经营管理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对有形资产和生产规模扩张的关注程度大于对专利、人才、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关注程度，融合发展的能力与竞争力欠缺，服务收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相对还很低。

融合型企业相对较弱。具体来看，产业链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在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仍然欠缺；融合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微融合型企业成长缓慢，得不到有力支持，专精特新类企业的融合发展活力受到限制；平台型企业的融合效能与产学研间的融合贡献也都存在更大的发挥空间。

5. 融合型人才总量不足，区域分布差异明显

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创新应用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两业融合”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大量有融合视野和实践经验的跨界融合型人才。从整体上看，能够适应融合发展的人才供给总量仍显不足；从区域分布上看，同我国人才分布和集聚的发展现状一样，融合型人才分布同样表现为区域上的不平衡。融合型人才在空间与数量上的供需失衡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与产业布局与分工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存在地区吸引力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在推动本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招人难、留人更难”问题值得关注。基于人才共享的跨区域融合合作仍需要探索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

（二）推动“两业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代表了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方向与需求变动趋势，促进二

者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助于实现二者的互促共进，有助于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也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在尊重市场供需选择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针对“两业融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寻找政策发力点，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聚焦重点融合领域，构建精准扶持“政策工具箱”

结合我国的产业基础和全球的竞争环境，围绕能够体现创新应用发展方向和未来需求变动趋势的重点领域，在财税政策、引导基金、用工用地、标准建设、规划协调等方面精准发力，构建有利于融合发展的“政策工具箱”，是政府在政策层面亟需落实的首要问题。2019 年出台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已经确定了十大融合领域，内容涉及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互联网+”、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新能源生产使用、重点消费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在具体的阐述中又突出了智能化、平台化和衍生化的融合创新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未来在推进“两业融合”试点工作时，仍然要重视各地自身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融合实践，灵活推广融合发展经验，避免项目上的盲目开发与资源浪费。

除此以外，公共服务部分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也不能忽视。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考验了我国在防护用品方面的产能反应能力，也给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值得欣慰的是，尽管遇到春节工厂放假等问题，但在全中国上下一心的努力下，我国在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等方面的生产制造反应迅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抗击疫情的需要。从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看，强大且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涉及国家安全的诸多领域都需要健全长效的发展机制，为应对突发危机，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十分必要，产业价值链上的活动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程度越高，相关产能表现得越有韧性。具体到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既需要保证稳定必要的产能弹性，又需要尊重市场供需基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这更需要在政策和机制上落实改革要求。

2. 做好区域规划，协调发展关系

将“两业融合”发展战略纳入各个空间尺度的区域规划编制之中，并坚持“多规合一”以保证不同类型的规划都能对“两业融合”加以重视。结合各地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从总体布局和功能分区的角度，重点分析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情况，明确技术创新应用为代表的先进性和现代化发展方向，区分出待转型的区域、升级中的区域与先进（或现代）产业区域，推动区域分工协作，实现错位发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融合方面的区域整合能力。

协调好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关系，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资源整合、产业链拓展和服务功能辐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扶持与培育覆盖面大、兼容性强的共享服务平台，鼓励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间的平台信息共享。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区域性生产服务网络与产业生态圈，有机统筹发展关系，通过放大协同效应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制造与服务的互促共进。

3. 建立有利于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优化政策体系

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以服务“两业融合”发展需要为目的，捋顺工作流程，建立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明确产业融合交叉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明确监管机制，降低准入门槛，避免过度干预，构建支持产业融合的宽松政策环境。加快统计评价、产权保护、信用建设、招投标管理、资质与认证等领域的改革进程。

优化“两业融合”相关的政策体系。认真做好调研工作，主动听取相关企业诉求，向新技术和新模式引导的融合创新业态倾斜，将项目补贴、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用地调整、奖励配套等政策灵活运用到适合本地发展的重点融合领域。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融合发展引导基金，灵活设置申请标准。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条件，为辖区内的企业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常态化的“两业融合”咨询与培训服务，为有融合需要的企业争取资源、提供便利。

4. 培育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激活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通过扶持培育、引资新建、大众创业等多种方式培育多元化的融合发展主体，将扶持与服务落到实处。强化产业链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的引领及支撑效应，从创新应用、经营模式、品牌建设、经典项目等方面为行业内企业的融合实践探索可行路径；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和培养力度，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支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企业联盟、协作配套等方式开展业务上的合作与融合；提升平台型企业的资源整合效能，鼓励其拓展服务范围与服务深度；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特长优势，促进有利于“两业融合”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落地；支持行业协会围绕“两业融合”开展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市场咨询研究、经营管理创新、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以及配套的法律、融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在全球范围内锻炼企业的融合创新能力和协同发展能力。支持先进产品与现代服务的出口，重塑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品牌形象，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

5. 加强融合人才体系建设，储备优质人力资本

引进和培养既有融合视野又具有跨行业实践经验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行业管理人才与技术创新人才的储备力度；探索基层管理人员和操作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创新订单教育与精准培训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定向培养“两业融合”发展紧缺的各类人才。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支持融合型企业培养和储备自身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突破现有的人才管理评价制度，探索灵活的人才管理方式。探索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交流合作长效机制。鼓励地方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优化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对接需求的优惠政策。在吸引力较弱、引人留人困难的地区，需要改变传统思路，以实用为目标，多加重视对地方年轻人的培训、培养与扶持。

参考文献：

1. 陈宝明：《世界先进制造业创新与发展趋势及其启示》，《海峡科技与产业》2006 年第 5 期。
2. 殷醒民：《上海先进制造业发展重点的战略选择：产品技术还是产业技术？》，《上海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3. 谢巧生：《如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经济日报》2019 年 10 月 14 日。
4. 王一鸣：《加快建设服务业强国》，《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5. 夏杰长等：《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9 年版。
6. 王晓红、柯建飞：《全球服务贸易形势分析及展望》，《国际贸易》2018 年第 1 期。
7. 夏杰长：《体制创新与技术进步：促进我国服务业快速高质发展的“双引擎”》，《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3 期。
8. 张颖熙、夏杰长：《新时代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劳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5 期。
9. 魏翔：《亲子业态：从“大势”“大利”到“大道”》，《中国旅游报》2019 年 10 月 8 日。
10. 刘奕：《服务业空间协调与优化：新中国 70 年的探索》，《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10 期。
11. 王佳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制度障碍与政策建议》，《全球化》2019 年第 11 期。
12. 姚战琪：《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改革》2020 年第 1 期。
13. 夏杰长等：《迎接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

坚持多边主义 共渡全球时艰

——第六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及主论坛综述

2020年9月23—24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六届全球智库峰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战胜疫情、携手共进”。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00多位前高官、知名专家参会。与会专家围绕当今世界格局、全球治理困境、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国际经济形势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美关系调整推动世界格局变化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之变。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认为，中美已成为战略对手，双方的摩擦和冲突正在从贸易、技术领域逐步向金融、地缘等领域延伸，在南海、台湾甚至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关于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变化，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认为，当前美国面临十分突出的贫富差距、社会断层、种族人权问题，内部问题被外部化，影响到中美两国关系。美国不应过度渲染其民主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对立，强调非客观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只会导致美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下降，而是应“更谦虚地看待自己”，聚焦解决国内突出问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傅莹认为，美国自身陷入困境，心态又傲慢自负，对内治理失能、对外缺乏合作，美国右翼试图通过脱钩推动战略意图，以零和方式实现对自身霸权的护持。

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冲突和对立，各国均表示不希望“选边站”。吴作栋认为，如果中美两国出现冲突，对整个亚洲将是一场灾难，新加坡将难以自处。福田康夫指出，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邻国，美国是日本的同盟国，日本希望同时与邻国和盟国保持良好关系，不愿处于“选边站”的两难境地，愿意为缓和两国关系提供帮助。

关于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福田康夫认为，中美关系不同于过去的美苏关系，美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相互分割的，但中国与全球经济已经融为一体，甚至

中美两国在经济社会上也已深度交融，这一因素极大牵制了中美两国走向对抗。波兰前副总理科沃德克提出，2020 年 11 月的美国大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改善的起点，尽管两国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出现逆转，但双方都应从这一时点开始努力。

二、构建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与会专家均表达了对全球治理中多边主义力量衰落的担忧。曾培炎指出，当今全球治理出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四大“赤字”，个别国家把国内问题外部化、政治化，加大全球治理从整体走向破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风险。吴作栋表示，在过去四五十年里，全球治理主要表现的是向心力，现在更多表现的是离心力。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当今全球治理中多边主义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大幅退步。傅莹认为，当今世界面临各种危机叠加局面，单边主义正在世界上重新筑墙、制造隔绝、开全球化倒车。

围绕未来要建立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会专家达成高度共识，即要建立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科沃德克提出，全球治理应该是普惠的，未来的全球治理不应由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来主导，东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傅莹提出，全球治理应该是基于合作的，不能用 19 世纪的思维来解决 21 世纪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各国要本着共同合作而非凌驾式的、排他性的理念来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创新。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楼继伟提出，全球治理应该是基于规则的，现有国际机制和多边机构的改革也要基于规则，要区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不能把国内问题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马斯洛夫提出，全球治理要具有创新性，要涵盖国际公共卫生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自由贸易区等新的全球议题。

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大国应该发挥关键作用。福田康夫认为，构建新型国际合作格局最关键的是中美两国，稳定的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吴作栋强调“温和力量”的重要性，认为中美应通过“温和力量”共同建立正和而非零和、负和的全球游戏规则。科沃德克认为，法德合作在欧盟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美作为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可以借鉴法德合作方式，通过中美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在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二十国集团（G20）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借鉴经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 G20 功能。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国际事务执行主任穆勒认为，完善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中美合作，欧中合作也十分重要。近期欧中关系出现一些摩擦，双方应共同努力建立互信。马斯洛夫认为，完善全球治理要提升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上合组织等现有国际机制的有效性。

三、加强国际卫生合作迫在眉睫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深刻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荣誉主席、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认为，疫情是全球变局的“加速器”，加剧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全球化中赢家和输家的鸿沟越来越大。WHO 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认为，疫情正在加剧收入、阶层、性别等领域的全球大分化，并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

与会专家倡议，全球应高度认识国际卫生合作的重要性。黄坤明指出，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人类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凸显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依存的事实。应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国际议程的重要位置，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金兴钟认为，各国应坚持在 WHO 框架下开展合作，要坚持疫情信息的开放、透明和共享，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抗疫方面的援助力度，要建立疫苗研发应用的国际化机制安排。拉法兰批评美国退出 WHO 行为，认为在当前这一关键时刻应该强化和发展 WHO。陆克文提出，现在全球已有 9 种疫苗进入到临床阶段，但是世界 13% 的富裕国家人口占有了 51% 的疫苗产能，在实现疫苗高效生产和公平分配方面需要国际合作。吴作栋、陈冯富珍建议，要建立“疫苗多边化”机制，希望各个国家都有公平获得疫苗的机会。

四、全球经济恐将遭遇“寒冬”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近期新冠疫情又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世界经济大幅衰退。曾培炎认为，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可能不单单是一场“暴风雪”，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寒冬”。陆克文认为，新冠疫情正在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并将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关于全球应如何走出经济危机泥潭，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优化配置资源，妥善管控赤字；二是加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资；三是改进和投资人力资本，使其更好适应数字化社会；四是完善全球社会保障体系。香港中文大学讲习教授刘遵义提出，从全球经济的长远考虑，要共同推动零关税、零贸易壁垒、零出口限制、零补贴的“四零”方案。吴作栋提出，要看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变革的大势，希望各国在跨境电商方面加强合作，利用电商平台发展数字化多边贸易。

（梅冠群）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20 年 8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表现优于预期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

世界贸易组织 2020 年 10 月 6 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第三季度全球贸易强劲反弹，2020 年全球贸易整体表现将优于预期。但世贸组织经济学家警告，从中长期来看，受未来疫情发展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复苏之路仍不平坦。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 9.2%。2020 年 4 月曾预测全年全球贸易将萎缩 13%到 32%。全球贸易表现优于预期，部分归功于多个国家实施了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撑国民和企业收入，使消费和进口规模在“解封”后迅速反弹，经济活动加速恢复。报告将 2021 年全球贸易增长幅度从此前的 21.3%下调至 7.2%，强调 2021 年贸易规模将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复苏，将主要依赖未来投资和就业领域的表现，而这两者的表现都与企业信心密切相关。未来如果疫情反弹，政府重新实施“封锁”措施，企业信心也将动摇。从更长期来看，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也会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欠发达国家可能会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 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2020 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比 6 月的预测数据上调了 0.8 个百分点，并预计 2021 年增长率将反弹至 5.2%，比 6 月份预测低 0.2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仍深陷衰退，此次上调 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且有迹象显示第三季

度的复苏更为强劲。但这得益于超常规的刺激政策措施，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已向家庭及企业提供了约 12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但各国也要防范中期金融风险积聚。IMF 预测发达经济体 2020 年将衰退 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 4.3%，欧元区经济衰退 8.3%，英国经济衰退 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 3.3%。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 2020 年增长为 1.9%，2021 年将达到 8.2%。IMF 指出，“中国的复苏速度快于预期”，称在 4 月初大部分地区重新开放后，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快于预期，在强劲的政策支持和出口弹性的支撑下，第二季度 GDP 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正增长。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全球经济正从危机深渊中恢复，所有国家现在都将踏上“漫长的攀行之路”，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漫长、坎坷而充满不确定，且极易出现倒退。

（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经济 V 型复苏难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0 年 9 月 22 日发布的《2020 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实现 V 型复苏的概率不大。世界需要一个全球复苏计划，使得最脆弱的国家也能恢复到比疫情前更佳的状态。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4.3%，比危机前的预测值下跌了 6.8 个百分点。据此计算，到 2020 年年底，全球产出将减少超过 6 万亿美元。

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经济活动都严重萎缩，国际经济也是如此。2020 年全球贸易规模预计将缩水 1/5，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降 40%。报告预计，产出绝对降幅最大的将是发达国家，一些国家 2020 年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但是，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创伤，因为商品和旅游业是其外汇的主要来源，同时财政空间因债务高企而被挤压。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是解决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增长极度不均衡、难以持续的债务水平、低迷的投资、发达国家增长停滞的工资水平，以及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不足等。这些问题在疫情冲击之前就已经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健康运行。

（四）经合组织：疫情干扰教学或致全球经济缩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 年 9 月 8 日发布报告，由于学校教学活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干扰，几代人的教育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到 21 世纪末或将因此平均减少 1.5%。报告预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损失将导致日后工作技能的损失，并将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能引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OECD 表示，

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 GDP 减少 15.3 万亿美元。并且，OECD 预计，如果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的速度减慢，经济增长受到的损失还会“成比例的升高”。报告称，那些可接触到互联网和电脑，并且有家庭进行支持的学生可以更好地度过这段时期，寻找到更多学校之外的学习机会，但是那些处于劣势的学生往往在学校关闭期间就失去学习的机会。因此，由贫富差距引起的教育机会差别可能因此扩大。

（五）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体将出现近 60 年来首次萎缩

亚洲开发银行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布报告表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 2020 年将出现近 60 年来的首次萎缩。2020 年该地区的 GDP 将下降 0.7%，这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预计该地区 46 个经济体中的大约 3/4 在 2020 年将出现负增长。不过，预计 2021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升至 6.8%。在五个次区域中，预计只有东亚在 2020 年实现 1.3% 的正增长，2021 年将恢复到 7% 的强劲水平。中国经济逆势增长，预计 2020 年中国的 GDP 将增长 1.8%，2021 年将增长 7.7%。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行上调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世界银行 2020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预测，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2%，比 6 月初预计的 1% 上调 1 个百分点。报告预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 2020 年将增长 0.9%，这将是 1967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该地区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 2020 年将萎缩 3.5%。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2021 年的经济前景将好于 2020 年。基于疫苗可能问世、持续复苏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正常化的假设，预计 2021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7.9%，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将增长 5.1%。

（二）亚行：中国是亚太地区少数成功摆脱经济低迷的经济体之一

亚行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布《2020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报告称，由于国内外市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预计中国 2020 年 GDP 将增长 1.8%，2021 年增长率为 7.7%，较 4 月份的预测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较 6 月份的预测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预计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均会出现复苏。由于消费、出口、服务和零售均出现萎缩，2020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受影响，只有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了 1.5 个百分点。亚行预计，在 2020 年剩余时间内，投资将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消费将在 2020 年逐步复苏，并在 2021 年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亚行预计服务业的复苏将受到抑制，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将在 2020 年剩余时间内持续低迷。随着疫情期间的流动限制逐步放宽，经济活动逐步增加，

劳动力市场有望得到改善，年底前猪肉价格回归正常水平将使 2021 年的通货膨胀率降至 1.8%。

亚行表示，2020 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近 60 年来的首次萎缩，但该地区正在逐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破坏，预计 2021 年将会出现复苏。中国是本地区少数几个成功摆脱经济低迷的经济体之一。

（三）穆迪将中国 2020 年 GDP 增长预测上调至 1.9%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最新报告，将中国 2020 年 GDP 增长预测由原来的 1% 上调至 1.9%，对中国 2021 年 GDP 增长预测则维持在 7% 左右。带动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反弹的财政刺激措施，使得中国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处于强劲增长中。此外，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支出推动了总投资，与此同时，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医疗用品和电子产品需求的增加也带动了出口。

目前内地的家庭消费和私营部门投资的复苏仍然疲弱，零售销售连续 7 个月收缩，这显示了即使疫情已得到控制，但消费信心依然低迷，对服务的需求也可能进一步减弱，而家庭需求恢复正常的速度将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改善情况。报告预期，随着市民重返工作岗位，可支配收入将有所提高，这将增强消费需求。

（四）摩根士丹利：人民币 10 年后将成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 2020 年 9 月 4 日发布报告预测，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增加，这将推高人民币使用量，进而令其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分析师做这一预测的背景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占 2% 左右。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可能会升至 5% 到 10%，超过日元和英镑。这与该银行 2019 年 2 月所做的预测一致。摩根士丹利预测，在未来 10 年里，投资组合流入将比外国直接投资更重要，累计流入额将达到 3 万亿美元。报道认为，有了这些投资，以人民币形式持有的全球资产将增多。

摩根士丹利国际策略师詹姆斯·洛德在报告中表示：“考虑到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我们在股票和固定收益领域看到跨境资本市场融合度日益提高，以及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跨境交易的比例不断上升，设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占 5% 到 10% 的目标并非不切实际。”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1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10 月)				
世 界	3.5	2.8	-4.4	5.2
发达国家	2.2	1.7	-5.8	3.9
美 国	3.0	2.2	-4.3	3.1
欧元区	1.9	1.3	-8.3	5.2
日 本	0.3	0.7	-5.3	2.3
发展中国家	4.5	3.7	-3.3	6.0
印 度	6.1	4.2	-10.3	8.8
俄罗斯	2.5	1.3	-4.1	2.8
巴 西	1.3	1.1	-5.8	2.8
世界银行(WB,2020 年 6 月)				
世 界	3.0	2.4	-5.2	4.2
发达国家	2.1	1.6	-7.0	3.9
发展中国家	4.3	3.5	-2.5	4.6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0 年 10 月)				
世 界	3.1	2.5	-4.4	4.9
美 国	2.9	2.2	-4.0	3.7
欧元区	1.9	1.3	-7.5	5.3
日 本	0.3	0.7	-5.7	2.5
印 度	6.1	4.2	-9.7	10.9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1 年 预测值
世 界	3.8	1.0	-10.4	8.3
进口				
发达国家	3.6	1.7	-11.5	7.3
发展中国家	5.0	-0.6	-9.4	11.0
出口				
发达国家	3.5	1.3	-11.6	7.0
发展中国家	4.1	0.9	-7.7	9.5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估计值	2020 年 预测值	2021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10 月)				
世 界	3.6	3.5	3.2	3.4
发达国家	2.0	1.4	0.8	1.6
发展中国家	4.9	5.1	5.0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0 年 10 月)				
世 界	2.9	2.7	2.0	2.4
美 国	2.4	1.8	1.2	2.0
欧元区	1.8	1.2	0.3	0.9
日 本	1.0	0.5	0.0	0.0
印 度	3.4	4.8	5.5	4.4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二、美国经济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9 年		2.2	1.5	2.5
	9 月	1.9	1.2	2.3
	10 月	1.9	1.1	2.4
	11 月	1.9	1.1	2.8
	12 月	2.3	1.3	2.9
2020 年	1 月	2.1	1.5	3.3
	2 月	2.2	1.3	3.2
	3 月	2.2	0.7	3.0
	4 月	1.8	0.1	2.7
	5 月	1.6	0.0	2.3
	6 月	1.8	0.3	2.6
	7 月	1.7	0.4	2.8
	8 月	1.4	0.2	2.6
	9 月	1.5	0.1	2.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9 年		1.4	-0.5	3.4			
	9 月	2.3	0.7	3.7	49.7	50.1	49.4
	10 月	-0.6	-2.8	2.4	49.8	50.3	50.0
	11 月	0.0	-3.2	3.0	50.3	51.0	50.4
	12 月	1.8	-0.6	4.0	50.1	50.4	50.3
2020 年	1 月	-5.1	-2.4	-6.8	50.4	50.8	50.8
	2 月	-3.5	-0.9	-5.9	47.1	43.5	45.2
	3 月	-4.2	-6.1	-2.1	47.3	45.0	43.3
	4 月	-14.9	-20.0	-9.4	39.6	32.5	31.5
	5 月	-14.0	-20.6	-7.1	42.4	39.1	36.4
	6 月	-3.9	-9.7	1.5	47.9	47.3	46.8
	7 月	-4.5	-8.5	0.1	50.6	52.0	51.2
	8 月	-3.0	-7.5	1.5	51.8	53.6	52.8
	9 月				52.3	53.5	53.6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2018 年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3 季度	3.0	2.7	1.8
	4 季度	2.1	2.7	2.5
		1.3	1.6	-0.9
2019 年		2.2	2.4	2.3
	1 季度	2.9	1.8	2.5
	2 季度	1.5	3.7	5.0
	3 季度	2.6	2.7	2.1
2020 年	4 季度	2.4	1.6	2.4
	1 季度	-5.0	-6.9	1.3
	2 季度	-31.4	-33.2	2.5
	3 季度	33.1	40.7	-4.5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2018 年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3 季度	5.2	3.0	4.1
	4 季度	0.8	-5.2	8.0
		2.6	2.8	4.1
2019 年		1.9	-0.1	1.1
	1 季度	2.9	1.8	-2.1
	2 季度	-0.4	-4.5	1.7
	3 季度	2.4	0.8	0.5
2020 年	4 季度	1.0	3.4	-7.5
	1 季度	-1.4	-9.5	-15.0
	2 季度	-29.2	-64.4	-54.1
	3 季度	28.5	59.7	91.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2018 年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3 季度	3.0	2.7	1.8
	4 季度	3.1	3.0	2.4
2019 年		2.5	2.4	1.5
		2.2	2.4	2.3
	1 季度	2.3	2.3	1.7
	2 季度	2.0	2.4	2.3
2020 年	3 季度	2.1	2.5	2.2
	4 季度	2.3	2.5	3.0
	1 季度	0.3	0.2	2.7
	2 季度	-9.0	-10.2	2.1
	3 季度	-2.9	-2.9	0.4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5.2	3.0	4.1
	3 季度	5.7	2.6	5.2
	4 季度	4.0	0.5	3.0
2019 年		1.9	-0.1	1.1
	1 季度	2.7	0.3	2.4
	2 季度	1.5	-1.3	2.9
	3 季度	1.9	0.2	1.0
	4 季度	1.5	0.4	-1.9
2020 年				
	1 季度	0.4	-2.6	-5.3
	2 季度	-7.8	-23.9	-22.4
	3 季度	-2.4	-14.6	-8.9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9 年			1.9	3.7	213.3
	9 月	0.3	1.7	3.5	20.8
	10 月			3.6	18.5
	11 月			3.5	26.1
	12 月	1.6	1.9	3.5	18.4
2020 年					
	1 月			3.6	21.4
	2 月			3.5	25.1
	3 月	-0.3	0.9	4.4	-137.3
	4 月			14.7	-2078.7
	5 月			13.3	272.5
	6 月	10.1	2.8	11.1	478.1
	7 月			10.2	176.1
	8 月			8.4	148.9
	9 月			7.9	66.1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9 年	25329		0.0	34865		1.0	- 9536
8 月	2105	0.0	- 0.1	2613	- 0.1	0.0	- 508
9 月	2092	- 0.6	- 1.9	2570	- 1.6	- 2.9	- 478
10 月	2104	0.6	- 1.8	2534	- 1.4	- 5.0	- 430
11 月	2106	0.1	- 0.4	2516	- 0.7	- 3.6	- 411
12 月	2115	0.4	1.2	2572	2.2	- 3.1	- 457
2020 年							
1 月	2093	- 1.1	- 0.5	2526	- 1.8	- 2.6	- 434
2 月	2097	0.2	- 0.5	2467	- 2.4	- 4.4	- 370
3 月	1866	- 11.0	- 12.4	2327	- 5.7	- 11.2	- 461
4 月	1474	- 21.0	- 29.6	2010	- 13.7	- 22.3	- 536
5 月	1418	- 3.8	- 33.4	1997	- 0.6	- 24.4	- 579
6 月	1555	9.6	- 25.7	2089	4.7	- 20.0	- 535
7 月	1683	8.3	- 20.0	2317	10.9	- 11.4	- 634
8 月	1719	2.2	- 18.3	2390	3.2	- 8.5	- 671

注: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 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234	-1944	4178
	2 季度	-41	-1128	1087
	3 季度	1106	503	603
	4 季度	730	-707	1437
2019 年		2614	936	1678
	1 季度	768	-333	1101
	2 季度	680	889	-209
	3 季度	486	-28	514
2020 年		681	408	273
	1 季度	388	-78	466
	2 季度	126	609	-483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8 年		1.9	1.4	1.2
	2 季度	0.4	0.2	0.5
	3 季度	0.2	0.1	0.0
	4 季度	0.5	0.4	0.5
2019 年		1.3	1.3	1.9
	1 季度	0.5	0.6	0.6
	2 季度	0.1	0.2	0.4
	3 季度	0.3	0.3	0.6
	4 季度	0.0	0.1	0.3
2020 年	1 季度	-3.7	-4.5	0.8
	2 季度	-11.8	-12.4	-2.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2 季度	1.2	0.9	1.3
	3 季度	0.9	0.2	1.0
	4 季度	4.2	1.1	2.6
2019 年		5.8	2.5	3.9
	1 季度	-1.7	0.9	-0.8
	2 季度	6.4	0.1	3.5
	3 季度	-5.0	0.6	-2.4
	4 季度	5.6	0.0	2.2
2020 年	1 季度	-5.1	-3.8	-2.9
	2 季度	-17.1	-18.8	-18.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9 年		0.0		7.5	1226.8
	8 月			7.5	1223.3
	9 月	0.2	0.6	7.5	1223.7
	10 月			7.4	1213.4
	11 月			7.4	1213.1
	12 月	-0.2	-0.2	7.4	1213.3
2020 年	1 月			7.4	1219.6
	2 月			7.3	1196.0
	3 月	-3.5	-3.4	7.2	1181.9
	4 月			7.4	1194.5
	5 月			7.6	1214.6
	6 月	-9.1	-12.1	7.8	1257.4
	7 月			8.0	1293.7
	8 月			8.1	1318.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8 年		1.9	1.5	1.2
	2 季度	2.2	1.6	1.4
	3 季度	1.6	1.1	0.9
	4 季度	1.2	1.2	1.0
2019 年		1.3	1.3	1.9
	1 季度	1.5	1.3	1.7
	2 季度	1.3	1.3	1.6
	3 季度	1.4	1.5	2.2
2020 年		1.0	1.2	2.0
	1 季度	-3.3	-3.8	0.6
	2 季度	-14.8	-15.9	-2.4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2 季度	-1.5	4.3	1.1
	3 季度	3.5	3.1	4.2
	4 季度	7.1	2.0	4.9
2019 年		5.8	2.5	3.9
	1 季度	4.6	3.2	4.1
	2 季度	9.9	2.3	6.3
	3 季度	3.5	2.8	2.8
2020 年		4.9	1.7	2.4
	1 季度	1.3	-3.1	0.3
	2 季度	-21.0	-21.4	-2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年份	月份		(%)	(%)		(%)	(%)	进口额
2019 年		23454		2.7	21197		1.5	2257
	8 月	1953	0.4	-2.0	1760	-1.0	-3.7	192
	9 月	1966	0.7	5.4	1774	0.8	2.2	193
	10 月	2004	1.9	4.6	1761	-0.7	-2.6	242
	11 月	1947	-2.8	-2.6	1759	-0.1	-4.1	188
	12 月	1974	1.4	5.1	1742	-1.0	1.2	232
2020 年	1 月	1969	-0.3	0.3	1781	2.2	-0.3	188
	2 月	1983	0.7	1.2	1732	-2.7	-1.6	251
	3 月	1828	-7.8	-6.0	1559	-10.0	-10.3	269
	4 月	1358	-25.7	-30.0	1353	-13.2	-25.3	5
	5 月	1480	9.0	-29.9	1394	3.0	-26.7	86
	6 月	1637	10.6	-10.5	1477	6.0	-12.1	160
	7 月	1731	5.7	-10.5	1538	4.1	-14.4	193
	8 月	1765	2.0	-12.3	1546	0.5	-13.5	21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9 年		1168	1276	- 107
	8 月	- 510	- 148	- 362
	9 月	318	419	- 101
	10 月	- 370	- 165	- 205
	11 月	694	323	372
	12 月	- 950	- 1605	655
2020 年	1 月	- 58	22	- 80
	2 月	- 71	179	- 249
	3 月	- 476	- 535	58
	4 月	248	- 68	316
	5 月	1397	818	579
	6 月	- 86	- 521	435
	7 月	138	330	- 192
	8 月	366	621	- 255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8 年		0.3	0.0	0.9
	2 季度	0.4	0.2	- 0.3
	3 季度	- 0.8	- 0.2	0.2
	4 季度	0.6	0.4	0.7
2019 年		0.7	0.1	1.9
	1 季度	0.7	0.1	0.1
	2 季度	0.4	0.5	1.0
	3 季度	0.0	0.4	0.8
2020 年		- 1.8	- 2.9	0.3
	1 季度	- 0.6	- 0.7	0.0
	2 季度	- 7.9	- 7.9	- 0.6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6	3.5	3.7
	2 季度	1.6	0.8	0.8
	3 季度	- 3.3	- 2.3	- 1.4
	4 季度	3.0	1.6	4.7
2019 年		1.3	- 1.6	- 0.7
	1 季度	0.4	- 1.8	- 4.5
	2 季度	0.8	0.2	1.8
	3 季度	0.5	- 0.6	0.7
2020 年		- 3.3	0.4	- 2.4
	1 季度	0.5	- 5.4	- 4.2
	2 季度	- 2.9	- 18.5	- 0.5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8 年		0.3	0.0	0.9
	2 季度	1.0	- 0.3	0.8
	3 季度	- 0.3	0.2	0.9
	4 季度	- 0.4	0.0	1.3
2019 年		0.7	0.1	1.9
	1 季度	0.8	0.4	0.5
	2 季度	0.9	0.7	2.1
	3 季度	1.7	1.4	2.8
2020 年		- 0.7	- 1.9	2.3
	1 季度	- 1.8	- 2.4	2.1
	2 季度	- 9.9	- 10.6	0.7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6	3.5	3.7
	2 季度	1.8	5.9	3.2
	3 季度	- 1.2	1.7	3.0
	4 季度	0.7	1.3	5.0
2019 年		1.3	- 1.6	- 0.7
	1 季度	1.2	- 1.8	- 0.9
	2 季度	0.9	- 2.2	0.2
	3 季度	5.0	- 0.6	2.6
2020 年		- 1.7	- 1.8	- 4.4
	1 季度	- 1.5	- 5.7	- 4.3
	2 季度	- 5.2	- 23.3	- 6.1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9 年		- 1.7	1.60	2.4
	8 月	- 4.5	1.59	2.3
	9 月	1.5	1.58	2.4
	10 月	- 6.3	1.58	2.4
	11 月	- 4.5	1.57	2.2
	12 月	- 3.0	1.57	2.2
2020 年	1 月	- 4.8	1.49	2.4
	2 月	- 4.6	1.45	2.4
	3 月	- 4.8	1.39	2.5
	4 月	- 12.8	1.32	2.6
	5 月	- 17.8	1.20	2.9
	6 月	- 10.4	1.11	2.8
	7 月	- 10.9	1.08	2.9
	8 月		1.04	3.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日元								单位:%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月份		(%)	(%)		(%)	(%)		2018 年							
2019 年	769317		-5.6	785995		-5.0	-16678			2.9	2.2	3.0	2.8	7.1	5.2
9 月	63737	0.4	-5.2	64785	-0.7	-1.4	-1049	3 季度	2.4	2.8	2.6	2.5	6.8	5.2	
10 月	61222	-3.9	-9.2	63408	-2.1	-14.7	-2186	4 季度	3.1	1.3	1.1	2.0	7.3	5.2	
11 月	61254	0.1	-7.9	63616	0.3	-15.6	-2362	2019 年		2.1	-0.3	-1.2	2.7	6.9	5.0
12 月	61048	-0.3	-6.3	63044	-0.9	-4.8	-1996	1 季度	1.8	1.1	0.7	1.8	6.8	5.1	
2020 年								2 季度	2.1	-1.1	0.4	2.6	6.7	5.1	
1 月	59129	-3.1	-2.6	61667	-2.2	-3.6	-2538	3 季度	2.0	-0.4	-2.8	3.0	7.3	5.0	
2 月	61159	3.4	-1.0	57101	-7.4	-13.9	4059	4 季度	2.3	-0.7	-3.0	3.3	6.8	5.0	
3 月	58833	-3.8	-11.7	60920	6.7	-5.0	-2086	2020 年							
4 月	52204	-11.3	-21.9	61190	0.4	-7.1	-8987	1 季度	1.4	-1.3	-9.1	2.2	3.7	3.0	
5 月	49703	-4.8	-28.3	54327	-11.2	-26.1	-4624	2 季度	-2.7	-18.7	-9.0	-0.6	0.4	-5.3	
6 月	50297	1.2	-26.2	53694	-1.2	-14.4	-3398	3 季度					2.6		
7 月	53299	6.0	-19.2	52195	-2.8	-22.3	1104								
8 月	55818	4.7	-14.8	52246	0.1	-20.8	3572								
9 月	58325	4.5	-4.9	53567	2.5	-17.2	4758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9 年		40593	271798	-231205					
	8 月	3414	24050	-20636					
	9 月	1971	8316	-6345					
	10 月	-1349	9059	-10408					
	11 月	3426	16426	-13000					
	12 月	8065	29177	-21112					
2020 年									
	1 月	-1700	18055	-19755					
	2 月	1135	13493	-12358					
	3 月	3971	23087	-19116					
	4 月	-19	17389	-17408					
	5 月	3236	13441	-10205					
	6 月	49188	30995	18193					
	7 月	963	20771	-19808					
	8 月	4213	9760	-5547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1.9	1.4	0.8	1.3	6.8	2.3								
	2 季度	1.7	1.2	0.1	1.1	7.1	2.2								
	3 季度	2.0	1.4	1.3	1.5	6.2	2.2								
	4 季度	1.8	1.2	1.1	1.2	5.6	2.7								
2019 年		1.7	1.3	0.2	1.1	4.9	1.3								
	1 季度	1.5	1.7	0.0	0.6	5.7	0.4								
	2 季度	2.0	1.3	0.9	1.1	5.2	1.1								
	3 季度	1.6	1.0	0.1	1.2	4.4	1.5								
	4 季度	1.5	1.1	-0.5	1.7	4.1	2.1								
2020 年															
	1 季度	-0.9	-2.1	0.1	-0.3	3.1	1.6								
	2 季度	-13.0	-21.5	-17.1	-11.4	-23.9	-8.0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8 年		2.9	2.2	3.0	2.8	7.1	5.2
	3 季度	2.4	2.8	2.6	2.5	6.8	5.2
	4 季度	3.1	1.3	1.1	2.0	7.3	5.2
2019 年		2.1	-0.3	-1.2	2.7	6.9	5.0
	1 季度	1.8	1.1	0.7	1.8	6.8	5.1
	2 季度	2.1	-1.1	0.4	2.6	6.7	5.1
	3 季度	2.0	-0.4	-2.8	3.0	7.3	5.0
	4 季度	2.3	-0.7	-3.0	3.3	6.8	5.0
2020 年							
	1 季度	1.4	-1.3	-9.1	2.2	3.7	3.0
	2 季度	-2.7	-18.7	-9.0	-0.6	0.4	-5.3
	3 季度					2.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9 年		5.7	3.8	28.5	11.9	7.4	4.6								
	9 月	5.5	3.8	29.1	11.8	7.2	4.5								
	10 月	5.5	3.8		11.6	8.1	4.6								
	11 月	5.9	3.8		11.2	7.2	4.6								
	12 月	5.6	3.8	29.1	11.0	7.6	4.6								
2020 年															
	1 月	5.5	3.9		11.2	7.2	4.7								
	2 月	5.6	4.0		11.6	7.8	4.6								
	3 月	7.8	3.9	30.1	12.2	8.8	4.7								
	4 月	13.0	3.9		12.6	23.5	5.8								
	5 月	13.7	3.9		12.9	21.7	6.1								
	6 月	12.3	3.9	23.3	13.3	10.2	6.2								
	7 月	10.9	4.1		13.8	7.4	6.3								
	8 月	10.2	4.5			8.4	6.4								
	9 月	9.0				6.7	6.3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19 年		3.8	3.5	3.1	3.7	2.2	5.2								
	9 月	3.4	3.8	2.9	3.7	2.2	5.3								
	10 月	3.5	3.6	3.1	3.7										
	11 月	3.6	3.4	3.2	3.7										
	12 月	3.7	2.9	3.3	3.7	2.2									
2020 年															
	1 月	4.0	3.8	3.4	3.7										
	2 月	3.3	3.6	3.7	3.7										
	3 月	3.8	2.9	4.2	3.8	2.2	5.0								
	4 月	3.8	4.7	5.2	4.1										
	5 月	4.5	4.2	5.9	4.2										
	6 月	4.3	5.5	6.2	4.0	2.7									
	7 月	4.2	5.4	6.1	3.9										
	8 月	3.2	5.2	6.1	3.8										
	9 月	3.9	5.1	6.4	3.8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4469	4637	-168	4697	6958	-2261
8 月	371.5	399.9	-28.4	339.2	589.1	-249.9
9 月	371.8	381.5	-9.7	382.8	621.4	-238.6
10 月	385.7	401.4	-15.7	435.7	674.8	-239.1
11 月	363.0	370.0	-7.1	383.9	567.6	-183.6
12 月	379.2	356.3	22.9	402.8	507.0	-104.2
2020 年						
1 月	356.2	355.8	0.5	369.2	542.0	-172.8
2 月	335.3	345.4	-10.0	355.6	505.0	-149.4
3 月	345.2	361.7	-16.5	352.5	512.5	-160.0
4 月	234.4	264.1	-29.6	295.0	368.0	-72.9
5 月	243.8	252.1	-8.3	267.8	361.8	-94.0
6 月	303.3	328.0	-24.7	306.2	481.2	-174.9
7 月	319.8	353.8	-34.0	321.4	516.2	-194.9
8 月	329.7	361.2	-31.5	303.7	535.2	-231.5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900	881	19	2254	1773	481
8 月	80.3	76.0	4.4	196.7	155.7	41.0
9 月	74.4	70.9	3.5	203.0	165.0	38.0
10 月	82.4	80.6	1.8	195.8	170.3	25.5
11 月	78.7	74.9	3.8	177.4	141.7	35.7
12 月	71.4	61.4	10.0	185.0	125.6	59.5
2020 年						
1 月	70.1	71.6	-1.5	145.4	161.8	-16.4
2 月	72.8	63.3	9.5	157.0	132.6	24.4
3 月	70.9	56.5	14.4	188.1	145.2	42.9
4 月	28.4	47.4	-19.0	183.1	116.1	67.0
5 月	56.0	47.2	8.7	179.4	149.7	29.7
6 月	67.7	40.6	27.1	179.1	104.5	74.6
7 月	73.1	50.8	22.3	196.0	115.0	81.0
8 月				177.4	111.3	66.1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3249	4782	-1533	4199	2546	1653
9 月	260.3	377.1	-116.7	355.2	210.2	145.0
10 月	262.4	380.0	-117.6	370.7	239.1	131.6
11 月	257.6	385.0	-127.4	358.4	232.6	125.8
12 月	271.2	396.1	-124.9	396.2	243.9	152.3
2020 年						
1 月	258.7	411.7	-153.0	303.8	171.2	132.6
2 月	277.3	378.8	-101.6	285.0	186.7	98.3
3 月	213.8	311.7	-97.9	297.5	204.5	93.1
4 月	102.7	171.2	-68.5	247.3	175.9	71.4
5 月	191.0	222.0	-31.0	205.1	172.9	32.2
6 月	219.1	211.1	7.9	240.3	191.2	49.1
7 月	236.4	284.7	-48.3	242.3	194.5	47.8
8 月	227.0	294.7	-67.7	232.6	195.5	37.2
9 月	275.8	303.1	-27.3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5422	5033	389	4607	4553	54
9 月	446.3	387.4	58.9	371.9	373.4	-1.5
10 月	466.5	414.0	52.5	407.7	414.6	-6.9
11 月	440.4	407.3	33.1	374.7	367.1	7.7
12 月	456.7	436.9	19.8	387.3	355.9	31.3
2020 年						
1 月	431.1	427.3	3.8	335.9	360.7	-24.8
2 月	409.2	370.1	39.1	365.9	337.2	28.7
3 月	462.0	418.2	43.9	383.4	350.1	33.4
4 月	363.0	378.7	-15.7	233.9	264.7	-30.9
5 月	348.4	344.8	3.6	180.7	215.9	-35.2
6 月	392.3	356.2	36.1	330.8	275.3	55.5
7 月	428.0	387.0	41.1	356.6	298.6	58.0
8 月	395.7	357.4	38.4	369.8	308.6	61.2
9 月	480.5	391.7	88.8	385.5	341.6	43.8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5349	5778	-429	3293	2858	435
9 月	461.5	491.8	-30.3	281.0	249.6	31.5
10 月	465.5	490.9	-25.3	289.8	250.4	39.4
11 月	472.6	501.7	-29.2	285.7	242.8	42.8
12 月	482.4	505.4	-22.9	294.8	269.8	25.1
2020 年						
1 月	366.0	405.2	-39.2	250.5	216.1	34.4
2 月	315.9	367.7	-51.9	253.8	220.8	33.0
3 月	445.3	482.0	-36.7	282.7	254.8	27.8
4 月	443.9	452.5	-8.6	252.4	229.7	22.7
5 月	460.7	443.9	16.8	270.0	222.8	47.2
6 月	426.9	457.8	-31.0	271.3	222.9	48.4
7 月	461.0	477.3	-16.3	282.0	228.3	53.7
8 月	495.6	482.6	13.0	311.7	247.1	64.7
9 月				307.1	235.8	71.4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9 年	2643	2539	104	1685	1707	-22
10 月	242.3	223.7	18.6	149.3	147.6	1.8
11 月	227.9	213.4	14.5	139.5	153.4	-13.9
12 月	225.6	223.0	2.6	144.7	145.0	-0.3
2020 年						
1 月	183.2	186.0	-2.8	136.3	142.7	-6.4
2 月	112.8	89.3	23.5	140.6	115.5	25.1
3 月	241.3	221.5	19.8	140.7	133.5	7.2
4 月	175.8	185.2	-9.4	121.6	125.4	-3.8
5 月	191.9	181.8	10.1	104.5	84.4	20.1
6 月	225.6	207.1	18.5	120.1	107.6	12.5
7 月	248.7	221.0	27.7	137.0	104.6	32.4
8 月	265.0	230.0	35.0	131.0	107.4	23.5
9 月	271.6	242.0	29.6	140.1	115.7	24.4
10 月	267.0	245.0	22.0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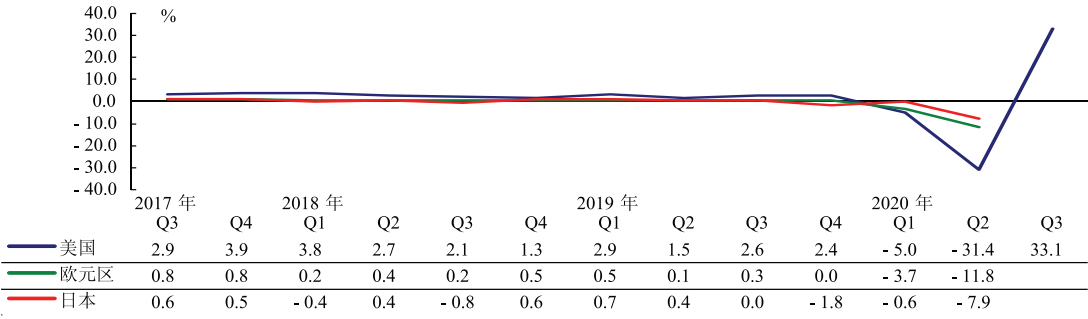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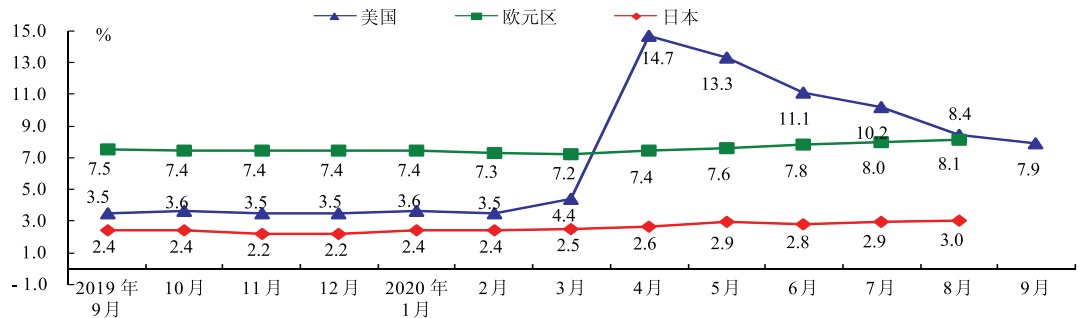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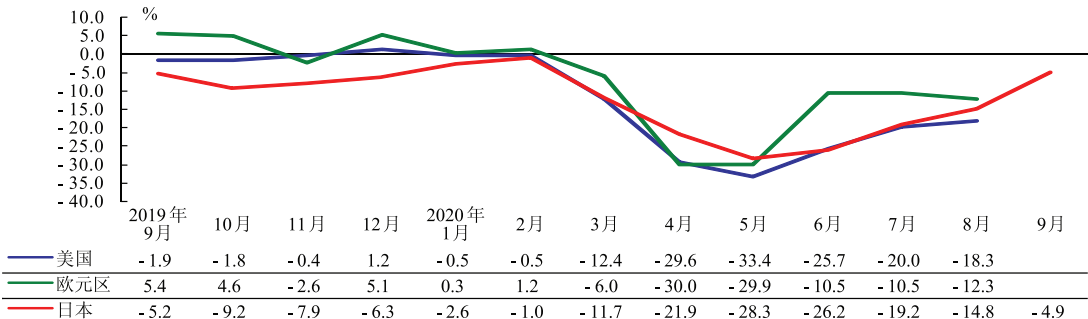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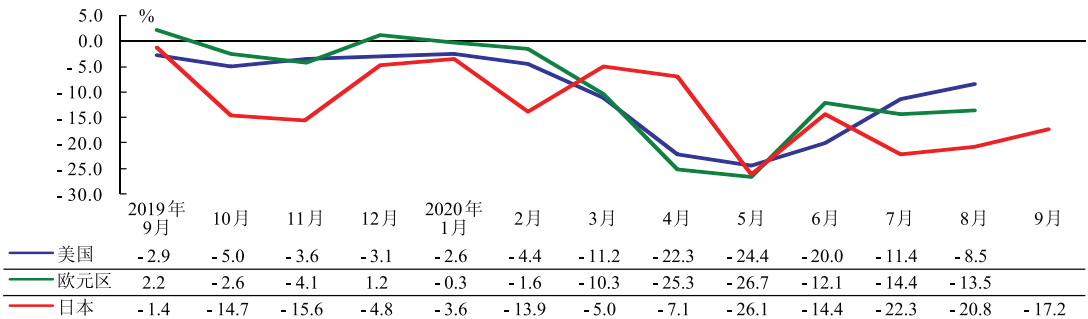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Think Tanks Need to Get the Methods of “Overcoming the Pandemic and Working Together”

Zeng Peiyan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countered a countercurrent, coupl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the world economy will enter the most serious rece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increasing the risk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ndemic is the common enemy of all mankind, and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unity and cooperation more than ever. Countries should step through this hurdle with unprecedented unity and courage. This is also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ink tanks to show their wisdom and exert their influence in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should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global development,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a clear-cut stand, and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2) The World Economy and Finance After the Pandemic: “Long tail”, “Japanese-style Recession” and New Policy Boundaries

Zhu Min

A sudden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in terms of speed and scale, has impacted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 with a force far beyond people’s imagination, and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orld. The global pandemic is still spreading exponentially. Under the policy of “lifting the ban” of various countries,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a “Long tail” and a “Fat tail”, and the future is extremely uncertain. All these indicate that the world economy will enter a “Japanese-style Recession” of low interest rates, low inflation and low growth,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a slow and weak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risis, academics,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sking abou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risis, studying the lessons of the crisis, and explor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The future is full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Tra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Wang Xiaohong, Meng Lijun, Guo Xi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main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and portrays the major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through open innovation. Mainly include: the initial period dominated by attracting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the rapid growth period of attracting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the period of increased scal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the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whic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as greatly increased. On this basi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the ICT field, such as invention patent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RCA index,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ICT industry. Finall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160 ICT service trade compan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research team confirme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trade in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ICT industry.

(4)The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Evolution Prosp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Yang Changyo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Compared with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although today’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still us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as its main channels, the extensivenes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richness of governance fields, the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 rul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Undergo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shortcoming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and the incompatibility and asymmetry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ve never been seen before, and adjustment, reform and improvement are needed urgently.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productivity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will present a new situa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s expected to evolve in a more inclusive, balanced and effective direction, and will be a long and tortuous process.

(5)Understanding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Prospects of Digital Economy

Jing Yanhui, Li Wei

Digital trade is a new form of trade promot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circle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consensus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rad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definition of digital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oints out the narrow and broad sense distinctions of digital trade. The narrow sense of digital trad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ervice trade, and the broad sense of digital trade should also include commodity trade realized by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ervice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at is, narrows sense of digital trade, studies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 and proposes idea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6)New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E. U.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Xie Lanlan

Rising digital service methods and content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the level of service digitiz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ch has opened up a broader space for EU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has also provided challenging policy issues fo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e EU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digital trade rules as its superio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vast market space and integrated advantages of single market digital policies, and establishes a global voice of European rules.

(7) The Impact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on Local Inclusive Growth——A Case Study of Ethiopia

Liang Yongmei, Li Gang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the African region. Taking Ethiopia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Africa that affects local inclusiv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entity and the angle of results and products as the main 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entity, the influence paths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Africa include better stimulating local employment, raising the income level of local residents, grea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ocal human resources, the cultivation of suppliers has promoted loc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enhance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capacity, and promoted local inclusiveness throug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such as donation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ults and products as the main entity,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has strengthened the foundation and space for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ducts produced in Africa have enriched the material products of local people and improved their living standards.

(8)Buil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Gr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Yang Ping, Li Wei, Ying Xiaoni*

Build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gr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must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eco-friendl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irst expounds related concepts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een growth,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Japan's eco-city, the American eco-industrial park, and th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cago tri-state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eco-friendly development needs to form a new model, and it needs to move from regional project coordination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ystem innovation includes: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unifying market access and project supervision, coordinating land management and revitalizing land indicators, remov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promoting the flow of factors, etc.

(9)Model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Feng Xiaoxu, Lei Shangjun*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r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led by technology, both need to meet high standard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quality,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demand changes, and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wo-industry integration", the status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ial form and competition patter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transmission of life services are all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input, output, demand and region also contains th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wo-industry integr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choi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upport key integration areas and coordin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relations, regulate the working mechanism, cultivate diversifi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tities and make precise effo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system.

Editor:Zhao Ze